

# 鳳凰週刊

## 解密香港反水客組織

「自由行」政策存廢激辯

漯河政協常委王華涉黑案內情 | 中俄蒙經濟走廊的理想與現實

紅色藏人革命家平措汪杰



上水站 Sheung Shui Station



康弘药业 KANGHONG PHARMACEUTICAL 贈閱

中國內地 RMB 15.00元 港澳地區 HKD 25.00元

本刊獲特許在中國內地發售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 2015 现正公开 征订

540元/每年 | 每月3期 全年36期 每期15元

订阅热线:【华南】0755-25934567(69)【华北】010-65281005(06)  
24H传真:【华南】0755-25934579【华北】010-65590266

- 【银行划款】 开户名称: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账号: 4000024819200010053  
开户行: 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红宝支行(请将电汇单及客户资料传真至0755-25934579或010-65590266)
- 【邮局汇款】 ①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楼901室 收款人: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邮编: 518001  
②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206室 收款人: 《凤凰周刊》 邮编: 100005
- 【网上支付】 登陆网站 [www.ifengweekly.com](http://www.ifengweekly.com) 进入在线订阅平台支付

\* 杂志订阅不包括VIP网上阅读包月服务, 如需开通此项服务, 请登录官网付费开通  
\* 需要挂号邮寄的订户, 按邮局统一规定每本加收挂号费3元, 半年挂号费54元, 全年108元  
\* 以上均以人民币计算

##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下杂志  
XIAZAZHI.COM

(另有VIP网上包月服务| 每月20元)  
[www.ifengweekly.com](http://www.ifengweekly.com)

下杂志 [www.xiazazhi.com](http://www.xiazazhi.com) 国内国外 实时更新 热门期刊 免费下载





# 更多资讯 更多阅读方式 尽在

## 凤凰周刊

### 新媒体

New Media

#### 微信

微信客户端扫描以下二维码  
或搜索香港凤凰周刊  
添加我们的公共账号吧  
每天为您播报更多资讯



#### 新浪微博

用新浪客户端  
扫描以下二维码  
赶紧 @ 凤凰周刊  
随时获取更多即时资讯



#### 亚马逊电子书

扫描以下二维码  
即可购买凤凰周刊  
亚马逊 Kindle 电子书  
获取更多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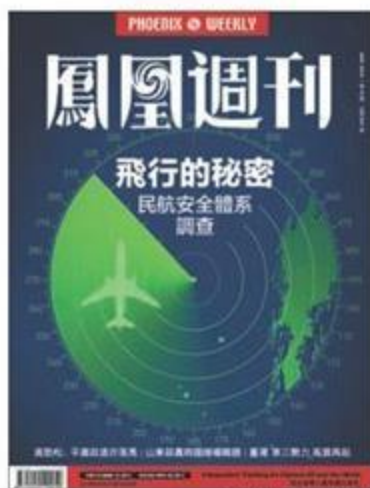


#### 官方网站

登录以下网址或扫描以下二维码  
您可以无障碍在线浏览精华内容  
或在线订阅《凤凰周刊》  
[www.ifengweekly.com](http://www.ifengweekly.com)







《凤凰周刊》上期封面

##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董事长/出品人 刘长乐  
行政总裁 崔强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王纪言 杨家强 周军  
编委会顾问 余秋雨  
编委(姓氏笔划为序) 王西年 王多多 邓飞 刘庆东 刘爽 何新京 吴晓镛  
钟大年 段敏 郭志成 唐建 袁路 喻凌霄  
编委会秘书长 孙谦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社长/总编辑 孙谦  
副社长 丁晓曙  
副总编辑 蓝艺  
主编 师永刚 周宇  
总编室主任 段宇宏 总编室副主任 黄楠  
编辑部主任 崔世海 编辑部副主任 王毕强 路琰  
记者部主任 段文  
主笔 叶润洋 魏恭 袁凌  
主任编辑 晓波 漆菲  
主任记者 钟坚 李光 张弛  
记者 湛彦辉 徐佳 陈祥 王琰 孙杨 曾鼎 赵新宇 李克难  
张蕾 吴如加 马军 徐伟 刘荣 邱锐 郭天力 赵福帅 曹蓓 闵云霄  
特约主笔 曹景行 杨锦麟 南方朔 谢国忠 阮次山 何亮亮 石齐平  
美术总监 小米 图片总监 丁大伟 美编 黄静 虎妹  
多媒体发展部主任 吴穷 广告总监 李泽红  
多媒体发展部编辑 张一泽 马茹均 莫文辉 张宝荣

## 香港凤凰周刊副总经理 崔博

海外事务总经理 夏婷婷 / 社长办公室主任 赵海燕  
大区业务总经理 齐崇轩 柳楚光 傅张伟 高卉 周卫 / 出版事务部主任 李迪 / 副主任 张云  
驻地代表 北京 贾楠 / 上海 金龄 / 广州 陈卫东 / 南京 任浩

## 法律顾问 王霖 财经顾问 沈铭

编辑出版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编辑部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 电话 00852-22008790  
社址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凤凰卫视总部 电话 00852-22008888  
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号楼6楼 邮编 518026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楼 邮编 518001  
电话 86-755-25934567(订阅热线) / 25934558 / 25580179 / 25934597  
Email: weekly@phoenixtv.com.cn  
北京办事处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211室 邮编 100005  
电话 86-10-65281005 / 65281006(订阅热线) / 65211745(办事处)  
Email: cuibo@phoenixtv.com.cn  
北京凤凰雨翔广告有限公司 汽车、外航行业总代理 IT、房地产行业代理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10号院 电话 010-84467053 / 84467054  
浙江金色凤凰影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省区域广告总代理  
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内)凤凰科技楼7号楼6层 电话 0571-87175087  
上海新泽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广告总代理  
上海市余姚路288号1号楼7楼 邮编: 200042 电话 021-63511838  
深圳市派动广告有限公司 华南区钟表、金融、洋酒、红酒、地产行业总代理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南方日报大厦7楼 0755-83226011 0755-83225602  
凤凰周刊理事单位 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进口/发行总代理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工体东路16号 电话 86-10-65063082  
承印人 凸版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电气道169号宏利保险中心20楼

## 中国大陆广告总代理 神州电视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 010-65207877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1927室 电话 021-52925188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55号峨山饭店商务楼2705室 电话 028-85588710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建设大道700号香格里拉饭店432号 电话 027-85781338  
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319号索菲特人民大厦东楼2层 电话 029-87928666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A座2103室 电话 024-22814065  
凤凰卫视广告综合业务机构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 010-65207833  
广东一代传媒 广州市东山区文德路67-69号金德大厦28楼 电话 020-83226130

## 广告委托代理商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楼(邮编 518001)  
广告热线 0755-25580179 传真 0755-25580169  
广告客户服务热线 0755-25580179 / 25934597 传真 0755-25580169

本期所有文字和图片作品经著作人授权本刊,未经许可,不得摘编。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作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观点。  
本刊字体由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凤凰周刊官方网站



凤凰周刊亚马逊电子刊



凤凰周刊微博



凤凰周刊微信

#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咨询服务热线

深圳 0755-25934567 / 北京 010-65281005 /  
香港 00852-22008790 传真 0755-25934579



# 让天下人管“天下粮仓”

□ 周兼明

下策志  
XIAZAZHI.COM

**最**近,大陆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中储粮辽宁、吉林等地粮库,以陈粮顶新粮、恶意套取国家补贴的调查新闻,引起民间舆论大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此做出批示,强调此事性质恶劣,要求进行彻查、依法问责,并举一反三,抓紧完善监管制度,坚决堵塞漏洞,切实守住管好“天下粮仓”。

这几年,中储粮系统屡屡出事:2013年接连发生两场蹊跷的大火,先是黑龙江林甸直属库数万吨粮食过火,接着黑龙江海林租赁粮库着火,让人不能不怀疑背后是否有借火灾掩饰亏空的嫌疑。同年,中储粮河南分公司一下挖出110名“硕鼠”,空买空卖“转圈粮”28亿斤,骗取国家粮食资金7亿多元。前年9月,中央第一巡视组对中储粮总公司巡视时,就指出“存在着基层腐败案件高发、多发”等问题。哪知一年多过去,在当下如此强势的反腐高压下,各地粮库依然敢我行我素、顶风作案,这说明滋养贪腐的中储粮管理制度已到了破旧立新的节点。

为确保全社会粮食安全,中国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国家储备制度。中储粮总公司作为“天下粮仓”,是国家粮食储备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它一方面承担国家储备粮油的收储任务,通过市场调配,像蓄水池一样稳定粮食价格;另一方面通过保护价收购保证粮农利益,促进粮食增产增收。同时,它还与粮食管理部门及农业发展银行一起,负责对粮食收储的监管。为农民谋利、为民众造福原本是这家央企的本分和责任,哪知在现实中它却屡屡成为伤害农民利益、危害粮食安全的代表。

显然,把全国十多亿人的粮食安全问题系于一家央企,科学性、合理性均值得追问。中国粮食储备规模巨大,完全由政府

投资、中储粮独家运营、垂直管理,极易产生并很难根除储备与管理成本过高、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加上中储粮身兼粮商、粮仓、粮管三重身份,政府又对之实行财政包干,模糊了它的行政与市场兼备的身份界限,不仅给权力贪腐与寻租留下了大量机会,如果一旦粮食市场真正出现波动,中储粮的部门利益与调控职能之间必然产生冲突,是追求利润呢?还是心甘情愿地高价收储,承担亏损?

发达国家都极为重视粮食储备,但通过何种方式来储备,美国、日本等国选择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方式。前些年数据显示,美国粮食总仓储量约5亿吨,其中农场储粮是主体,占57%,商业性粮仓拥有40%左右,政府储备只占到1.4%。美国政府对储备粮的管理,主要由联邦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负责,通过市场促进粮食流通,通过政策性信贷杠杆进行调控。参加储粮的农场主须与信贷公司分支机构签订合同,信贷公司按合同数量向农场主支付储藏费用和低利率贷款,农场主以储粮作抵押,不得自行处理储备粮,否则要罚款。只有当市场粮价高于政府规定投放价时,农场主才可将储备粮出售。就这样,经由政府信贷手段调控的农场储备粮,成为美国政府调节粮食市场供求的蓄水池。日本的粮食储备,同样是以民间为主、政府为辅。

储备粮与其他物品不同,需要适时轮换更新,由于美国和日本都是由粮食生产者或加工经营者储粮,属于个体资产,自然重视保护粮食的质量,轮换粮食的速度也快,成本也低。比如日本储备粮,每两年就要轮换一次,采用的是滚动式储备,粮食质量得到了保证。

中储粮之所以问题不断、成本过高,与

中国的储备体系单一有关。适度借鉴美、日等国多层次的储备粮管理体系,让农户与社会企业参与到粮食储备中来,用市场和金融的手段管控储备粮市场,不仅能降低中国政府储备成本,也能有效提高粮食储备的效率与质量。国家粮食安全与政府储备粮食并不是一个概念,只要保证让民众能消费到低价且安全的粮食,这个粮食由谁提供的并不重要。如果将政府储备粮看作粮食安全的唯一保障,等于让大量的财政资金淤积,不仅滋生腐败,储备粮食的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

中储粮虽然把“以陈顶新”、“转圈粮”、抬价压价、私设小金库归结为自身体制的“四害”要予以克服,但这种背靠垄断特权又面向市场的机制,想要真正克服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明清两朝,杀了那么多管粮库的官员还是管不好储备粮就是明证。面对屡屡发生的这类事件,只是彻查个案已无助于摆脱中储粮的困局,只有深度反思当下的粮食储备机制,进行更为深度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动局面。政府为减少粮价的波动,实行“托市收购”政策,是让中储粮一家还是民间粮商共同运作,目的都是一样的,但效果可能大相径庭。即便是进行财政补贴,有竞争也会提高效率。中国虽已是全球粮食生产、消费与储备的大国,但在世界粮食市场却无话语权,这与中国粮食市场化水平低下有关。什么样的机制决定了什么样的行为和水平,如果让中储粮永远这么一家独大地孤立于市场之外,要想堵上所有漏洞、改变所有弊病,几乎没有可能。粮食储备机制的多元化、民间化反而有助于分散风险,更好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只有让天下人共同参与和管理,才能真正管好“天下粮仓”。●





## 20 反水客组织调查

COVER  
STORY

反水客运动的走偏引起各界的谴责，究其原因仍是水货客扰民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使得一些政治投机者藉此起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货客问题积怨之深。

**红云红河集团**  
HONGYUNHONGHE GROUP  
赠阅部分嘉宾

### 卷首语 Editorial

3 让天下人管“天下粮仓”

### 现在时讯 Trending

8【瞬间/封面/台港澳/中国观察/环境&科技/阅读/军事】

###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22 “一签多行”政策转变背后——香港“反水客”之争

34 解密反水客运动组织

41 专访张楚勇：“反水客”组织者维持影响力困难

42 反“反水客”人士：水货客问题没想象中

44 香港“自由行”的红利到底有多大？

### 大陆时事 Mainland Politics

46 漯河政协常委王华涉黑案内情

50 中国开发瓜达尔港秘辛



## 漯河政协常委 王华涉黑案内情 46▼

一个曾在街头打架、盗窃的少年，通过在河南漯河市盘根错节的社会网络，十余年逍遥于两桩人命嫌疑之外，且官至当地政协常委。什么样的社会土壤造就了王华，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王华在漯河数十年屹立不倒？

### 台港澳 Taiwan Hong Kong & Macau

54 香港股市的A股化隐忧

### 观察 Observer

56 郑永年：政商关系必须有，但厘清边界  
58 中国水治理的新常态

### 国际 World

64 2015:英国迎来最难预测大选  
68 中俄蒙经济走廊的理想与现实

### 军情 Defense

70 中国为何举行反常规大阅兵？

### 特别报道 Feature

72 方正已无日本人——中国独特日本“侨乡”的艰难时事  
80 离乡三千里——中国新娘在日本



似水流年



下杂志  
XIAZAZHI.COM



似水流年·卓然

华为 P8

- 金属质感，匠心摩挲
- 实时流光快门，留驻光阴
- 情景智能，贴身助理
- 高清音频解码，静听时光

华为商城: <http://www.vmall.com>  
官 网: <http://consumer.huawei.com/cn>  
服务热线: 400-8308300 800-8308300

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



了解更多  
请扫描二维码



## 财经线 Business

- 83 大陆或将降准降息
- 85 财经资讯
- 86 争议微商

## 图谋天下 Galleries

- 88 亲历抗美援朝战争

## 历史档案 History

- 94 红色藏人革命家平措汪杰
- 98 微史记

## 文化 Arts & Culture

- 100 对抗书业浩劫：台湾独立书屋结盟求生

## 三地书 Books

- 103 斯大林主张过“划江而治”吗？

## 资讯前线 Advertorial

- 60 龙泉驿：车轮上的“桃花源”

## 54

### 香港股市的A股化隐忧

随着“沪港通”的开启，最近本港股市连创辉煌，赚钱者又开始豪吃龙虾宴，但业内人士也担忧港股内地化，变成纯粹的政策市。

## 50

### 中国开发瓜达尔港秘辛

巴基斯坦是一个弱政府、强军队、大家族、多宗派以及多外来势力渗透的国家，像瓜达尔港开发这种牵动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全局的项目，其中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精细把握。



### 红色藏人革命家平措汪杰

共产主义革命中，西藏曾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平措汪杰最早在西康引入星星之火。解放军进藏时，缺乏熟悉西藏风情的干部，精通汉藏两语、熟悉西藏政界、信仰共产主义的平措汪杰完美地补了缺。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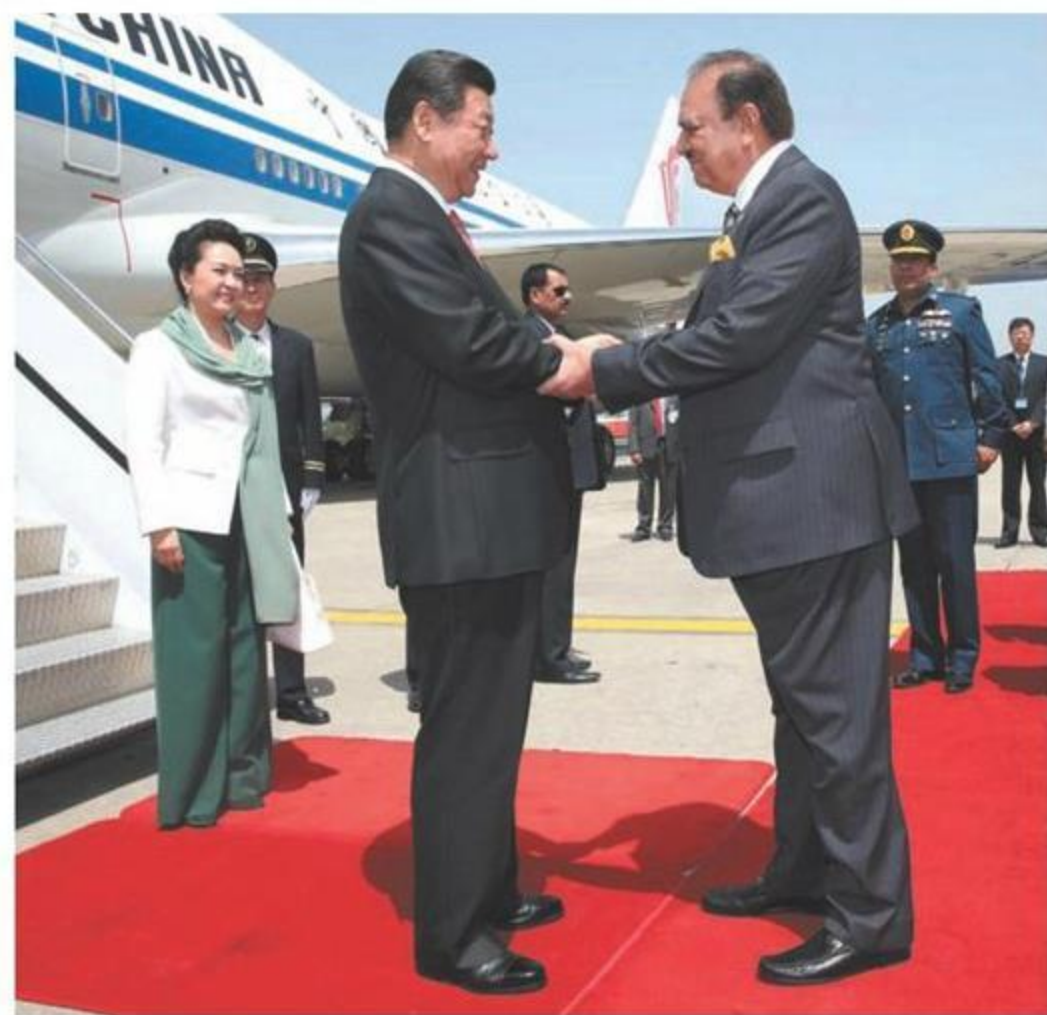
### 对抗书业浩劫： 台湾独立书屋结盟求生

独立书屋已成为城市乃至原乡特有的风景，成为偶像剧、纪录片取材的场景，例如梦田文创的偶像剧《巷弄里的那家书店》、侯季然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报道的40家独立书屋的故事，让独立书屋价值更为大众所知。

100

## 广告目录

周刊征订/封二 将本刊作为指定读物的航空公司和酒店 / 封三  
《世界遗产地理》/ 封底 多媒体 / 1 华为 / 5 凤凰书 / 7  
《凤凰周刊·生活》/ 15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 / 19 松下 / 49 芬迪 / 67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 CHINA PEOPLE 大沉浮

时代人物的命运



NEW  
最新上市



機密檔 壹



機密檔 貳



美國知識分子



三地書



中國意見書



中國貪官錄

## REPORT OF CHINA 我們這樣報道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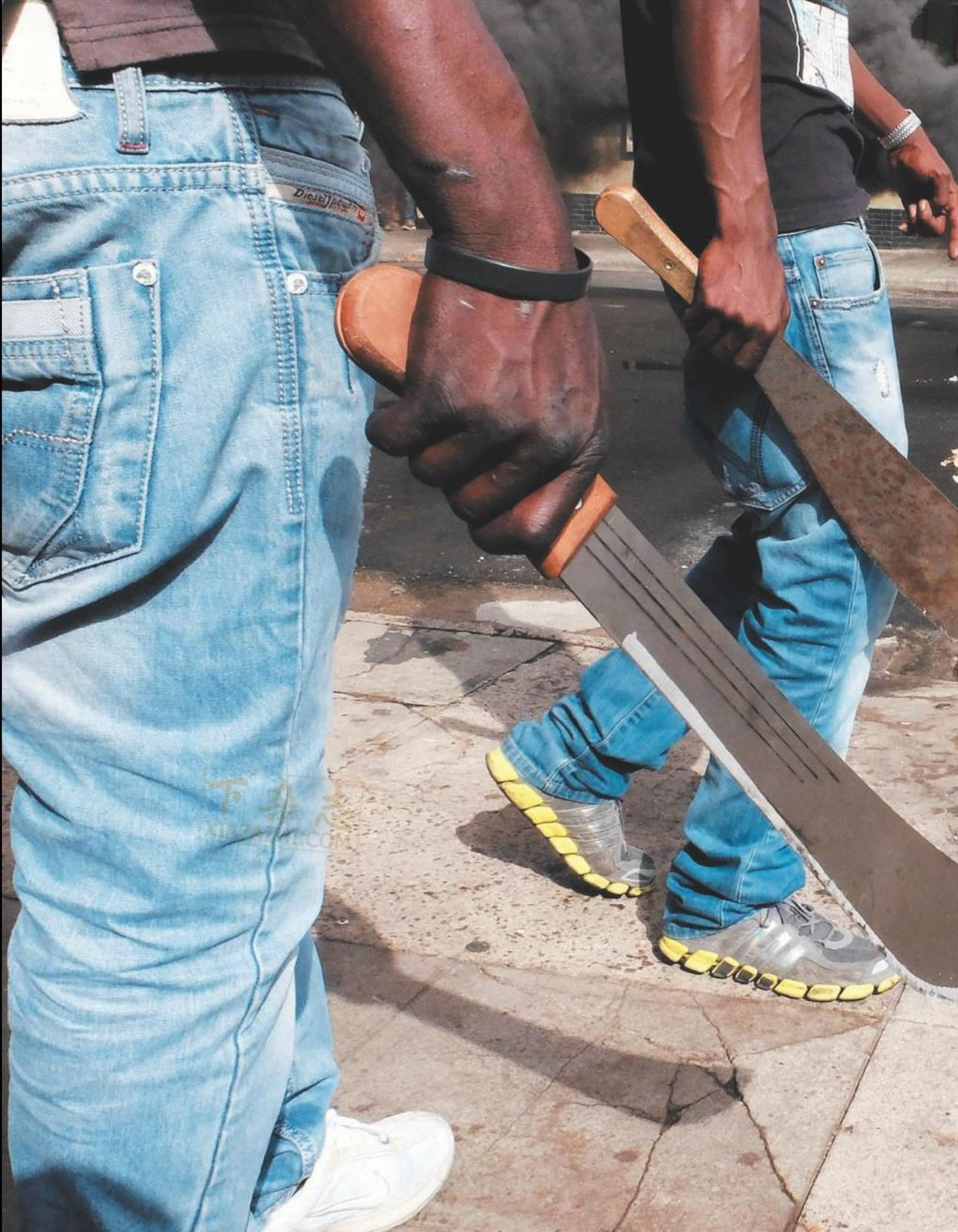
紀念《鳳凰周刊》創刊十周年，傾情推出十年精品文叢，首批七本盛大面世。

《大沉浮》时代人物的命运；《机密档 壹》台海兩岸未公開檔案；《机密档 貳》被遮蔽的歷史；《美国知识分子》40位影響美國社會發展的思想家；《三地書》最具影響力的台港澳三地100本大書；《中国意见书》百位著名學者國是論衡；《中国贪官录》2000-2010:250位貪官檔案；即將推出：《中國群體事件檔案》轉型期的社會衝突及樣本研究；《紅牆中南海》以第一手的圖文資料和回憶文章，還原中南海清晰真實的歷史畫面，展現共和國鮮為人知的政治風雲。

徵訂熱綫 010-84606197 /  
angecy@ifengweekly.com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MOMENT

## 瞬间

南非 2015 / 04 / 14

南非德班，外国人持刀自卫。据报道，南非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袭击和排外骚乱愈演愈烈，在多个城市蔓延，数百家外国人商店被打砸哄抢，数千名外国人流离失所。



## 过半华人亿万富豪 来自内地

据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编制的2015年华人富豪榜称，华人今年在全世界所有亿万富翁中所占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五分之一，高于2014年的17.6%。亿万富豪每个人都拥有至少10亿美元的净资产。



资料来源：《南华早报》4月21日



NO.1

李嘉诚



NO.2

李兆基



NO.3

王健林

## 家族权力带来负面影响

• 《经济学人》/ 2015.04.18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大概能够消除世袭王朝，”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1947年如此写道。然而，近70年后，

明年的总统选举很可能成为一场家族事务。在过去的9次选举中，克林顿或者布什的名字已经在选票中出现过7次。希拉里与杰布的对决可能是对平等机会的冒犯，但没有违反统计规律。

人们不禁要问：这种事怎么能发生在一个曾经为了赶走自身王权而战的国度呢？这个问题本身是错的。纵观这个世界，无论是在政坛还是商界，权力仍旧集中在家族中。权力家族和王朝将会延续下去。《纽约时报》指出，州长的儿子成为州长的可能性比婴儿潮一代的普通美国人高出6000倍，参议员的儿子成为参议员的可能性高出8500倍。问题是如何确保权力家族和王朝是一种向好的力量。权力和财富之于一小部分精英的集中带来的是合法性问题。

家族势力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尤其是在金钱和影响力相互交织的商业和政界。克林顿家族就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例子：包括外国政府在内各类人等已经给克林顿家族基金会捐了数亿美元，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会让他们对一位未来的总统拥有影响力。

懒惰的守成者有着利用政治关系保护自己免于竞争的动力。这能够导致腐败。一项研究发现，2003年，代表全世界总市值将近8%的企业是由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亲属运营的。即便没有政治关系，商业家族也能够对更为广泛的经济施加一种不健康的影响力。另一项研究发现，葡萄牙最富有的10个家族控制了34%的市场总值；在法国和瑞士，这个比例是29%。健康的家族权力的秘诀是竞争。在一个开放的自由市场体系中，由于管理有法律，问责有自由媒体，裙带关系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如同其他权力一样，家族权力需要监督。



家族势力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尤其是在金钱和影响力相互交织的商业和政界。



1

路透社

2015/04/22

### 绿色和平：北京雾霾大幅好转

根据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整理的中国数据，随着整治污染的各项措施收到效果，笼罩北京的雾霾在今年第一季度大幅好转。与2014年第一季度相比，今年头三个月北京PM2.5细颗粒物污染浓度下降了13%，而在炼钢大省河北，PM2.5浓度下降了31%。北京方面此前出台政策，力求在人口集中的繁华都市减少工业和汽车排放。绿色和平称，其他多个大城市录得类似的污染下降，但在其他地方空气质量仍然极差，而且随着政府将重工业转移到较贫困地区的措施逐渐落实，有可能恶化。

2

《金融时报》

2015/04/21

### 未来5年中国钢铁需求不会增长

鉴于全球最大钢铁买家中国的经济持续放缓，预计全球钢铁需求今年将以更慢速度增长，同时钢铁制造商利润率将下滑。世界钢铁协会预计今年的全球钢铁需求将基本持平，达到15.4亿吨左右，明年的需求增速将升至1.4%。其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因建筑和制造活动放缓，中国经济扩张速度为6年最慢。由于建筑活动减少，中国去年钢铁需求下滑3.3%，至7.1亿吨，为自1995年以来首次负增长。该协会预测，中国今年的钢铁需求将再减少0.5%。



## 外劳在台湾工作年限延至15年

• 台湾“中央社”/2015.04.22

→ 台湾“立委”提案修法延长外劳累计在台工作年限至15年。“劳动部”说,支持在补充性原则及不影响民众就业下,渐进延长其工作年限。台湾“劳动部”统计至今年2月底,在台合法有效聘雇外劳有51.357万人,另有行踪不明外劳4.4204万人;印尼劳工23万最多,其次是越劳。分析合法有效聘雇外劳人数中,在台工作未满3年有39.7428万人最多(占71.25%)。

国民党“立委”江惠贞等19名委员提案修正就业服务法第52

条,将外劳工作年限从现行12年延长至15年,并删除聘雇期满需“出国”一日始得“入国”工作。“劳动部”认为,此提案有助稳固劳雇关系及节省训练成本并留用优秀外劳,且不影响“国人”就业及不额外增加外劳人数等影响,对此表示支持。但删除聘雇期届满需“出国”一日部分仍待研议。“劳动部”表示,延长外劳工作年限不是放宽雇主聘雇外劳资格,仅留下符合雇主需求的外劳,不会额外增加外劳引进人数,对经济发展及社会安定也具有正面助益。

## 陆证监会首证研究“沪台通”

• 台湾《经济日报》/2015.04.21

→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4月21日表示,正在积极研究推广“沪台通”,为证监会首度证实研究有关计划。姜洋强调,只要是两岸交易所之间的合作都会给予支持,但前提是台湾方面必须有意愿开通。台湾金管局决策官员回应称,金管局支持证交所强化和大陆各交易所之间的合作,但“沪台通”牵涉层面广,必须台湾内部有共识后,才能进一步推动。

去年11月开通的“沪港通”,为在中国境内开通两地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打响了“第一枪”。目前两地正在研究开通“深港通”,预计将会在年内完成。

“沪台通”即两岸投资人在当地可买卖上海交易所和台湾证交所挂牌的股票,一旦实施,有望为台湾股市注入新资金。

台湾金管局称,资本市场国际化是全球的趋势,而台湾目前正推动和各国与各地区的资本市场加强连接,例如台湾证交所和新加坡交易所的“台星通”预计将在6、7月开通,下一步则是推动“台日通”。

## “一带一路”给香港带来的发展机遇

• BBC中文网/2015.04.21

→ “一带一路”是中国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已开始启动,涵盖包含亚洲在内的26个国家和地区以及44亿人口,将产生21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仅仅在公路、铁路、港口、油管、桥梁、输电网络、光缆传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商机。这是香港经济借力重新上路的绝好平台。

许多研究机构认为,对国内基建类工程机械的需求拉动预计年均达11.9%,有望为铁路装备、工程机械和核电装备提供持续催化。帮助抵御国内房地产市场疲软和出口需求迟滞带来的影响。

“一带一路”的愿景,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融入全球经济的目标是一致的。通过“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为促进亚洲经济发展

添砖加瓦。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需投入8万亿美元,融资需求和融资缺口巨大。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可以满足沿线国家改善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

香港对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充分发挥优势信心满满。特首梁振英在博鳌论坛上阐述了香港金融中心的重要优势,认为“一



带一路”战略的升级离不开香港的支持。

固然,香港是世界第三大的金融中心,可以提供最大人民币流动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同时也拥有众多的金融衍生品。与人民币有关的基础建设融资、投资风险管控,成熟的股权融资市场等,这些都是香港的重要优势。然而,“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战略行为,以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和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为平台,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主权国家信用为保证的投融资行为,与全世界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沿路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内地的众多省市都在积极争取登上这一快车。香港金融中心的支持或不支持,无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香港金融中心应定位在顺势而为,而不是舍我其谁。

香港真正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经济已经充分融合进全球经济,有非常国际化的营商网络和环境,特别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往历

史悠久,了解所在国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商业及投资规则。香港真正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大量的国际化的专业管理人才,特别是在普通法系下培养的国际经济法人才、投资融资人才、项目管理人才、财务管理人才、通信技术设备管理人才等。

可以说,“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不缺国家实力,不缺钱,不缺伙伴,可最缺国际化的专业管理人才;而这恰恰是香港的优势,只是多年来,英雄无用武之地,或在流失和内耗中。

香港在“一带一路”中可以抓到的发展机遇主要在“一路”上,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还从中国沿海港口经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发展中国和亚、非、欧各国的经济合作。香港地理位置优越,从货物贸易转口、到金融货币转口、再到文化传递,都是重要的支点,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可以对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林贡钦)





如果东亚社会不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创新，简单地搬用西方式的“一人一票”机制，就难免避免“福利陷阱”，迟早也必然会步今天欧洲福利社会后尘。

## 亚洲民主的“雁行模式”及其局限

• 《联合早报》，节选 / 2015.04.21

→ “雁行模式”是解释亚洲经济发展的一个概念，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1932年提出，用来解释日本国内的产业变迁。根据他的研究，日本的产业经历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四个阶段并呈现循环状态。这位经济学家向人们展示了后进国家如何通过国际贸易，利用和消化先进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同时利用本国的低工资优势打回先进国市场，使先进国家受到国外竞争压力。

在很大程度上，亚洲民主的扩散及所面临的问题，也可以用“雁行模式”来解释。这里指的民主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民主化的雁行模式，第二是民主化之后社会福利化的雁行模式。如雁行经济发展模式所显示的，亚洲的经济发展和西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在和西方的经济关联中，日本与“四小龙”才形成了出口导向的经济体。

亚洲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同西方地缘政治扩展到亚洲也有很大的关联。西方民主是通过几种方式扩散到亚洲社会的。第一是占

领导的方式，例如战后日本民主是在被美国占领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第二是殖民地模式，例如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英国对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殖民。尽管殖民者本身并没有为被殖民国带来民主，但这些国家后来的民主，多少受殖民地制度模式的影响，主要是选举和法治。第三是受地缘政治压力影响的民主化，主要是韩国和台湾；只有通过民主化，这些社会才能继续得到西方的支持。

从内部因素看，民主在亚洲的扩散也存在雁行模式。在外力影响下，一个社会能够开始实践民主，但民主的质量如何，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如果民主是一个社会经济起飞、中产阶级壮大后的产物，那么往往是质量民主。日本先民主化，然后扩展到韩国和台湾地区。新加坡一直保留选举制度，但政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开放。香港仍然处于民主化过程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的情况。其他亚洲国家尽管在殖民地之后保留了民主形式，尤其是定期选举，但

民主质量的高低，则取决于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主化的雁行模式一样，福利逻辑早就从最先民主化的日本开始，向其他亚洲社会延伸。台湾民主化之后，福利制度急剧扩张。健保制度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民主化之后短短几年里，这个制度很快发展到世界上少数几个最慷慨的体系，但同时没过几年，就出现赤字，难以为继。

如何逃避“福利陷阱”？即使在西方，福利陷阱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在精英民主时代，尽管政府也提供保守主义的社会福利，家庭、社会团体（包括教会）和地方社区（包括企业），在保护社会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比政府更为重要的作用。真正冲垮家庭、社会团体和地方社区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其关联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也变成了一种货币关系。“一人一票”的制度又使得社会个体拥有政治权利，向国家要求社会福利。市场所产生的货币关系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互相强化，不仅使得国家的福利功能越来越得到强化，也使得国家这一制度设置不堪重负，难以持续。

亚洲社会本来并无西方那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更强调家庭、社会团体和地方社区的作用。传

统上，亚洲社会的个人福利是和家庭、地方社团联系在一起的。强调家庭和地方社团的作用，能有效缓解甚至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因为只有在较小的集体里，“搭便车”问题不会扩展到不可控的程度。

日本今天的“福利陷阱”是照搬西方的产物，即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基于“一人一票”的民粹主义。近年来的安倍经济学也同样不适合日本文化，同样不会有效。日本今天社会福利负担日益加重。和西方一样，日本也通过向中产阶级征税、搞赤字财政和消费未来等方法来应付福利陷阱。但正如西方所经历的，这些都难以解决日本的问题。

亚洲要避免欧洲社会那样的福利陷阱，取决于两个要素。第一，是否能够通过创新，把社会福利和选票脱钩。第二，是否能够重新有选择性地回归亚洲价值观，强调家庭、社团和地方共同体在提供个体福利方面的作用。

今天，如果东亚社会不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创新，简单地搬用西方式的“一人一票”机制，破坏亚洲社会固有的家庭和集体价值观，就很难避免“福利陷阱”，迟早也必然会步今天欧洲福利社会后尘。（郑永年）



## 中国“污染地图”向工厂施压

• 路透社 / 2015.04.20

→ 当环保人士马军开始寻求解决中国工业的污染问题时，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污染工厂告上法庭是很困难的。工厂老板们能量大，且规避环保法规比起遵守法规的动机更强烈。

但污染问题恶化，引起公众愤怒，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担

忧，并已经开始从工厂采集实时排放数据。当马军请求让政府公布污染数据时，官员们同意了，给了马军制作移动应用所需的材料。马军在斯科尔世界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称，对政府答应（公布污染数据）非常惊讶。马军在论坛上获得了125万美元的奖金。马军称，这明显表明了

（中国）中央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意愿。

他所在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利用这些污染数据，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序——“污染地图”（也称“蔚蓝地图2.0”），允许用户每小时查看家附近的工厂或者发电厂是否正在违反排污标准。中国已有300万人次下载了“污染地图”。违规行为会在地图上以红色圆形图案显示，用户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譬如当地环保部门在新浪微博的账号进行举

报。马军称，过去每年都交罚款的工厂现在因此面临着新的压力。

IPE也让苹果、Gap和优衣库等从违规工厂采购产品的跨国公司注意到工厂的违规情况。马军称，在与第一批29家企业联系后的一个月内，有28家企业同意采取行动。马军称，一开始（工厂）持抗拒态度，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向违规工厂发出警告，合同可能不保的违规工厂态度发生了改变。“这些违规工厂决定是时候解决污染问题了。”

## 速度与阵痛：中国城市化调查

• 《纽约时报》/ 2015.04.22

→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彻底转型，从一个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城市居民为主的社会。其目标是在未来10年，把70%的人口——9亿人整合到城市地区。

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探究了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改变依赖出口、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且不计环境代价的发展模式，转

向更加依赖生产力增长和国内消费的必要性。报告发现，中国特大城市的数量是官方数据的两倍。特大城市的定义是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以下是这份报告的一些要点：

### 1. 特大城市增多

中国政府的统计中只有六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原因是它剔除了外来务工人员 and 郊区人口。OECD将狭义上的行政范围以外的都市地区人口也纳入调查中，称中国目前有15个特大城市。

### 2. 规模大

经济自由化推动了城市化。1980年，只有19%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根据政府的预测，这个数字在2020年可能达到60%。来自农村地区或其他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中国城市人口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一半左右。报告援引政府的数据称，全国的城市中大约有2.74亿的外来人口。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三分之一的居民来自中国其他省份。

### 3. 六成流动人口为年轻男性

2012年，将近60%的中国流动人口是16到40岁的男性。与印度和巴西的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五分之四的中国流动人口至少完成了初中教育。2010年，中国90%的建筑工人和80%煤矿工人都有流动背景。该报告称，中国的城市官员缺乏与周边地区合作的动力。因此，报告称，

“三十多年来，地区竞争一直是改革的主要特征”。报告接着表示，“城市间的竞争造成了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部分重复建设由高增长率承担了，但还有一些被认为是浪费。”

### 4. 投入本地需求的地方财政不足

从1994年开始的全国税务制度改革，使财政制度更加集中化，

流向北京的中央政府的收入日渐增加。中央政府常常是根据当地的户籍登记，即户口数据为社会服务拨款，但这些数据并未算入在城市生活却没有城镇户口的外来人口。现金短缺的市级政府，更缺乏为外来人口提供医疗保健或教育等社会服务的动力。报告称，为了支付这些费用，各市变得过度依赖出售土地使用权和贷款。

### 5. 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过去30年，中国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从政府数据来看，1978年开始进行经济自由化时，中国城镇家庭的收入是农村家庭收入的2.5倍。到2012年，城镇家庭的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1倍。尽管农民工在城市里挣的钱比留在乡下的人多，但他们享受不到很多社会福利及住房补贴项目，这些通常是留给有城镇户口的居民的。

### 6. 缺乏市民参与

“市民没有参与讨论城镇规划的正式渠道，也没有提供服务质量反馈的途径，”报告称。“在涉及新开发项目的决策中，主导力量可能是开发商和地方官员，他们谁都不会长期留在某个城市，不用承受那些决策的后果。”（PATRICK BOEHLER）







## 中国领导人的“万隆情结”

•《联合早报》/ 2015.04.23

→ 60年来，中国历代领导人都盛赞万隆会议和万隆精神，认为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次十分重要并获巨大成功的亮相，万隆精神的主要内涵即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团结合作也从此被奉为中国外交基本原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2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呼吁各国大力弘扬60年前的万隆精神，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一年半内第二次来到印度尼西亚，再次凸显中国领导人挥之不去的“万隆情结”。

1955年1月，印尼总理阿米佐约邀请中国总理周恩来参加同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首届亚非会议。当时，中共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不到六年，不仅遭到美国等西方国

家的打压，也没有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承认。在出席首届亚非会议的29个国家中，与新中国建交的只有七个国家，其余22个国家仍承认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为打破孤立，中共决定派周恩来率高级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但中国当时既没有远程飞机，也没有开通国际航线，周恩来决定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印尼。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在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途中发生爆炸，机上人员除三名机组人员外全部遇难。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飞机爆炸的原因是台湾特工买通香港机场工作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目标是暗杀周恩来。至于周恩来如何躲过此劫，中国

官方的解释是，周恩来当时因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临时秘密改变行程，经昆明取道缅甸仰光赴万隆参加会议。“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使前往万隆的周恩来面临安全风险，也为整个中国代表团增添了一层悲壮色彩。

就在外界怀疑周恩来一行是否还敢去参加万隆会议的时候，1955年4月16日，周恩来率副总理陈毅等中国高官出现在雅加达机场，引起巨大轰动。

1955年4月18日-24日，首届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会议的开始阶段并不顺利，一些国家的代表将矛头指向中共，批评共产主义是“新形式殖民主义”，要求亚非国家与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周恩来深知，陷入意识形态争论对中国十分不利。他临时改变发言内容，强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希望各国代表“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

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万隆会议最终达成“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60年来，中国历代领导人都盛赞万隆会议和万隆精神，认为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次十分重要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亮相，万隆精神的主要内涵即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团结合作也从此被奉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2005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印尼，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和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纪念活动。他在发言中说，万隆精神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激励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实现民族振兴和推动人类进步而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显然也有浓厚的“万隆情结”。据中新社统计，不到两年时间，习近平已在不同场合先后五次提到万隆会议。具有官方背景的“复兴路上工作室”4月17日也推出微电影“跟着大大走之万隆会议篇”，用不同肤色亚非人的笑脸呈现“团结就是力量”的主题，成为新媒体上的热门视频。

习近平等30多个亚非国家领导人4月22日、23日两天在雅加达举行首脑会议。4月24日，领导人将前往万隆参加首届亚非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这是继1955年亚非会议、2005年亚非峰会之后亚非领导人的第三次聚首。

和60年前不同的是，如今的亚非国家早已实现了政治独立，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难题。而与60年前周恩来秘密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相比，如今的习近平携带着亚投行的成功气势，高调赴印尼推广他的“一带一路”大战略，并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概念，为中国领导人的“万隆情结”增添了全新内容。（于泽远）



## 中国涉外家庭儿童遭遇“国籍难题”

•《洛杉矶时报》网站，节选 / 2015.04.19

→ 俄罗斯学者玛丽亚·格罗马科娃在厦门大学执教。最近，她带着5岁的儿子卡伊回了一趟莫斯科。此行让她的心情悲喜交织。3月初她启程返回厦门时，不得不将儿子卡伊留给外婆，因为中国不肯给卡伊颁发签证。拥有俄罗斯护照的卡伊之所以拿不到中国签证，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中国人。

中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令越来越多拥有外国国籍的中国家庭感到头痛。法律规定，只要父母一方为中国公民，无论孩子在哪里出生，都自动拥有中国国籍。但

法律同时禁止中国公民拥有双重国籍。这意味着，除非父母提出复杂的正式申请，要求“放弃”孩子的中国国籍，否则中国政府不会承认孩子拥有父母一方所拥有的外国国籍。而这个过程通常要一年。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1989年，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登记结婚的有20389对。到2003年，这个数字已跃升至大约7.8万对，过去10年间稳定在每年大约5万对。北京涉外婚姻律师孙永刚（音）说：“30多年前这部法律颁布时，涉外婚姻还不多。不允许中国公民拥有双重国籍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

但时代已经变了。”

因为短期内看不到政策变化，像格罗马科娃这样的家庭面临对孩子国籍的艰难选择。格罗马科娃与中国丈夫2008年在中国登记结婚，2009年她在俄罗斯生下卡伊。

卡伊6个月大时，一家人回到中国。第一次，他们还算幸运，因为卡伊的出生证明是俄文的，中国官员并未意识到他的父亲是中国人，于是他们拿到了签证。此后，他们的签证随格罗马科娃的工作签证每年续签。但2014年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国公安部门根据新规，要求格罗马科娃在续签时提供卡伊出生证明的中文复印件。这次她被告知，卡伊的俄罗斯护照不能获得中国签证，因为孩子事实上是中国公民。但因为卡

伊已经拥有俄罗斯护照，除非“国籍矛盾”得到解决，否则卡伊不能真正被视为中国公民。

尽管卡伊被允许留在中国，却因为这种行政手续上的困境不能上学。没有中国签证，他就不能作为外国人上学。而作为俄罗斯护照的持有者，他又没有作为中国公民上学所需的居住证明。格罗马科娃夫妇无奈地让卡伊在莫斯科注册上学。

格罗马科娃已决定放弃儿子的中国国籍，这样卡伊的俄罗斯护照就能获得中国签证，他也可以在中国上学了。而且如果在中国上大学，持有外国护照还有巨大的优势。作为外国人，他不用参加竞争激烈的高考，只需通过一项语言能力测试就能进入名牌大学学习。

香港凤凰卫视倾力打造 全球华人精品生活杂志

**《凤凰周刊》征订的读者**  
**征阅全年《凤凰周刊》+《凤凰周刊·生活》**  
**可享受690元优惠，即刻节省90元**  
**单订《凤凰周刊·生活》全年240元**  
**用户可免费获得凤凰精美礼品一份！**

征订热线：陈先生 0755-25934591  
广告热线：张先生 0755-25469762  
城市版合作：聂小姐 0755-25934586  
征订传真号：0755-25934593

**邮局汇款**

收款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  
收款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邮编：518001

**银行汇款**

开户名：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帐号：7705 5795 9990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红岭支行  
若通过银行汇款，请将汇款收据及您的详细邮寄地址一起寄回或传真至本刊发行部。

**邮寄方式**

平邮免费；挂号邮寄每本加收挂号费3元，  
半年挂号费18元，全年挂号费36元。





## 科学家称中国人比哥伦布更早到达美洲

• 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 / 2015.04.20

→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考古人员发现新的证据，证明中华文明比航海家哥伦布更早来到美洲。在美国趣味科学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该校研究人员欧文·梅森指出，他们根据在阿拉斯加埃斯彭伯格角出土的两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亚洲文物得出了上述结论。

去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研究称，北欧海盗在公元8世

纪最早来到美洲，其证据是研究人员在加拿大北极地区巴芬岛南部发现了几件文物。而梅森他们的发现则把美洲大陆被发现的时间确定为公元600年。

梅森研究小组在一栋有1000多年历史的房屋里发现数十件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的是一个搭扣和一个可能用作哨子的物件，搭扣上还残留着一小段有1400多年历史的皮带。考古人员

认为，这两件文物带有明显的亚洲特征，其中搭扣是用青铜制作的，而当时阿拉斯加地区没有人会炼青铜。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这应该是阿拉斯加地区村民与漂洋过海而来的亚洲人进行贸易留下的。梅森表示，“我们认为这里的村庄与中国、朝鲜或者（俄罗斯）雅库特的所谓‘大文明’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互动”。而历史事实也支持这种论断，因为青铜器在上述地区都有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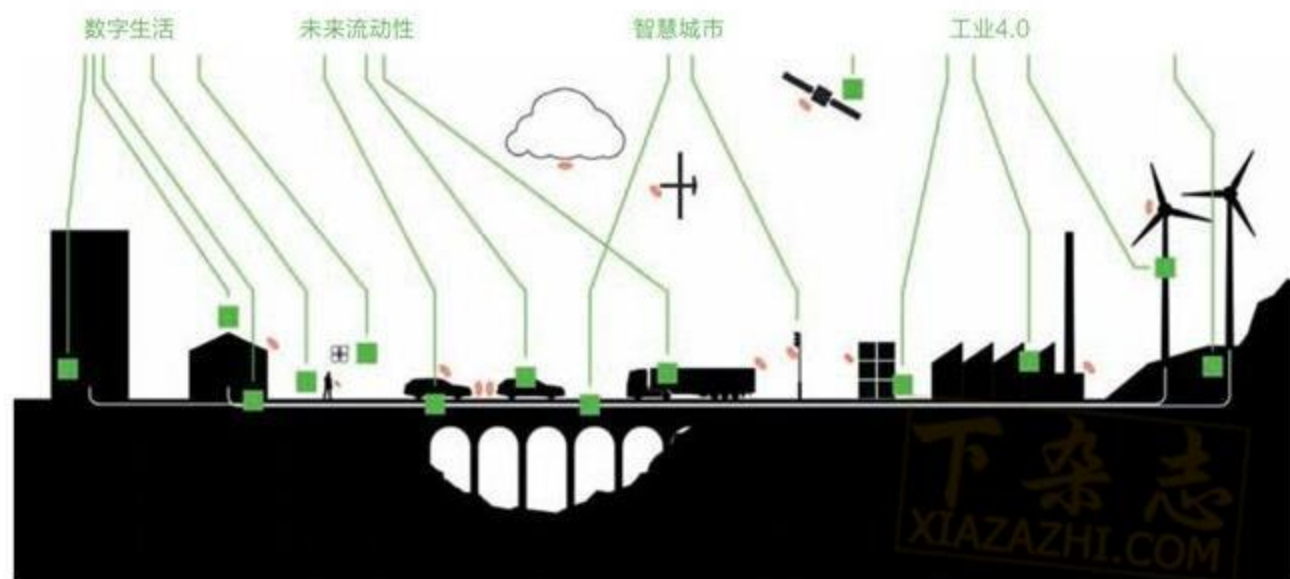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在这栋房屋里，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大量用黑曜石制

作的器具，这种材料的化学特征可一直追溯至俄罗斯阿纳德尔河流域。

所有这些发现都是长达一个世纪对阿拉斯加地区考古挖掘的研究成果，它证明亚洲人穿越白令海峡来到阿拉斯加，时间比哥伦布船队抵达美洲时间更早。这些考古研究从1913年开始，当时考古学家伯特霍尔德·劳弗表示，中国人为了获取象牙和海象产品曾经来过阿拉斯加地区。由此不少专家认为阿拉斯加士兵使用的盔甲与当时中国、朝鲜、日本和蒙古东部地区常见的盔甲有关。

## 物联网把世界变成巨大的神经系统

• 《朝鲜日报》/ 2015.04.21



###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指通过给各种设备安装感应器和通讯功能来认识周围的状况，并自动操作或者通过智能手机等进行远程操纵的技术。电视机、洗衣机这种家电产品，通过因特网彼此传递数据，可以为服务人类而自动操作，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 首先提出“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这个词的凯文·艾什顿表示：“物联网正在把世界变得像一个巨大的神经系统”。这就是说，就像人类用大脑分析感觉器官所接收信息的神经系统一样，电脑自己收集并分析数据的环境，就是物联网。

艾什顿近日为在4月21日于首尔LG CNS主办的IT (信息技术) 讨论会上发表题为“Entru

world”的主旨演讲而访问了韩国。他曾历任大企业干部、麻省理工大学 (MIT) 物联网研究中心特邀所长，现在正埋头于演讲和著述活动。

艾什顿1999年在生活用品企业美国宝洁从事品牌经理工作的时候，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当时，他发现受欢迎的口红，经常由于卖场没货而导致消费者买不到。

“虽然仓库有库存，但各个卖场不知道库存现况。我向高管们作

报告时说，应该在口红和卖场安装感应器来掌握库存，提出了‘物联网’这个词。为了强调不是在电脑，而是在事物 (Thing) 上加入电脑的功能，我使用了‘IoT’这个用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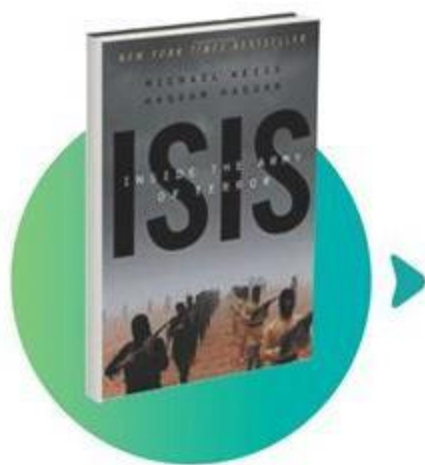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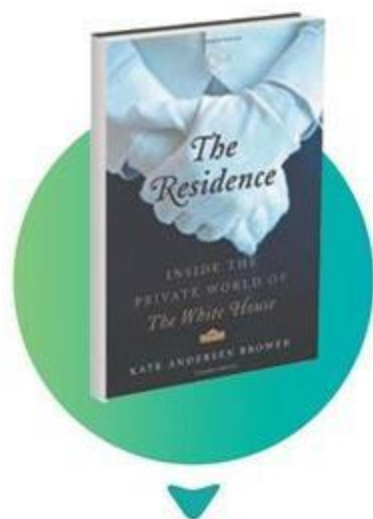
之后，物联网这个词开始被通用，指借助通讯技术将各个设备连接在一起的技术。就像可以通过远程开启和关闭与智能手机相连的电灯那样，利用物联网技术能够更为便利地控制许多设

备。艾什顿举了“好奇”号火星探测器的例子说：“在探测器上安装感应器，让它可以自主移动。借助‘好奇’号自主移动时收集到的数据，人类可以了解其他行星上的事情。像这样超越了地球的层次，扩张了人类的可能性，就是物联网的精髓所在。”

艾什顿预测，随着电脑的发展，物联网技术也会越来越快地发展起来。他说，电脑越来越快、越来越小，处理同样数量信息所需要的电力越来越少，这也加速了物联网的发展。今后将正式进入物联网时代的韩国，在哪个领域拥有强势呢？艾什顿选择了汽车领域。“无人汽车将成为物联网的主要适用领域。在电气、电子、汽车领域领先的韩国，占据着能够主导该市场的垄断地位。”

(蔡珉基)





## 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华丽监狱”

•《华尔街日报》网站，节选 / 2015.04.10

→ 白宫就像是《蒙娜丽莎》——你看到过如此众多的复制品，以至于它成了一种品牌。它与其说是一件实物，倒不如说是一个概念。就白宫而言，其载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照片、版画、圣诞树的装饰品、皮带扣、冰箱贴、纪念币、乐高玩具、日历、智力拼图、球形风景模型等。

尽管据称其建筑灵感来自都柏林18世纪的伦斯特宫，但白宫身上带有一种乡间庄园的格调。你会以为，这个地方的实质在其内部——当你盯着冷漠的窗户凝望的时候，你只能想象里面正在作出的拯救国家的决定或是酝酿着的阴谋诡计。里面的人能看到外面吗？它有着一种优雅而拒人千里的外表。哈里·杜鲁门曾称之为“这个伟大的白色监狱”，米歇尔·奥巴马说“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华丽监狱”。无独有偶，《官邸：白宫私密世界内幕》一书作者凯特·安德森·布劳尔自称，她创作此书的灵感来自于电视剧集《唐顿庄园》中那座代表着阶层分明、依

靠职责统治的监狱的虚构庄园。这部剧集中的人物包括一个家族和他们的仆人，不过我相信除非迫不得已，布劳尔是不会在书中使用“仆人”一词的。相反，大约96位全职和250位兼职的白宫勤务员是“官邸职员”——这是一种带有美国风格的平等主义委婉表达。

奥巴马总统曾说过：“我们在这里是房客。”这是一座房子，却不是家。游客们所看到的房间就像是样板间——过度的装饰透着死气沉沉，众多风格的杂陈显得品位皆无。置身其间，人们会感到一种如同机场贵宾休息室那样的非个性化的特权气氛。只有肯尼迪一家曾让白宫变得看上去有些魅力，也只有他们才愿意或者才知道这么做：他们曾在白宫举办音乐会和晚宴款待各界名人。

作者喜爱有关家务、家政的细节：希拉克林顿的洗发水、给南希·里根的法国瓷器盒除尘的精确步骤、为卡罗琳·肯尼迪寻找失踪的仓鼠、林登·约翰逊淋浴时对高水压的偏执要求、为白宫制作圣诞节请柬的三位书法家、甚至当天就

要清空的房间里的花卉摆放以及328号房间里古董床的整理等。在克林顿和布什任内在白宫工作过的贝蒂·芬尼说：“设法把那样的事情搞妥当，可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得有人去做，我们只是害怕做这种事情。”

细节源源不断。关于克林顿一家的第五章是这样开头的：“在总统和第一夫人的床上鲜血四溅。”这是一句巧妙的开场白，一个报业人士所谓的精彩导语。这次流血事件发生在莱温斯基性丑闻被公开之后不久。克林顿声称自己撞到了浴室的门上。不过职员们心知肚明。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非常确信，她（希拉里）用一本书砸了他。”

克林顿一家提供了道德败坏和诽谤的素材——其中某些东西是最庸俗却又最具娱乐性的。招待员斯基普·艾伦说，克林顿夫妇从未完全信任过官邸的员工：“他们几乎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疑的人。”结果，太多的丑闻被泄露了出去：旅行门、用林肯的卧室来招待出了大钱的捐款者、职员们给莱温斯基送了包装精美的礼物、希拉里骂克林顿“讨厌的畜生”、切尔西对特工处的特工们不依不饶，并称他们为“猪”。

## ISIS: 恐怖军队内部

•《纽约时报》，节选 / 2015.04.16

→ 如今，我们每天都能在报纸头条看到“伊斯兰国”

(ISIS) 的名字及其暴行——斩首、大规模处决、奴役妇女儿童、摧毁文化古迹。这个恐怖集团不仅席卷中东，把势力范围从伊拉克与叙利亚扩展到利比亚和也门，也在埃及和尼日利亚发展危险的新机构，继续娴熟地运用社交媒体招募外国战士。

ISIS的崛起如此之快，人们不禁会震惊地回想起，就在2014年1月，奥巴马总统还将它称为“低年级校队”，说它的威胁完全不能和“基地”组织相提并论。

从那以后，用来记录或研究这个组织的文字与图片就有如车载斗量。如今，一本新书把这些素材组织起来并进行阐释。尽管对于关注这方面新闻的人来说，书中许多内容可能是他们所熟悉的，但这两位作者聪明地把大量研究工作和自己对恐怖主义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成为条理分明、可读性强的叙事，帮助我们理解ISIS的历史与变迁，乃至它的特殊行事方式。

《ISIS: 恐怖军队内部》是由记者迈克尔·韦斯与哈桑·哈桑所著，该书建立在两位记者范围广泛的新闻报道之上，其中包括对ISIS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几十名合作者的访谈，这些人当中有宗教人士、战士、安保官员和ISIS的同情者。这本书堪称一幅逻辑严密的全景，令读者看到这个组织是如何在各式各样的前身基础之上发展起来，以及它在今日如何运作。

(MICHIKO KAKUTAN)



## 濒临破产的希腊坐拥欧洲“最大规模”军队

● 德国《世界报》网站 / 2015.04.16

→ 希腊应在公务员工资、养老金和社会福利基金方面大幅节省开支，以避免国家破产。而与此同时却一再透出有关新增军费开支的报道。比如，据称希腊政府目前正在为购买俄罗斯S-300防空系统导弹及其维护讨价还价。希腊国防部长帕诺斯·坎梅诺斯说，核心问题是替换导弹。部分防空系统已经过期。但他暂时并未透露投入的资金从哪里来。

北约成员国希腊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拥有俄罗斯S-300防空

导弹系统和美国“爱国者”反导系统。正如专家指出，系统必须定期维护，诸如电池等零件必须定期更换。S-300防空导弹的价格应该低于“爱国者”导弹，专家估计每枚约为100万美元。

尽管最近希腊在紧缩开支的背景下减少了新购武器的军费开支，但眼下却产生了维护大批高级军备的支出。例如希腊2014年秋天向莱茵金属有限公司订购了5200万欧元的坦克弹药：1.2万发120毫米坦克炮弹，用于希腊陆军的豹II主战坦克。该型坦克早于

2009年以前就已采购——为德国克劳斯-玛菲-韦格曼公司带来17亿欧元的巨额订单。但购买弹药却延误了数年。希腊陆军目前拥有353辆豹II坦克——先进坦克的数量比德国联邦国防军还多。

希腊武装自己主要针对的是邻国土耳其。两国间存在一种冷战。若按比例计算，人口约为1100万的希腊拥有13万军人，其军队规模以绝对优势位列欧洲首位。希腊拥有各型坦克约1600辆，其中也有很多老式豹式坦克。德国需要大约140万军人（实际人数为18万）和将近1万辆坦克才能赶上希腊的水平。

希腊的军费开支助推了国家的濒临破产。比如，从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例看，希腊几十年来的军费开支高于大多数欧洲国家。北约的数据显示，希腊军费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3.1%，而奥地利仅占0.8%。希腊在过去10年中进口了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军备物资。因此希腊在2005年至2009年间是全球第5大军备进口国。近年来德国企业尤其从中受益。

美国和德国是希腊军备物资的主要供应方，法国则位列其后。希腊所购军备物资中的31%来自德国企业，并且是德国联邦国防军武器库存的第2大买家。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将希腊造船厂打造成了地中海地区的现代化潜艇生产商。

## 中美海军在中国领土举行体育比赛

● 法新社，BBC / 2015.04.22



→ 在中国南海主权局势紧张背景下，两国海军在广东湛江举办了足球和篮球的友谊赛并举行派对，以致致力于为彼此建立互信。据法新社报道，4月21日，两国海军士兵之间的足球赛以中方3比1取胜告终，而美国海军则在篮球场上大胜对手；之后双方还在美军的“蓝岭”号两栖登陆指挥舰上举行派对。

据中国军网消息，这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旗舰是在4月20日抵达广东沿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基地，开始为期五天的访问活动。美国海军将领则在21日重申中方要为南海的紧张局势负责。

中国南海舰队负责守卫几乎全部被北京宣称拥有主权的南海区域，而在此区域与中国有主权

争端的亚洲国家当中包括了一些美国的盟友。不过，双方在交流活动过程中气氛友好，中国南海舰队司令员沈金龙和美军第七舰队指挥官罗伯特·托马斯还在派对中互相碰杯，并且切了一个有两国国旗图案的蛋糕。“我记得我还欠他啤酒”，法新社引述托马斯的话说。

中方军官登上了停泊在湛江

沿岸的“蓝岭”号参观，并与美军官员共进了一顿有番茄汤和意大利鸡肉三明治的午餐。在距离中国领土沿岸非常近的“蓝岭”号甲板上，美军人员手持M-16步枪巡逻，而在岸上，双方官员交流的气氛则十分友好。

中美两军近期加强了交流活动，而北京则在进一步宣示其在中国南海的主权主张，包括最近正在迅速进行的填海建人工岛工程，引起华盛顿关注。而美军第七舰队的朗·奥斯瓦尔德在提到中国南海局势时说：“我们在共同分摊这个区域，并且共同运作。”

另一方面，美军第七舰队所属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哈里斯在4月21日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个会议上作出了更严肃的评论。“中国要为南海日渐紧张的局势和挑衅负责。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南海会发生大规模的军力间的冲突，但我必须为此作好准备。”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 创业

下杂志  
XIAZAZHI.COM

Venture  
Week

International

Elites

In Suzhou

#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



汇聚全球智慧  
打造创业天堂



姑苏人才微信平台





## 攜帶行李乘客注意 Passengers with baggage

請留意行李標準及遵從職員指示

Baggage must be within the set limits.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station staff

每名乘客只可攜帶一件行李  
(或由數件較細小的物件合而為一)

其尺寸總和(長+闊+高)  
不得超過170厘米

而任何一邊的長度不得超過130厘米  
及總重量不得超過23公斤

Each passenger is allowed to travel  
with 1 piece of baggage

(or smaller pieces grouped together to make 1)

the total size of which must not exceed

length + width + height = 170cm

with the length of any one side not exceeding 130cm

and the total weight not exceeding 23kg

MTI



# 反水客组织调查

反水客运动的走偏引起各界的谴责，究其原因仍是水货客扰民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使得一些政治投机者藉此起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货客问题积怨之深。





# “一签多行”政策转变背后 香港“反水客”之争

记者/李克难 特约撰稿/凌德 徐全

**经**历多次“反水客”骚动后，从2009年开始面向深圳户籍居民的“一签多行”政策，被调整为“一周一行”。内地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在4月13日宣布新规。

这是该项政策施行五年多来的首次调整，其矛头显然指向困扰本港多年的水货客问题。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应内地与香港出入境口岸压力增大，赴港旅游人数与香港旅游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显现，中央政府才做此调整。

“水货”，即未经正式代理商进口的货物。多年来，陆港之间延续着组织人手将货物运往对面销售的传统，这些人被称为“水货客”，其实是搬运工。近年来随着“一签多行”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内地人开始从事此项工作，他们从本港各地购买各种商品，以人力方式将货物带过港深间的关口赚取扣除交通费后的差价。

随着内地游客的快速增长，本港这狭小拥挤的城市开始变得不堪重负。反水客运动的走偏引起各界的谴责，究其原因仍是水货客扰民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使得一些政治投机者藉此起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货客问题积怨之深。

2015年2月初到3月初，一波又一波的反水客运动在本港北部的元朗、屯门、沙田等地延烧。示威者高呼反水货走私的口号，却瞄准了所有来港购物的内地游客。示威中屡屡由言语暴力演化到肢体冲突，“港独”的口号、标语和旗帜频现。运动已远远偏离其声称的目的——打击水货客。

除去地区间竞争日趋激烈和外汇市场波动，业界普遍认为持续不断的“反水客”

运动已直接或间接影响旅客访港意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在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透露，内地赴港旅游人数在一连串反水客活动后已由升转跌。今年春节初一至初七与去年同期内地游客数相比下跌4.3%，从3月1日到12日，内地游客数量下跌13%，其中个人游跌幅近19%。在旅游团方面，春节初一至初七团数较去年下跌26%，3月1日至22日平均每日登记团数较去年同期下跌45%。

## 水货客改变当地生态引起民怨

游览本港，内地客人往往会买些港货。由于税收、商誉、市场定价等各种原因，大量在本港销售的商品对内地游客有着极大吸引力。到本港时采购一些名牌服装、电子产品、化妆品、奶粉、药品，甚至一些日用品，早已成为内地游客的必须项目。而水货客，正是为广大无法亲临本港购物的内地人提供港货的群体。

本港新界地区最北的市镇——上水，唯一与内地相通的轨道交通港铁东线在上水站分成两个方向，分别向罗湖口岸和落马洲口岸。深圳湾大桥通车前，这里几乎是本港人北上、内地人入港的必经之地。过去遍布农田的地方，今日已发展成为繁华市镇。因地理位置优越，上水被认为是本港受水货客滋扰最严重的地方。早在2012年秋冬季，陆续有多则数百、少则十多名示威者在上水站反对当地水货客泛滥。

在水货客盛行时，地铁上水站C出口旁的道路上，会有数以千计水客在车站内外交收水货。部分水客将拉货用铁车锁在

路旁铁栏，占用港铁“私家路”。水货货品百花齐放，包括奶粉、益力多、苹果手机、平板电脑、相机、婴儿纸尿裤、年货等。

3月27日的下午，《凤凰周刊》记者来到上水火车站。站口人流熙攘，要辨别出水货客、一般内地客、本港居民并不容易。车站二楼出口与一座大型购物中心相连的天桥上，两位妇女推着婴儿车迎面走来，车里没小孩，塞满了五六罐奶粉、三四排养乐多、几盒金莎巧克力，扶手上还挂着两大袋婴儿纸尿裤。也许是高峰时刻未到，也许是受反水客活动影响，上水站站口并没有出现传说中大群水货客携带大包小包货品堵塞站口的场景。即便是上下班高峰，仍然秩序井然。

水货生意的流行，近年来显著改变了上水。记者从火车站沿新丰路向石湖墟走，路两边店铺尽是药房和零食店，还有部分是专卖奶粉、大瓶装洗发精及洗洁精等日用品的贸易公司。据当地居民介绍，这里曾有的云吞店、文具店、五金店都已关门。一家正在转型中的店铺见证了水货客的影响，原本从事装修的铺头内，已放满货架变身卖奶粉。在记者所走过的一条道路的一侧，甚至出现连续开了七八间药房，中间只夹了一间金铺的场景。

据“北区水货客关注组”统计，从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短短半年间，石湖墟内针对水货客和内地客的店铺快速增加。其中，药房由34家增长到43家，货币兑换店由23家增长到31家，化妆品店由3家增长到7家，

右图 2015年4月13日，香港，在上水地区采购的客人，街边一名药店员工在摆放纸尿裤。当天起，深圳市居民赴香港“一签多行”签注改为签发“一周一行”签注。





## “个人游”涵盖的内地城市



# 49

“个人游”计划(下称“个人游”)于2003年7月推出,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下的旅游开放措施。最初涵盖广东省4个城市,在2003年7月至2007年1月期间逐步开放至其他城市。自2007年1月起,涵盖的内地城市维持在49个,包括广东省所有城市、泛珠区域主要城市,以及北京和上海等直辖市。

### 广东省

- 2003年新增的城市:  
东莞、中山、江门、佛山、广州、深圳、珠海和惠州
- 2004年新增的城市:  
汕头、潮州、梅州、肇庆、清远、云浮、湛江、韶关、河源、茂名、阳江、揭阳和汕尾











2012年8月31日，俯瞰上水车站前空地，一名港警要求水货客们留出给予行人通过的通道。

水货专门店更是由7家增长到26家。

当地店铺租金，受水货客冲击不断上涨。在上水的“棺材街”，过去十年间铺头租金由每月八千元增加到七八万元，一些地段的店铺租升到每月20多万元后都有人争抢。服务于本地市民的店铺，由于付不起高昂的租金纷纷关门，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于“自由行”旅客和水货客的店铺。一位市民向《凤凰周刊》记者诉苦，自己以前下楼就能买到的日用品，现在要步行20分钟以上才能买到。当地一些日用品如洗头水、药品、奶粉等，近年来价格也几块几块地上涨，居民将其归咎于“自由行”和水货客。

## 谁是水货客

不见货物，只见纸箱，这是水货专门店的最大特色。为方便水货客携带，店员会把水货以纸皮箱或胶袋包装好。在石湖墟，这些专门店大部分集中在一条俗称“巷仔街”的小巷内，该巷长约50米，阔度仅够两个人过，塞满了水客。

临近农历新年，最受欢迎的水货不外乎金莎朱古力、蓝罐曲奇及奶粉。每箱或每包水货均是“明码实价”，例如两罐蓝罐曲奇饼是“200+20”，前面的数字是买货价，后面是走水货报酬价。水客先付200元买入水货，把水货带到深圳罗湖某指定地点时就可收到220元。这种“曲线买卖”运送方式，令本地居民或“自由行”内地人都可随时加入。

本港地域空间狭小，街道狭窄。每当水货客集中流动，大包小包容易导致交通要道堵塞，特别是在交通高峰期的公共交通站点，造成普通乘客等车时间延长。本港对客运巴士、小巴携带行李都有明确限制，水货客往往不顾规定登车，造成车内拥堵。同时，水货客换装行李时容易留下大量包装垃圾。以上所为，带来很大民怨。



## 内地客改变香港经济

### 2004年至2013年的零售商店数目

非专门货品 -29.5%  
(一般粮油食品和家庭用品)  
书报及文具 -25.4%

数目  
减少

数目  
增加

以内地访港游客为对象的购物商场和商铺数量激增，他们争相售卖深受内地旅客欢迎的高档产品和日用品。而一些照顾本地居民需要的小型店铺则迁往其他较偏僻而租金便宜的地区。

数据来源 香港统计署及旅游发展局等

+1500% 化妆品及个人护理用品  
+41.5% 成衣及鞋类  
+32.9% 皮革制品  
+30.5% 珠宝首饰及手表  
+21.6% 影音及摄影器材  
+4.7% 食品  
+4.7% 药物、健康补给品及中药

### 2004年至2013年零售业总销货额及商铺租金

由于商铺供应紧张，加上零售业因受蓬勃的访港旅游业带动而持续畅旺，零售铺位的租金因此在2004年至2013年期间平均上升69.4%。



数据来源 香港统计署及旅游发展局等



化妆品及  
个人护理用品  
商店数目激增

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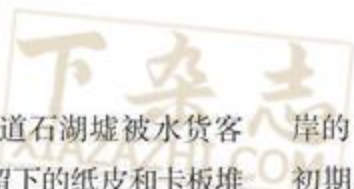
### 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之间在石湖墟与“个人游”计划有关的商店数目



数据来源 北区水货客关注组







本港《明报》曾报道石湖墟被水货客垃圾包围，处理货品时留下的纸皮和卡板堆积如山。食环署数字显示，单是2014年第4季，执法部门便向非居港旅客发出914宗丢弃垃圾的罚款，其中多达38%过期未缴，累计金额达42万元。

每日活跃在港深各口岸的大约两万水货客中，有相当部分是本港人士，但关于港人和内地人的比例并无确切统计。按2013年3月保安局局长梁国栋的说法，内地人占4成，港人占6成。今年3月，梁国栋称单由违反限奶令案件的数量看，内地人占65%，港人占35%。但从内地执法部门的案件数量上看，港人比内地人多。此表态，曾让部分立法会议员质疑政府没有陆港水货客比例的数字。

既有内地自由职业者、“自由行”游客，也有不少本港中下阶层市民或退休人士加入带货行列。社民联议员梁国雄曾于2004年支持一众水货客反对铁路公司封锁一条通往罗湖的水货通道。他打出“不受综援，自力更生”的旗号，反映出参与走水货的人士大多属社会较低收入阶层。

走水货违法吗？按照本港《入境条例》，任何以访客身份入境的人士如违反其逗留条件，包括未经许可接受雇佣工作，或开办参与任何业务，即属于违法，经定罪将受最高罚款5万元、入狱两年的刑罚。因此，以“一签多行”方式进入本港的内地人进行水货活动属于违法，而本港人士则是合法的。

执法部门只能以阻街、违反卫生规定、违反物业使用规定等方式进行制裁。但无论本港人还是内地人，未按规定申报便将货物带入内地，则触犯内地法律对走私的规定，属于走私行为。

实际上，水货贸易历史悠久。据深圳海关记载，陆港间的水货贸易最早能追溯到清末。在上世纪20、30年代，活跃于罗湖口

岸的“水客”数量便达3000多人。198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开始对外开放。内地闭关自守经年，民间消费物资非常缺乏，本港市面上的消费物品由手表、计算器至大型电器如电视、雪柜等，皆在内地大受欢迎。本港水客也即时乘机而起。

在深圳地区，当时的东门市场已经是非常出名的物品集散地。本港水客离开罗湖检查站后，附近的小店已有人安排收货。那时每名水客过关时往往会带两条烟和一瓶洋酒，这样可赚取40港元。若再在身上带有其他物品，每一次上行大约可赚到100港元；每天两次计，可以赚到200港元左右。同时代，一般本港工人平均月薪为1500港元。水客的收入令人羡慕，但当时做水客入行必须有人介绍，所以并非一般人可以做得得到，而且当时行内非常团结，水货集散都有规矩。

风水轮流转。1990年代初期，水客开始改变运货方向，由从前将本港物资运至内地套利，改变为由内地转运物资到本港牟利。当时，最常见的走私货是副食品如鸡鸭和猪肉。由于本港猪肉价格与内地的差距高达三倍，一些内地人安排将每天已屠宰的内地猪只偷偷运到本港当本地生猪出售牟利。

由于水客多是港人，规模也不大，不足以影响本港市场供应和社会秩序，故两边政府一直没采取强力打击措施，水客市场多年来一直相安无事。转变来自于“自由行”闸门的开放。

### “自由行”繁荣了经济，却超出旅游承受力

在每年数千万人次的访港旅客中，水货客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但水货现象的流行，与“自由行”政策的开放步步相关。

2003年非典肺炎一役给本港经济带来重创，商店大都门庭冷落。为渡过难关，

北京方面启动港澳“自由行”，给本港带来不可忽视的经济收益。当年，由于人民币兑港元汇率不断升值，吸引了大批内地旅客前赴本港消费。一些水货集团眼见有利可图，开始组织专业的带货者赚取差价盈利。

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降临本港，为刺激本港消费市场，广东省开放一日多行，情况进一步丕变。根据规定，“一签多行”等同于一年无限次往返本港，深圳232万户籍居民中，除12万公务员等国家登记备案工作人员外，其余220多万户籍居民只需要100元签证费用就可以享受一年内无限次访港。又因为价格及食品安全问题，愈来愈多内地人利用“一签多行”措施参与走水货。

事实上，“自由行”与“一签多行”政策带来的并非只有水货客问题，也许更重要的是带给全港整体旅游业与零售业的结构转变。在十三亿人口的潜在需求下，立法会2014年5月发出的关于“个人游”计划的研究简报公布的一串数字相当惊人。

报告显示，从2002年到2013年，全港接待游客数量逐年快速提升。从2002年的1660万人次，上升到2013年的5430万人次。在这大幅度提升中，“自由行”所带动的内地游客增长居功至伟。

“自由行”政策从2003年开始实行，到2007年扩大到49个内地城市，再到2013年，内地游客占有所有访港游客的比例从41.2%上升到75.0%，从638万上升到4075万。采用“自由行”方式来港的内地访客逐年增多，从2003年只占内地游客中的7.9%，提升到2013年的67.4%。

买买买——看似永远是内地游客来本港的主旋律，他们也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游客显得更加豪气。立法会研究简报中统计指出，在2013年一个过夜的“自由行”旅客每日平均消费3593港元，而一个非内地过





2015年3月22日，香港上水，有水客大本营之称的上水晋科中心，内地批发商在这里租下仓库后作为集散地，然后派货予水客。

夜旅客每日平均消费1970港元。

在不断增加的“自由行”访港旅客中，相当多的人并不在本港过夜，这些不过夜游客几乎只是为了“血拼”。因为该报告2013年的数据显示，购物消费占了过夜“自由行”游客在港消费的72.9%，不过夜游客93.1%的消费都被用于购物。2009年开始的“一签多行”使得不过夜旅客的数量不断增加。到2013年，透过“一签多行”来到本港的旅客占到不过夜的“自由行”旅客中的62.4%，即所有“自由行”旅客中的40.5%。

“自由行”的开放，使本港零售业产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自由行”旅客购物开支在本港零售业总销售额中的比例，从2004年的9.6%增长到22.2%。零售店铺的租金在由内地游客所带动的消费下不断上升，从2004年到2013年之间上升69.4%。从2003年第1季度到2013年第4季度，在内地客最常光顾的铜锣湾、旺角与尖沙咀，优质街铺租

金上升了3.2倍、1.8倍和3.7倍。铜锣湾一些店铺租金达到一个月50万到60万港元。

租金的上升迅速改变了当地零售业的格局。以内地顾客为目标的商场店铺激增，争相售卖内地顾客大量购买的各种高端商品和日用品。如从2004年到2013年间，珠宝首饰与手表零售店数量增长30.5%，成衣与鞋类店铺增长41.5%，而化妆品和个人护理用品店增长了1500%。一些服务于本地居民需要的店铺，无法支付高额租金而不断倒闭或迁往较为偏僻的地段，例如书包文具店铺在同期减少了25.4%。

“自由行”为本港带来的经济繁荣是明显的。根据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2013年发布的《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评估报告》估计，在2012年“自由行”为本港经济贡献了261亿港元的增值，相当于GDP的1.3%，提供了114280个工作机会，为本港零售业贡献852亿港元。

但随着游客来源过于单一、游客数量逐渐饱和，负面效应日渐突出，对“自由行”政策与“一签多行”进行检讨已成为相当一部分本港市民的共识。立法会简报提到，由欧盟委员会所委托希腊爱琴大学所作的一项研究建议，应将社会承受能力列入一个城市旅游承受能力和旅游业规划的考虑之中。

2013年1月末，“新起点”社团在上水地铁站访问500多名新界北区居民。98%的受访者认为水货客影响社区生活，100%的受访者不满政府持续容许“一签多行”的政策，57%的人认为政府只用官腔敷衍了事。

2013年2月，北区区议会做了“自由行”旅客和水货客对北区局面影响的研究：只有7%的居民对“自由行”和水货客持有正面评价，如果以10分为满分，对“自由行”旅客和水货客评分只有3.4分，64%的居民希望未来收紧“自由行”政策。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近期面向全





2014年10月28日，深圳，下午5点，大批一日多次往返香港的旅客在福田口岸接受海关检查。在等候检查区域，有不少旅客携带大量行李货物。

港范围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54.8%的受访者不认同反水客行动，但63.3%的人认为本港旅客已经超过其承受力，62.6%的人认为“自由行”已造成生活不便，66.7%的人认为应该收紧“自由行”，70.4%的人认为应该取消“一签多行”。

据《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评估报告》预计，若此前的游客增长趋势持续下去，香港年游客人次将在2017年增加至七千万，而保守估计将在2023年超过一亿人次。

“与商家对内地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做出迅速反应不同，港府做事拖拉，对旅游业的发展并没有清晰的规划和预见。”

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吴木銓认为，香港旅客承载力不足，港府要负最大责任。“例如市民抱怨游客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与游客只集中在十八个区中的五个区有很大关系。”

如何分散人流、减轻区域负担，吴木銓

的建议是区区都要有自己的旅游品牌和项目，形成多元化的旅游产业。许多人提出过类似建议，但并不看好本港能在短期内改进，因为港府一直忽视对旅游业的监管和服务。

“政府至今没有一个旅游业的规管机构处理相应的问题，更谈不上对旅游业的发展进行长远规划。”

本港旅游发展局是一个推广机构，旅游业议会是行业机构，二者都无权行使政府职责。港府内部的旅游事务署，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工商及旅游科辖下的部门，它负责统筹政府内部各项发展旅游业的事务，其行政能力极为有限。

## 朝野对峙，政治僵局难建治理共识

“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无止境地扩充我们的基础设施，是否有钱赚，就要继续接待2亿的游客，甚至3亿呢？”

立法会会计界议员梁继昌在3月25日、

26日举行的立法会辩论中如此疾呼。而在他之后发言的代表旅游界的谢伟俊议员，则呼吁不要因为“自由行”的弊病而变得闭关、排外。

“任何政策都有利弊，当我们要享受旅游政策的时候要承受其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如果只是针对政策，不从全面来权衡，那么会很容易陷入到以种族的角度、本土的角度，这不是我们要走的方向。”

由代表批发及零售业的自由党议员方刚提出，主题为“平衡旅游业对本港经济和市民的影响”的立法会动议尽管没有法律效力，但由于水货客、“自由行”等问题的备受关注，成为了两天，整整六个小时立法会辩论的主题。然而，除了应当解决水货客泛滥问题，各党派间对如何调整“自由行”政策，如何看待“反水客运动”等问题则有很大分歧。

方刚认为，反水客参与者暴力对待妇女、小孩子和长者该受到谴责和法律制裁，但一直不重视反水货客问题的特区政府才是“罪魁祸首”。方刚还提出五点建议：向过境游客征收多次往返税费；在多个口岸增设边境购物城以分流旅客；优化“一签多行”，减少来港次数；逐步加大商业面积；依法处理骚扰游客和本地市民的人士。

针对方刚的五点建议，11名议员提出修订，40名议员针对方刚议员的建议和各党派的立场进行发言。

第一，对于向过境游客征收税费的建议，不少议员认为不妥，这可能导致内地方面以对等原则向本港居民征收过境税费。

第二，在边境修建购物城的建议，大部分都表示赞成，而激进泛民议员则表示反对，认为其难以发挥效果，分流内地游客的想法容易产生针对内地人或本港人的歧视。而本土派泛民议员则极力反对一切加强陆港交流的政策，认为“自由行”和“一签多行”



是梁振英促进深港同城化的步骤,而深港同城化将使得本港失去其核心价值。

第三,如何调整“一签多行”政策,几乎所有议员都认为应该调整。较激进的泛民议员认为应立即取消,较温和的泛民政党如民主党以及建制派政党则认为应改为一签数行,减少过境次数。亲建制派议员多强调其对本港经济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让本港从两次经济危机威胁中走出,且“自由行”是在本港困难时向中央索取,现在又要向中央要求调整,恐影响中央对本港的信任。

第四,加大商业面积,泛民则多强调本港游客数已远超社会承受程度,不应再一味扩大,不希望香港只剩商场和旅游店。

第五,对于反水客运动中的骚扰行为,建制派议员无不谴责示威者的暴力,并要求将违法者绳之以法;泛民议员则极力批评政府的不作为,并将矛头指向特首梁振英本人。数位泛民议员指梁振英因在促成2003年开放“自由行”中起重要作用而被称为“‘自由行’之父”,但他不顾本港状况,盲目推行与内地的融合,又不及时调整政策。作为回击,建制派议员质问泛民议员,为何在修订案中删去指责反水货客示威者暴力行为的词句。建制派进而指责泛民派从“占中”开始便煽动年轻人违法,致使其价值观念颠倒,这是出现暴力反水客的根源。

冗长的议会辩论后,方刚议员的议案最终被否决。尽管如此,本港还是等来了深圳方面将“一签多行”调整为“一周一行”的消息。用于分流水货客的落马洲边境购物城,正处于建设之中,2013年黄定光议员提出这个方案。购物城预计今年开业,但近期消息称由于手续较预期复杂,原定今年“十一”开业将延迟至圣诞、元旦档期。

“占中”运动后,部分泛民议员时常以“拉布”表达其对港府的不合作态度,不惜

让立法会运作陷于瘫痪,致使越来越多议程被拖延。2月中旬,泛民议员以各种方式拖延会议时间,使创新与科技局拨款未能获得通过。而在近日邻近立法会正式审议财政预算案之时,激进泛民更是提出了将近4000项修订。这般朝野对峙的背景下,难以乐观见到本港对于“自由行”、“一签多行”政策、控制水货客的执法将有更进一步的调整措施出台。

### “风沙行动”收效有限,“一周一行”有待观察

游客和水货客带来了上水市场的繁荣,但昔日的宁静和安逸逐渐消失,当地居民对水货客泛滥状况相当不满。随之积累的怨气,并非没引起港府反应,但收效甚微。

早在2012年9月15日,过百网民响应社交媒体号召,发起“光复上水”行动。当月19日,本港政府公布打击水货客新措施,包括加强对水货客阻街的执法;派人于罗湖、落马洲两关口收集情报;检控违反逗留条件的双程证人士;食环署增加人手处理水货客带来的卫生问题;地政署和消防处加强巡查被用于水货集散活动的工业大厦;港铁在东铁线数站限制每名乘客携带货物重量不超过32公斤。

另外,联合本港警务处、本港消防处及入境事务处多部门的“风沙行动”启动,搜查从事水货贸易场所,拘捕相关内地人。至2015年3月12日,“风沙行动”拘捕了1985名内地人和14名本港人。214人被提起检控,大部分已遣返内地处理。执法部门还不断将被怀疑从事水货活动访客的资料放入“怀疑水货客监察名单”,便于入境时重点截查。

因应当局的措施,水货客也改变策略,采取“蚂蚁搬家”方式,以每次少量携带、多次出入境的方式带货,每转可以赚取约100港元。他们通常都报称货物为少量及自用,如果

海关人员无怀疑,即无须付出关税。

至2014年,水客问题变本加厉,由上水延及粉岭、大埔、屯门、沙田、荃湾等多个地区。临近2015年农历新年,港货愈抢手,水货问题亦愈见严重。携带一箱又一箱奶粉、曲奇、朱古力的人,仍然在各地区大街小巷穿梭。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在“一签多行”调整之际宣布,中央政府将继续支持特区政府发展旅游业,坚决反对香港极少数人伤害两地民众感情的行为。“‘一周一行’政策是针对水货客、水货活动的,我们要区分开来每周来香港多于一次的水货客,不表示我们不想做旅游业的发展。”梁振英亦在同日强调,他感谢了中央政府、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

“一签多行”改“一周一行”,效果似乎立竿见影。近日,北区区议会主席苏西智表示,“一周一行”实行后,北区拖篮人流已明显减少。北区区议员刘国勋说,上水晋科中心原为重要水货分货中心,近日已经平静许多,相信与新政策施行有关。

刺激消费的“五一”黄金周即将到来,许多人在肯定新政策之余,亦表达担忧。议员方刚则预计药房生意会首当其冲,但他认为零售业付出必要的牺牲是值得的。旅游发展局局长林建岳认为,新政策对访港的过夜旅客量影响不大,但对零售及饮食业的影响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显现。旅游业议会主席胡兆英,预计“五一”期间访港内地游客数字上升无力,他感觉到业界普遍不小的经营压力。

一般居民似乎对政策的改变相当欢迎。民建联北区支部于4月15日至17日期间访问370名北区居民显示,72%受访者认为“一周一行”有助解决水货活动问题;63%的人对“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感到满意;而69%的人认为,“一周一行”会减少正常内地游客来港的数目。



**北区区议会主席苏西智表示，“一周一行”实行后，北区拖篋人流已明显减少。北区区议员刘国勋说，上水晋科中心原为重要水货分货中心，近日已经平静许多，相信与新政策施行有关。**

新政策也在催生水货客的新生态。

本港《东周刊》报道，“一周一行”最近已重挫本地宾馆业。不过，水货客也有策略应对。福田口岸有多家旅行社、找换店和便利店向外以一两元的价格贱售“L签”。

“L签”即大陆团队游签证，通常为无“自由行”资格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向海关人员出示，证实其为团队游旅客。在施行“一周一行”后，这样的签证多了很多客源。

本港《星岛日报》报道，“一周一行”消息发布后几小时，香港社交网站上就有人贴广告招聘大量水货客，标明“成年即可，日薪平均600（港元），日日都有工作，每日工作数小时左右”。“限制深圳人一周一行，

结果水货变成香港人垄断。”

吴木銓则建议可以效仿新加坡的做法，给水货客登记身份以改善边境通关的安排，以解决只反大陆客不反香港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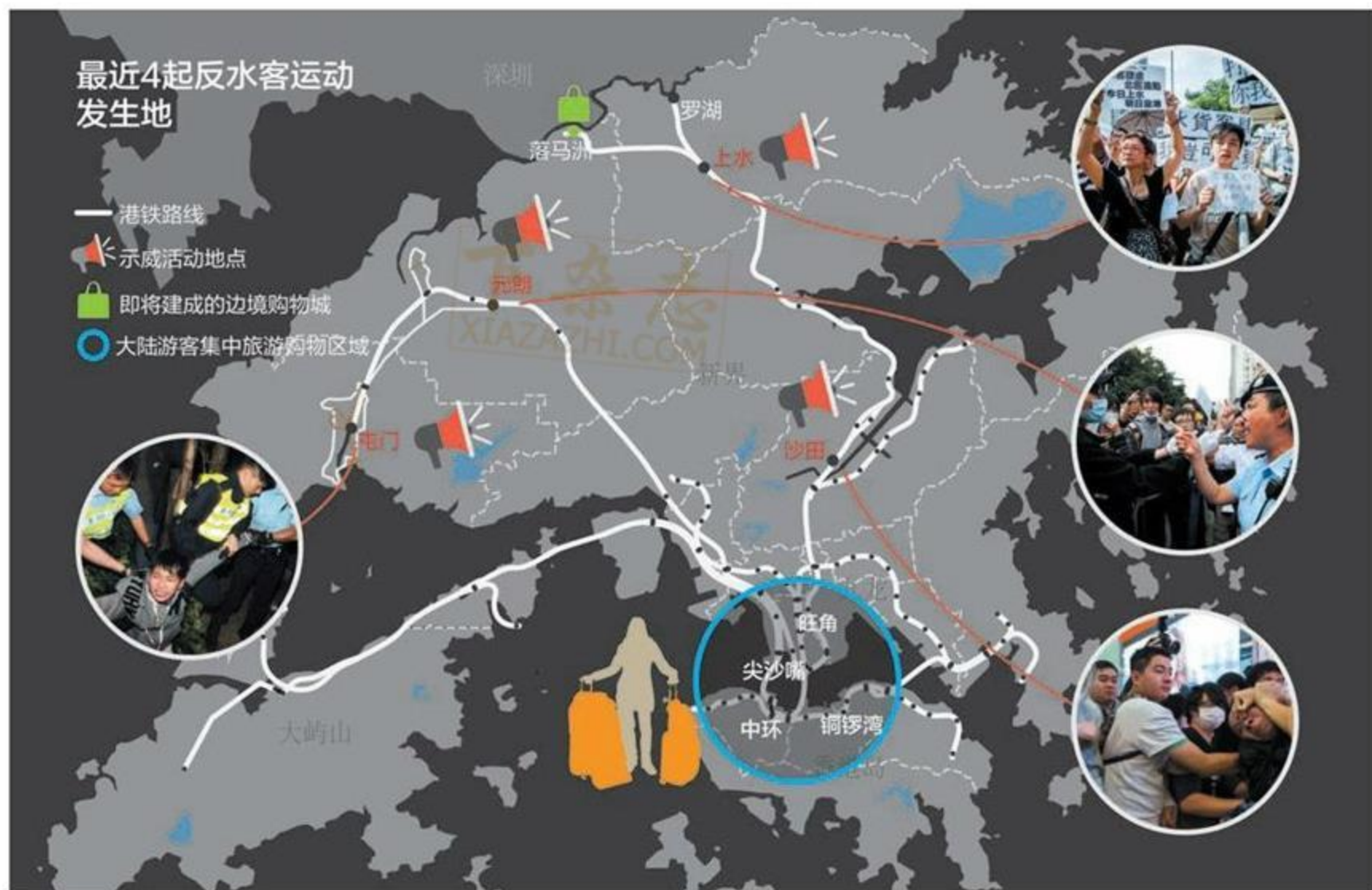
“从单日过境的次数以及每次过境所携带的物品数量、种类，就可判断出一个人是否为水货客。如果有相应的登记法例，则未登记是违法的，这会促使水货客主动登记。登记完成后，每天出入境高峰时段禁止水货客通关；平时则延长水货客通关时间。当水货客的时间成本上升了，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也就相应减少。”吴木銓分析。

尽管“一签多行”调整只是开始，但面对内地巨大的需求市场，本港面对庞大内

地游客和水货客的压力似乎不可能完全改变，调整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何调试出平衡经济与民生的政策，仍需朝野增进共识，形成合力，避免激进团体利用民生话题，撕裂香港社会，破坏陆港关系。

《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文章，直言水货客中有60%是香港人，故“一周一行”不见得能彻底遏止水货交易，两地政府到时再出新招是正常事。

新政策施行后的第一个周六，深圳湾口岸出现少有的人满为患场景，过关需等候一个半小时。“一签多行”签证未到期者要抓住最后的生意机会，本港因而面临政策转换下争抢“末班车”的压力。





# 香港旅游业 “内地化”

## 2013年“个人游”游客的行程表

### 过夜“个人游”游客

#### 想要前往的地方

海洋公园  
迪士尼乐园  
山顶  
星光大道

#### 购物清单

化妆品及护肤品  
现成服装  
食品  
药品及中药  
皮革制品  
珠宝首饰及手表  
电器/摄影用品



### 不过夜“个人游”游客

#### 购物清单

化妆品及护肤品  
现成服装  
食品  
药品及中药  
个人护理用品

# 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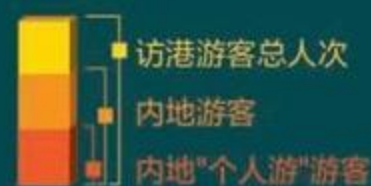
过夜“个人游”游客的最大开支项目是购物,在2013年购物占他们在港消费的72.9%。在不过夜“个人游”游客中,相关比例更高达93.1%。

数据来源 香港旅游发展局

#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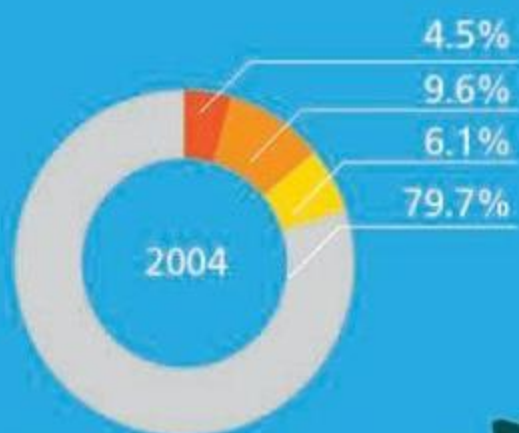
随着“个人游”的推出及逐步放宽,近年内地访港游客人次不断上升。2002年“个人游”计划未开始前,香港接待的游客达1660万人次,其中41.2%来自内地。在2014年,访港游客数字已飙升至6080万人次,当中78.0%来自内地。

## 历年访港游客人数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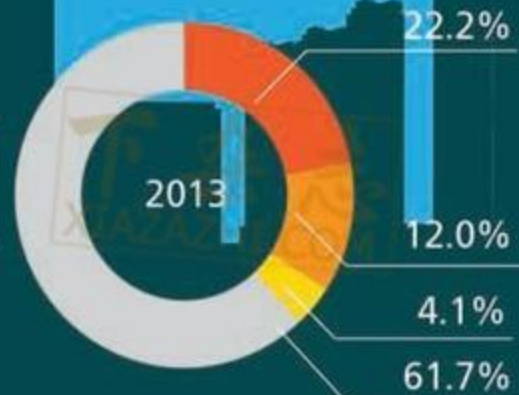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香港统计署及旅游发展局等





## 游客及香港居民购物开支 (占零售业总销货额的百分比)

- "个人游"内地游客
- 非"个人游"内地游客
- 非内地游客
- 香港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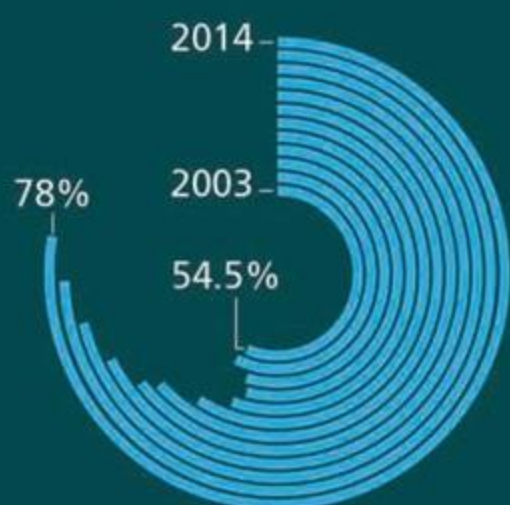


# 22.2%

以"个人游"游客购物开支估算他们对零售业总销货额的贡献,"个人游"游客的购物开支占零售业总销货额的比例在过去10年平稳增长,由2004年的4.5%(首个录得的全年数字)增至2013年的22.2%。

数据来源 香港统计署及旅游发展局等

2003年至2014年内地游客  
占访港游客总人次的比例







2015年2月15日，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反水客的示威者围堵内地游客，并高叫口号：“滚回家！滚回家！滚回家！”

## 解密反水客运动组织

像一群蛮牛在追逐，暴力行为注定边缘化

记者/李克难 特约撰稿/凌德

“——群群人恐吓我，问我这些是不是水货？我说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然后他们就围着我，不给我离开。”73岁的本港老人家李伟权，回想起3月8日的情景时仍心有余悸。

退休多年的李伟权，每天会到家附近的屯门公园和朋友唱歌。3月8日，李伟权一如以往到公园唱歌。晚上7时左右，天开始入黑，推着一箱音响器材回家的李伟权在途中遇到约十名反水客的示威者。他们一看有人拖着一箱东西，就跑过来围着他，质问

他是不是水客。

见形势不对劲，老人立即拿出一根胶管，大声喊：“你们有种就单对单和我打架，不要人多欺负人少。”示威者不理睬，有人甚至伸手拉扯他的衣服。李伟权一个不留神，被推倒在地，用来自卫的胶管也丢了。老人一肚子火，站起来取出另一支胶棍，准备和对方厮打。两三名警察匆匆赶到，分开双方，并劝李伟权冷静不要冲动。老人气愤答道：“我被人打了你们才来，真是马后炮！”

从2月8日到3月8日，本港连续四周发生

反水客游行。一个技术性的社会管理问题被政治化，成为部分极端团体的表演舞台。部分示威者遇见疑似内地游客或水货客便谩骂攻击、动手动脚，与不满其行为的居民、警方发生口角及冲突，甚至脚踢像李伟权这样的本地老人家，或者吓哭无辜幼童。从上水到元朗、从屯门到沙田，所到之处店铺纷纷落闸，避之不及，游行队伍混乱如同战场。

### “因‘暴动’暂停营业”

“政府若不限制‘自由行’和取消‘一





2015年3月1日，元朗警方在驱散非法集会的反水客示威者时出动了胡椒喷雾，当日有31男2女被捕。

‘签多行’，这种示威活动一定会持续下去。”策划数次游行的“热血公民”成员郑松泰，每次接受记者访问时都强调近年本港水客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示威活动主要是针对水客。但是，从2月到3月的一系列反水货客行动，将目标扩大成对准一切内地游客，即使其中只有极小部分是真正的水货客。实际上，相当部分水货客是本港居民。

“热血公民”成立于2012年2月，是本港第一个本土派政治组织，以黄色为标志。该组织宣称无名义上的领袖，其成员事实上奉1979年出生的黄洋达为领导人，主要领导者还有陈秀慧、郑松泰和张珈衍。该组织从创立开始便积极参加“占中”在内的本地社会运动，曾多次于湾仔循道卫理堂外行人路举行所谓“全面制宪运动”，焚烧基本法，被反“占中”团体蔑称为“热狗”。

黄洋达做过编剧、小说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2012年3月因在立法会替补机制争议中协助冲击立法会，被判入狱3周。当年7月，他借助另一激进泛民团体“人民力量”参加九龙东地区立法会选举，败选后声称与“人民力量”划清界限。

另一个反水客急先锋组织“本土民主前线”，成立于2015年1月，以蓝色为标志。1993年出生的黄台仰是它的发言人，他曾在“占中”后期因多次违法行为而被逮捕，现

**“本土民主前线”  
提倡“以武抗暴”的理念，  
倡导其成员参加运动时  
戴上头盔，装上护甲，  
“热血公民”则没有这样做。**

正身负包括组织非法集会、非法集结及破坏社会安宁等四项控罪。黄台仰向本港媒体介绍，其正式成员约50人，参加者从未成年人到三四十者，有大学生，有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也有中产。

与“热血公民”相比，他们思想方向一致，区别在于做事的方法。“本土民主前线”提倡“以武抗暴”的理念，会倡导其成员参加运动时戴上头盔，装上护甲，“热血公民”则没有这样做。其官方网站上大篇幅介绍马尔科姆·X，这是与马丁·路德·金同时代的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者、民权运动人士，他支持黑人的暴力抗争。该文章称泛民主派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动过于追求非暴力，而抗争运动不应为自己设置底线，应使用一切“必需”的手段。

运动最先在2月8日爆发。在黄色的“热



2015年3月1日,参与“光复元朗”的“本土民主前线”示威者在寿富街一间奶粉批发城外打出标语。

血公民”旗帜和蓝色的“本土民主前线”旗帜的簇拥下,约400名游行示威者面戴口罩,沿途高叫“取消‘一签多行’”、“打击水货走私”及“大陆人饮中国奶”等口号行进。途中见到一个内地游客便围上去大吼“返大陆”、“中国人用中国货”,向游客竖中指,辱骂十多分钟后方可罢休,继续往前行进。沿途商店为免受冲击,纷纷落闸。

游行队伍从西铁线屯门站出发,向来往屯门与深圳湾巴士总站的跨境巴士竖中指,后又行至药房林立的新墟仁政街,有人与示威者发生口角及冲突,被警方阻隔。此后示威者分为多批,一批前往VCity,一批欲进入其申报路线中未有的屯门市广场。警方打出“停止冲击,否则使用武力”的红色警示,随后释放胡椒喷雾驱散。

下午,示威者转至屯门时代广场,再次与阻止示威者进入商城的警方发生冲突。示威者不理睬警方打出的红色警示而向警员投掷杂物,警方则以警棍和胡椒喷雾回击。一位警员被拉入游行队伍,遭人围殴致使头部受伤昏迷。经过一番对峙,示威者最终冲入商场,致使多家店铺落闸,顾客被困于店内。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直到午夜后,示威者逐渐散去。此役警方共逮捕13人,年龄介乎16至74岁,十人被检控涉嫌非法集结、阻碍公务和袭警等罪名。

一周后的2月15日,200名网民在脸书专页“光复本港,捍卫本土”鼓吹下,发起另一个名为“捍卫沙田”行动。经历过“光复屯门”一役后,警方此次布下500名警力严阵以待,并向示威者警告,如向店铺和顾客作出滋扰行为,将果断执法。当日早上7点30分,警方上门拘捕了“本土民主前线”的主要组织者和发言人黄台仰,后于当日晚释放,以减弱当日即将发起的“光复沙田”中该组织的活动能力。此次活动示威者只有两三百



人,而维持秩序的警力即约有其两倍之多,还有至少50名商场保安和物业管理人员。

运动的“主战场”集中在沙田新城市广场这家老字号大型购物中心中,这里高档店铺云集,亦是沙田面向内地客的重要商业中心。示威者高举“驱除蛮夷”及“‘自由行’正衰人”横额,高呼“本港独立”、“取消‘一签多行’”及“回中国消费”等口号,指骂在商场中购物的内地游客为“卖国贼”“国耻”,要其“返大陆”,引发部分游客与示威者发生冲突。有女游客在服装店

内受到惊吓,到店内服装里躲避哭泣。有示威者在店铺被迫拉闸后仍撞击闸门。

示威先从新城市广场第一期三楼开始,尽管与内地游客出现口角,但由于有大批警员监视,秩序大致维持良好。队伍一路行至广场第三期一田百货,在此示威者拍打一间已经关门的内衣店铺,携带行李的中国内地游客遭示威者辱骂、竖中指,被示威者包围,手拉车被按住不准放行。一位沙田站内奇华饼家的店员,在落闸后贴出手写的“因‘暴动’暂停营业”告示,事



- 2015年2月15日，在沙田新城市广场掀起的“捍卫沙田”示威中，一位警员手持警棍驱散示威者。
- ↓ 2015年3月8日，大批警员集结于地铁站中，警戒即将进行的反水客示威。该次示威原本欲于上水进行，后转到屯门。
- ↙ 在2015年3月1日爆发的“光复元朗”示威中，一名示威者被警员控制。



2015年3月1日，参加“光复元朗”示威的“热血公民”成员在元朗街市外行进。

←

经历过“光复屯门”一役后，警方此次布下500名警力严阵以待，并向示威者警告，如向店铺和顾客作出滋扰行为，将果断执法。

后又道歉用词不当。

下午4点40分，示威者与警员在通往第三期和第一期的通道上爆发冲突，场面变得混乱。警方逮捕至少一人，也有一名警员受伤。示威者改变策略，开始四处流窜，让警方疲于应付。有人在商场通道挥舞港英旗帜，高呼“香港独立”，亦有人从高处散落“勇武抗争，香港建国”的贴纸。

到下午5点30分，由于一名示威者在Marimekko店外被警方带走，约70名示威者开始冲击该店铺。部分货架被推倒，店员躲在角

落避免成为攻击对象。警方拉起封锁线保护店员，与示威者发生推撞。在出示红色警示无效后，警方开始施放胡椒喷剂、使用警棍。当日的活动于晚上8点前结束，警方逮捕6人，以2名示威者和一名警员受伤收场。

本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高级特任讲师张楚勇，认为这次反水客运动与之前的社会运动截然不同。他注意到运动来来去去只有几百人参加，貌似还没争取到大片支持者。“说明他们的号召还是很有限，与学联、传统的反对派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近

年来，他们似乎感到自己有了一定力量，同时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头，因而发起了今年的反水客运动。”张楚勇分析，“这些组织打出要‘勇武抗争’的旗号，但其实自己也无法说清楚‘勇武’是什么。最多只是在游行时发生一些推撞，和警察、和反对他们的示威者发生打斗而已。”

**“用尽所有方法，不许示威人士走进元朗”**

“捍卫沙田”行动结束后，2月18日，





“勇武前线”、“本土民主前线”、“热血公民”等团体开始在网上召集人，于3月1日发起“光复元朗”行动。由于前两次活动所带来的混乱，本地居民出现反对反水货运动的声音。行动开始之前，元朗区乡绅声言要掷粪还击示威者，此后该乡绅申明言论只是自己私下闲谈，并无恐吓之意。但由于反对反水客团体的出现，元朗行动也成为历次行动中最为激烈、混乱的一次。

2月28日，即“光复元朗”行动前一日，由元朗区6个乡事委员会及商会等组成的元朗各界团体领袖联席会议发表声明，反对“光复元朗”行动。立法会议员兼任元朗区议会主席梁志祥呼吁参加者保持冷静，并称，元朗居民不会对示威者做不文明的行为。“他们不文明，不等于我们不文明”。

本港工商总会元朗分会主席黄达光则

指出，有大量元朗商户反映担心“光复”行动将使其生意受损，将会派遣百名法律顾问团，沿途摄像取证，以便日后进行民事索偿。十八乡乡事委员会主席梁福元则警告反水客团体勿要暴力滋扰，“元朗多人一起上来，一人一脚都踩扁你。元朗也有好多人，热血过你们，他们一定会还击”。他还称，自己是做和事佬，希望双方冷静，但当地民情彪悍，到时可能不会那么冷静。

**反对“光复元朗”行动开始前，约30名自称本地居民的反对者和“爱护香港力量”召集人李家家到场，高呼“热狗，走狗，无面见人，破坏社会”。**

行动开始前，约30名自称本地居民的反对者和“爱护香港力量”召集人李家家到场，高呼“热狗（对“热血公民”之蔑称），走狗，无面见人，破坏社会”，李家家更称“会用尽所有方法，不许示威人士走进元朗。”有示威者在火车站外打出凤凰龙狮旗（改版自港英旗帜中龙狮标志，为所谓“城邦自治派”的标识），但其所到之处引起路人不满，多次遭到包围指骂。

本港媒体报道，元朗十八乡公所当日成为了反击示威者的“指挥中心”。十多名村民与主席梁福元合影后散去，梁福元称原定的反对示威的活动已经取消，与村民只是“聊聊天，喝喝茶”。但在示威过程中，多次发生本地村民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居民似乎并未响应此前“要冷静”的号召。

行动于下午3点30分起步，当日警力增





左图  
2015年3月15日，多个团体参加“反热血反暴力大游行”，反对反水客运动。

右图  
2015年3月15日，挥舞着中国国旗与香港区旗的反水客者走过香港尖沙咀的闹市区。

加到700人，示威者有数百人，大量的围观市民和记者更使得元朗本就狭窄的道路变得水泄不通。

下午4时，示威队伍行进到元朗寿富街一间奶粉批发城。该店被认为专门服务于内地游客和水货客，成为重要目标，被示威者贴上“水货名店”的贴纸以示嘲讽。一些不满示威者的本地市民与示威者发生口头和肢体冲突，警方要将双方分开，动用警棍驱散。建制派组织“爱港之声”主席高达斌现身，称有十多名成员已到达，将监督示威者是否违法。

到下午4点30分左右，在同乐街及安宁路交界处，示威者与反对者发生冲突，警方因而多次使用胡椒喷雾。期间一人因非礼女性示威者被捕，一人被误认为便衣警察而被示威者包围追打。示威者与反对者相互投

掷水瓶，警方再度释放胡椒喷雾，致使警员和数名记者误伤。示威开始后一个多小时，

“本土民主前线”便在网上宣布因警察无力控制场面，他们将提前解散“光复元朗”游行队伍。而“热血公民”也于当日傍晚返回朗屏西铁站后散去。

余下的示威者此后转至元朗大马路，欲占领这条元朗市区最中心的街道以瘫痪交通。警方则打出红色警示，再次释放喷雾。晚6点，示威者冲出警方封锁，一度令轻轨停运。部分示威者发动流动“占领”，此后又回到元朗大马路，场面一度变得混乱。直至晚上10点，示威活动才逐渐结束。此役，警方共拘捕38人，36男2女。

据《东方日报》报道，最后才出发的一批黑衣口罩男最为暴力。他们为数近二百人，不少为原“占中”人士。他们毋须他人

“挑机”即能引发冲突，是傍晚发动“占领元朗大马路”的主力军。

今年32岁的L先生，是本港80后社运人士，多年来参加过大大小小的社会抗争活动。他接受《凤凰周刊》访问时指出，连串反水客运动中的示威者主要分成三批，第一批是“热血公民”，第二批是“本土民主前线”，第三批是约300人的黑衣口罩男。最激烈、最暴力的行动都是黑衣口罩男作为主力参与的。他们大部分是“90后”，甚至是“95后”，有的是学生，有的人是低技术技工。一个共同点是宅男，喜欢待在家里玩计算机，一逛街发觉被水客影响到生活，就认为内地人霸占了他们的空间。

L先生指出，这些人普遍不相信媒体，他们平时的抗争模式是：先在网上发布行动讯息，然后集体出动，令警察防不胜防。



“有一次，我参加他们的饭局活动，他们竟然要求我把手机卡拿出来，以免给警察偷听到他们的讲话内容。”这些人和警察的恩怨源自去年“占领中环”运动，不少人在“占中”期间与警察发生身体碰撞。

### “行动失去正当性，离民意愈来愈远”

元朗行动后，反水客组织的号召力走弱，延续一段时间的运动开始走向尾声。

3月8日，脸书“游览上水”主页发起“光复上水”行动，号召200多名网民到上水集合。由于地点多次变更，到下午3点为止只聚集了20多人，而当场有30多名记者和50多名警员。示威队伍还遇上了反对示威的人士，并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示威者之后改往屯门。

下午4点，约50名示威者聚集屯门市中心，继而走向V City、屯门时代广场及屯门市广场。在V City周生店内，一位看金饰的男子遭指骂，继而还击“我是香港人，你为何骂我？”一对拖篮的母女在V City商场外被示威者包围当成水客，即使母亲称是港人非水客，并开篮让示威者查看篮内的物品只有图书等物品，示威者仍以粗言秽语辱骂该母亲，同行女孩受惊大哭。更糟糕的是，一位中学生模样的示威者，向一位内地长者的手推车踢去，货物散落一地，年轻人转身消失在人群中。

示威者行至屯门公园，将在公园中玩音乐的李伟权老人误认为水货客而放倒在地。少数示威者曾转战尖沙咀，致使星光大道部分店铺落闸。到晚上11点，示威者才逐渐散去。

反对反水客运动的团体也在行动，多个团体于3月15日发起“反热血反暴力大游行”，向游行人士派发热狗，将矛头指向参

### 反水客运动所过之处， 最直接受影响的是 当街店铺。受本港媒体 采访的诸多店铺都反映 生意少了很多， 少则三四成，多则六七成。

与组织反水客运动的“热血公民”。游行由遮打花园出发，至添马公园结束。“爱港之声”、“紫荆行动”等七个亲建制团体则于尖沙咀钟楼集会，表达“反‘港独’、反撕裂”等要求。他们要求警方严正执法，批评律政司和法院未严惩反水客示威者。

“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召集人梁金成，于3月22日在上水地铁站发起反水货客示威。但现场只有20多个反水客者，且同“保卫香港运动”的反暴力人士形成对峙。反暴力人士高喊“欺凌妇孺、认真衰格”等口号，批评反水货客暴力行为，要求法官重典治乱。

反水客运动所过之处，最直接受影响的是当街店铺。受本港媒体采访的诸多店铺都反映生意少了很多，少则三四成，多则六七成。“近年来元朗的人越来越多，即使没有水货客也都越来越多。”一位常住元朗四十年的居民在接受商业电台访问时，埋怨反水货客的行为比水货客更扰民。“水货客带来的滋扰70%，但你们下来搞事是140%，或甚至200%，是两倍多地令人反感。你们这样做有没有授权呢？你有没有民意调查一下，当区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支持你？”

反水客运动的暴力化，使话题的核心从水货客现象倒转到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上。本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2月下旬电话访问了743名18岁及以上的本港居民，发现约五成半港人不认同近来连串“反‘自由行’旅客”行动，只有一成六表同意。三月中

旬，本港基督教协进会亦发表声明不认同反水客活动的暴力行为。

“冲击行动，理论不足，策略不明，想起就做，见人就闹，甚至没有底线，像一群蛮牛在追逐，杀错良民又死撑不肯认错，焦点模糊，讯息混乱，行动失去正当性，离民意愈来愈远。”资深媒体人吴志峰在《明报》上的评论语，是典型的反对意见。

“比起世界上几乎其他所有地方，香港的政治运动是非常文明的，否则无法得到社会支持。‘占中’运动中，一部分示威者把立法会玻璃大门砸坏，仅此而已，也让属于激进本土派的人民力量急忙与这些示威者划清界限。”张楚勇说。

尽管社会评论很差，但并未使激进泛民各党派与反水客者们划清界限。香港本土、社民联、人民力量、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等一众激进泛民派系，于3月11日联合召开记者会，认为政府应负最大责任，谴责警方粗暴对待示威者，同时指出示威者暴力行为超越界限，造成反效果，呼吁示威者守护他人基本权利。而在3月25、26日的立法会辩论上，激进泛民议员仍将矛头主要对准港府。

3月2日，黄洋达在其网台上公开就光复元朗行动的冲突行为道歉，认为“热血公民”的带队人员“僵化”，现场指挥及调度能力差。郑松泰则表示，反水客示威者是否“闹错人”并非大问题，不应要求示威者道歉，因为示威者是受害者，也是弱势社群，不应把他们抹黑为暴徒或暴民，也不应以圣人的道德框架要求他们行动时认清谁是坏人。

面临全港压力的“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黄台仰，于3月中旬承认反水客行动需要“暂时停止，检讨一下”。他不仅拒绝谴责运动中出现的暴力行动，仍一味指责政府多年来没有解决问题，他甚至称“本土民主前线”不会阻止参加者投掷汽油弹。



专访张楚勇：

## “反水客”组织者维持影响力困难

反对派嫌改进速度过于缓慢，于是日趋激进。他们不满港府和北京，也不满传统的反对派。

记者 / 李克难

**记者：**你如何看反水客运动的组织和参与者？

**张楚勇（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高级特任讲师）：**反水客运动的组织者主要有两个类型。首先是一些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从前在很多社会运动中并不冲在最前，而是在后面利用运动中一些人的不满来获得支持者。在反高铁、反国教等运动中，一些激进分子骂运动的领导者不敢用更激烈的方式去对抗。在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中，他们不断吸纳对运动主流不满的边缘人。2014年11月，这些人煽动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但打破玻璃后并没有站出来。

其次是年轻人，可能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想要什么，但他们总是心怀不满，担忧大陆对本港造成威胁。他们不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但对社会现状和传统反对派心怀不满又没地方发泄。

**记者：**运动中可看到很多参加者是学生模样，非常年轻，近年来本港政治似乎有着年轻化的倾向。这些年轻人参与社会运动，会对本港政治产生什么影响？

**张楚勇：**本港政治运动年轻化在五年前即开始。2010年反高铁运动中，“80后”年轻人站在前头，对整个本港产生影响。之后，从反对国民教育到“占中”，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越来越年轻，从“80后”到“90后”，从大学毕业生到还在课堂的中学生。

年轻人的组织方法和意识形态，不同于之前的反对派，而且他们之中存在相当大的区别。“占中”为反对运动的激进化和分化创造了条件，期间，旺角和龙和道的占领者对

主导金钟占领区的学联、学民思潮（双学）和“占中三子”的不满已是很明显的事实。占领越久，对“热血公民”这类激进组织越有利，也让他们吸纳到更多不满原本的反对力量的年青人。双学等对反水客运动并没有什么参与，不满双学的一些学生（包括宣扬港人民族自决者）在运动后却在大学界发起学生会退出学联的运动。

这部分年轻人不再把社会公平放在首位，而是一切以本港本土利益为中心。过去的温和社会主义立场开始被本土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这种要排除一切对本港不利因素的意识形态，被称为“大香港主义”。

如过去二十年来，每天约有150名大陆人进入本港成为新移民。“大香港主义者”认为这些新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拿了本港的综援，享受本港的福利，却对本港没什么好处，因而他们非常排斥新移民。不过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其内部逻辑充满矛盾和混乱。

**记者：**在反水客运动中，经常能够看到港英的旗帜以及一些“港独”性质的口号。这些所谓“大香港主义者”与“港独”相距有多远？

**张楚勇：**广义上来讲，这些人可被纳入“港独”的范畴。但“港独”的概念从一开始就非常模糊，不管是港大学生会的《学苑》两期的文章，还是岭南大学陈云的《香港城邦论》，都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论述，唯一共同的基础是对内地政治模式的排斥。部分人认为本港很多优秀的社会价值都与港英时代有关，因而搬出港英时代的旗帜。除此之外很难再有清晰的说法，例

如他们无法解释本港所继承的中华文化。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年轻的激进主义者的出现？

**张楚勇：**之所以出现这一派系，是因为一些人认为，香港是一个发达而开放的城市，它应当有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没有太大差别的制度。然而，决定本港政治制度走向的是北京。与本港内部的考虑不同，北京需要在考虑本港政治制度发展的同时，思索整个中国的发展，因而本港的宪政制度改革总无法满足内部一部分人的要求。长此以往，年轻人对传统的本港反对派越来越不满。反对派嫌改进的速度过于缓慢，于是日趋激进。他们不满港府和北京，也不满传统的反对派。

激进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沉浸于社交媒体的年轻人不再受传统媒体的影响，他们对社会、对事物的看法都来自于社交媒体。并且只要有几十人、几百人对某件事有同样的观点，就可以出来做事，不用等政党、传统的领导来带领。

**记者：**你怎么看待这些激进组织的政治前景？

**张楚勇：**过多的水货客和大陆游客导致本港社会公众的不满，反水客本身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社会主流并不支持用暴力的手段去对待游客，本港本地从水客中受益的人也不少，因此长期依靠这个话题来维持其组织的号召力很成问题。反对派想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得看他们是否有决心参加选举。要赢得选举，则要靠争取一般民众的支持，同时也得跟传统的反对派合作。这对他们来说，都有相当大的难度。●



# 反“反水客”人士： 水货客问题没想象中大

特约撰稿 / 黄文田

**本**港的水货客问题，不仅是一个商业活动引起的社会焦点或议题，已经涉及到民生、政府管治、陆港两地关系与民间情感、甚至是更为深层次的政治生态。

示威者认为，水客问题已经对本港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令社区变得嘈杂、拥挤，店铺种类逐渐单一化向药房、金铺倾斜。而且，来自内地的水货客已经遍布本港北区、沙田、屯门等区域，这些地方看似不再是本港人的地头。但真如反水货客示威者所言，水货客已经令本港部分地区“沦陷”了吗？在很多本港人看来，未必如此。

## 水货客对社区影响被夸大

“水货客问题对上水确实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作为一个基本事实，则被‘反水客’示威者夸大了，成为了一个政治斗争的筹码。”蔡先生在上水生活已超过三十年，他觉得水货客问题在上水的影响范围有限，局限在以东铁线车站为中心、方圆一公里左右的范围内。

此范围内，众多水客聚集以及购买、运输货品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区生态。例如上水的新丰路上，许多店铺变成了药房。由于上水靠近深圳，且有轻轨直达，不仅是药房增多，货币交易也增多。蔡先生告诉记者，许多头目级的水货客在这儿兑换货币，即时存入本港的户头或跨境汇款到内地。

人流的畅旺、商铺种类的单一化，带来铺面租金甚至住宅租金的升高。“但这些与本社区居民息息相关的铺头，并没有消失，大家仍旧可以理发、喝早茶，只不过地点距

离港车站稍微远了一些。”这是蔡先生对所居地这些年变化的感受。

记者观察到，上水铁路站附近区域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通往本地居民社区一侧的天桥，人流稀少，也较安静。进入有居屋（港版经济适用房）、学校、社区公园的区域，本地民众的生活并未受到影响和滋扰。另一侧通往商场的天桥上人潮涌动。但即便是商业区域中，多步行一至两分钟就能走出“水客波及区”，又能抬头看到包括跌打医馆、五金铺在内的本地民生商铺。“水货客根本不可能有时间进入本地居民社区，因为时间对水货客而言就是经济利益，他们付款、拿货之后便会立即启程。”蔡先生说。

“水客并未导致生活必需品短缺。”蔡先生特别向记者强调这点，“当市场有需求时，增大进货量便可解决问题。”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以下简称消委会）在今年2月公布的一个调查结果，印证了蔡先生的看法。报告显示，四款不同奶粉在上水的缺货率，介乎3%至15.2%之间，情形竟然好过位于本港腹地九龙东区的将军澳。

“每到周末，人流会比较多，靠近新城

**相较于内地水货客，  
本港水货客更具有边境  
通关的优势，  
由于内地居民的过境通道  
往往排成长龙，  
所以通关迅速的本港水货客  
往往更受青睐。**

市广场的店铺格局在过去几年里产生了一些变化。”一位任职本港一所国际学校的老师告诉记者。她居住在东铁线的沙田已有三年时间，在她看来，新城市广场在这三年里少了传统的日用生活用品的商铺，出现较多药房和金铺，这一现象与上水大致相同。沙田交通便利，既有公共巴士枢纽，也有铁路，从罗湖搭乘东铁线抵达沙田不超过半小时。故沙田颇受过境游客喜爱，同时也成为反水货客示威团体的“战场”之一。

另一水货客“重灾区”元朗，区议员周永勤说：“水货客问题对元朗有影响，但没想象中，主要集中在阻街和租金上升两方面。”就阻街而言，水货客经常摊开行李箱分货，令街道拥挤、行人出门不便；而租金上升更是对社区居民的居住产生了一定冲击。

“劏房”，即本港将一套完整住宅单位分隔成数个独立、狭小空间的住房。在楼宇种类中，没有保安、临街而立、没有电梯的开放式旧楼，称为“唐楼”。“如今在元朗，一个‘唐楼’中的劏房，月租金不会低于5500港元。”这是周永勤向记者提供的数据。元朗有很多来自深圳的跨境学生，为提供本港地址而报读不错的学校或幼稚园，跨境学生的家长往往会租一个劏房，从而令租金上升。一些家长在送子女上学之后便开始购物，待子女放学时携带货品返回内地，他们租住的劏房成为了变相的水货仓库。

元朗的茶餐厅受租金上升的冲击很大，一些人的生活因此改变。据周永勤介绍，一个雇佣十几个人的茶餐厅老板无法应对房东的高幅度加租而被迫歇业，十几



个伙计随之失业，老板本人最后向政府申请综援。

## 水货客也惠民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助理系主任陈学然，祖籍梅州，早年持单程证来港与家人团聚，经历过深水埗新移民岁月。对水货客问题的影响，他从文化心理层面进行了解读：“很多历史悠久的茶餐厅、糖水铺关门了，变成了药房、金铺，且很大比例的消费人群是中国内地。居住在这些社区中的本港人便有一种失去了‘家’的感觉。”

水客以及消费人流的涌入，全无正面价值吗？“水货，形成或带动了相关行业的繁荣，例如零售、餐饮、运输。”周永勤直白地告诉记者。这种繁荣，受惠的不仅仅是铺面房东和商家，也包括部分本港的基层民众。周永勤介绍，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与零售、餐饮、运输有关，水货现象差不多为本港基

层市民创造了76000个左右的就业机会。

2014年12月末，本港一智库发表《吸引多元高消费客群，增加本港旅游业收益》研究报告便指出：在其他因素维持不变的条件下，若中国内地的过夜旅客数量减少10%，则本港的生产总值会下跌21亿港元。这并非一个小数字，所以周永勤一直倡导针对不同的议题进行实际处理，而非发泄情绪。

关于大量旅客入境消费对社区产生的负荷承载力问题，周永勤建议可通过“点对点”的方式加以疏导：即在商场和边境关口安排专门的商场巴士运载旅客，这样可以缓解公共巴士系统的沉重负担；而当旅客量过大的时候，周边的商户其实都会以相同的方式吸纳过量的客源。

## 水货客，更多是本港老人

早在2013年本港刚推出奶粉限制出境数量的法令后，当时有本港传媒报道，活跃

2014年10月14日，广东深圳，罗湖村，一路之隔便是深圳罗湖火车站和汽车站，离口岸联检大楼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交通极为便利。由于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从罗湖口岸过关的水客大多在这个城中村进行交易。

在深港两地的水货客约有两万人。特区保安局长黎栋国当时说过，从事水货客活动的群体中，港人大约占六成左右。两年后，水货客问题已经演化为社会焦点。黎栋国日前在接受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再次指出水货客中本港人与内地人的比例：“综合考虑两边执法情况，估计大概是一半一半。”

“化妆品也好，奶粉也罢，运送一次差不多150港元；若是夫妻搭档，就有300港元的酬劳；每天开工三次，便有900港元的收入。”对于水货客市场的劳力成本，周永勤有着很深入的了解。他更进一步指出本港籍水货客的身份背景：“本港中产阶层的人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走水货，从事水货活动的本港人，不少都是从政府那里领取综援的基层市民。”相较于内地水货客，本港水货客更具有边境通关的优势，由于内地居民的过境通道因为人数众多而往往排成长龙，所以对于单日往返次数与利润挂钩的水货集团而言，通关迅速的本港水货客往往更受青睐。

本港《文汇报》曾在2013年以《不是一件丢脸的事》为题，深入接触了基于不同原因而成为水货客的本港人。它提到，由于本港未有全民退休保障、公立医院就诊轮候时间过长、私营医疗机构费用昂贵、政府下属的养老院宿位紧张等原因，老无所依的本港长者会成为水货客以维持生计。一些年轻人觉得当水货客的酬劳高过一般打工族，也选择加入。

上水的蔡先生提及，曾在自己居住的屋苑范围内看到过招募本地水货客的人士。“我自己住的这栋楼中，以前就住着几个水货客。年长的人当水货客，是为了在退休后多拿一些零用钱，长者搭乘港铁前往深圳的乘车费用享有优惠，运作成本相对低。”

□ 编辑 陈祥 □ 美编 青年





# 香港“自由行”的红利到底有多大？

文 / 余森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内**地游客不断增加，的确为港民交通增加了一定的负担。但更大的抱怨是来自对婴儿奶粉、婴儿纸尿裤等日用品的抢购，导致部分产品断货或者拉高价格，导致本港居民不得不承受高价。香港虽是高收入经济体，但基尼系数高达0.43，收入分配相当不均。很大部分人月收入不足万元港元，衣食住行的开支很大，日子过得并不潇洒。

从宏观数据看，“自由行”虽有提升香港的零售业，但零售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不大，去年才占GDP的1.3%。所以，有人据此得出“自由行”对香港经济正面贡献不大，可有可无，负面影响却不小。所以，限制“自由行”似乎是有利于香港的事情。实际上，这种看法过于局限。

## “自由行”拉动大量就业人口

首先，“自由行”明显拉升了香港的零售业就业。金融业这类高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较高，对就业的提升作用不大，而零售业的GDP占比不大，但对就业的提升作用较大。据统计，十年的“自由行”创造了香港近十万的新增零售业岗位。

美国这样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因为认定中国的小轿车商用轮胎低价倾销造成美国近十万人失业，不惜冒着与中国撕破脸重起贸易战的风险，在2009年强势通过高达35%的特保关税，可见，十万人的就业对美国不是小事。

香港的人口只有720万，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十万人的就业更难小觑。此外，从经济学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自由行”并不光带来十万人的就业，新增就业所带来的收入

又会创造更多的购买力，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如同货币乘数一样，它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会呈现雪球效应。所以，“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提升作用不能只看占GDP的百分点。

其次，市场的扩大从来都是好事。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或自由经济体，无不想方设法增加外需扩大市场：韩国开放济州岛，中国游客可以免签去旅游购物；今天几乎日本、澳洲所有的国际机场都是备有中文翻译，恨不得中国游客多买一点；台湾更是在“大三通”的基础上，鼓励大陆居民“自由行”、不必再组团出行。一直以“自由、开放”为立港精神的香港，多年来的繁荣即借助于自由港口的利好，现在不应与此背道而驰。

随着近期美元的不断强势，由于香港实行金管局完全固定汇率制度，香港奢侈品的价格优势相对于欧洲等地已不再明显。香港本港的旅游资源因自然人文景点有限，与大陆沿海城市景点替代性强，国内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出境旅游更多会选择地域差异性更大的地方。单就旅游而言，香港旅游业并没有太多的比较优势。

## 开放、自由仍是香港灵魂

相对而言，香港价廉质优的日用品、婴幼儿保健品是普通游客的首选。因为要征收行邮税的缘故，大陆海关限制访港游客每次带的婴儿奶粉、进口红酒，当然，这样做也不利于中国福利——限制婴儿奶粉进口保护了蒙牛、伊利等乳业巨头，但损害的是老百姓的福利——消费者不得不付更高的价格去购买低质、不放心的奶粉。

国际贸易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就算加

上政府所征收到的关税，消费者福利的损失还是要大于生产者福利的增加和关税收入。

在落马洲口岸立有禁令：超额携带奶粉者罚款5万元或监禁两年！这其中有一个顾虑，就是大陆“自由行”拉动的不是香港的奢侈品消费而是日用品消费，可能会“挤出”本港居民的消费，减低他们的福利。特别是深圳居民可以一年多次往返，所以，周末过去香港“打酱油”可能不是个玩笑。

诚然，如果奶粉的供给不能增加的话，需求的增加当然就会拉动本港的价格，对本港居民不利。但问题在于，大陆“自由行”来港购买的奶粉多是荷兰、瑞士生产为主，婴儿尿裤更是日韩生产为主，本港本地产品并不是首选，抢购奶粉对本港的行情影响甚微。香港中间商只需要多进口即可满足市







太平山顶的摩天台已成为大陆游客  
欣赏香港全景和天际线的最理想场地。

**“自由行”不光带来了  
十万人的就业，  
新增就业所带来的收入  
又会创造更多的购买力，  
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  
如同货币乘数一样，  
它对香港经济的影响  
会呈现雪球效应。**

场，且不单零售业受益，运输物流也跟着沾光。增加就业岗位带来的福利，可以惠及更多的香港普通家庭。

如同自由贸易一样，“自由行”有利于整个香港经济，不等于说“自由行”对香港每个人都有利。肯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零售业卖家直接受益，但类似产品的消费者可能利益受损。港府可以对可能受冲击最厉害的孕妇、有婴幼儿家庭进行“自由行”调节补助。

以最信奉“自由经济”的美国为例，仍然实行大规模的贸易调节补助法案(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美国在1994年与加拿大、墨西哥建立北美自贸区后，因从墨西哥进口大量价廉物美的鞋帽、纺织等劳力密集型产品，使得美国的劳工处于严重不利地位。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把“脏

水”和“小孩”一起倒掉，而是一方面强力推行北美自贸区的建设，一方面实行贸易调节补助法案，对因在自由贸易中受损的劳工按具体不同的方案加以调节补助。

如果真的限制“自由行”的话，对香港经济的损害远大于对大陆经济的损害。还是以美加自贸区为例，1994年成立自贸区之后，对相对小国加拿大经济的促进作用远大于相对大国美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同理，如果限制“自由行”，大陆经济体已达十万亿美元，即使没有“自由行”，充其量是老百姓不能方便地买到放心奶粉而已。

透过这些表面的现象，从长远来看，开放的香港、自由的香港应是香港经济和香港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 编辑 路琰 □ 美编 青年



## 漯河政协常委王华涉黑案内情

一个曾在街头打架、盗窃的少年，通过在河南漯河市盘根错节的社会网络，十余年逍遥于两桩人命嫌疑之外，且官至当地政协常委。什么样的社会土壤造就了王华，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王华在漯河数十年屹立不倒？

记者/张蕾

2013年之后，绰号为“黑孩儿”的杨玉忠和他的恋人付勤香的尸骨才被他们的家属找到。作为当时照看王华赌场的“兄弟”，杨玉忠和付勤香在1999年12月28日，像空气一样没了踪影。

那时，王华在漯河风头正盛，先后担任河南省商会副会长、漯河市政协常委。

两者的家人在此后从未间断寻找。直到王华在2013年元月被抓，他的同案者为了立功，向警方提供了王华杀害杨玉忠和付勤香的线索。接近警方的人士称，杨玉忠及其恋人付琴香在银都大酒店王华的办公室里被打死，尸体被装进编织袋，运至西平县老王坡，用汽油焚尸灭迹。当时西平县警方在焚尸现场提取了残存的遗体样品保存。

直至2014年，漯河市打黑专案组对遗体样品进行了DNA比对，确认了两具遗体的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9年两人失踪，漯河市源汇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直到王华被抓获，公安局并未立案侦查，也未有任何

失踪人口的记录。

2015年4月11日，当地警方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称，“黑孩儿”被害案已经侦查完毕，目前已经移交检察院。

王华面对的官司并不止这一起。此前的2015年3月24日，漯河市检察院指控王华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放火、赌博、开设赌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破坏生产经营、交通肇事、包庇、窝藏等十多项罪名，该案在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异地开庭审理，30多名同案者当庭受审。

一个曾在街头打架、盗窃的少年，通过在漯河盘根错节的社会网络，用血腥和暴力打压对手，靠威胁、敲诈、侵占等手段攫取财富，随后进入政界，官至当地政协常委，靠官方身份为生意保驾护航，成为媒体口中乐善好施的典范。王华入狱后，考问远未结束。

### 复仇

王华如日中天时，他名下的漯河银都大

酒店也曾风光无限，当年还接待过世界级别拳王霍利菲尔德。然而如今，这里满眼狼藉：酒店门口写着“银都大酒店”的巨大风景石倒在地上，白色柱子被喷涂上黑色大字“杀人现场”、“杀人偿命”。大厅里空无一物，一堆椅子从里面堵住旋转门。

这混乱来自于王华曾经涉嫌杀害的杨玉忠和付琴香的家属，王华被拘捕后，他们到银都大酒店抗议。酒店对面商铺老板回忆，去年5月13日早上8点左右，这条街面已聚集了上百人，这些人涌进银都，挂起巨大横幅，涂写黑色大字，控诉王华杀人。并在酒店大门摆满花圈，两侧搭起灵堂，奏响哀乐。

当时酒店的客人不得不全都退房，酒店暂停营业。抗议的人群不断涌来，占满了这条不宽的马路。十几个人将门前的风景石套上绳子，合力将石头拉倒。警察们到来后也无力阻止。抗议一直持续到深夜，政府出面答应关闭银都大酒店后才平息。

王华被抓之前，已有诸多王华的反对者们通过各种渠道上访、反映情况，但王华一直



安然无恙。一位司法系统人士称，“每个部门都有王华的上访信，但是一看是反映王华的，全都随手扔在一边，置之不理。因为他们知道，王华的关系非同寻常。”

根据杨玉忠家属的描述，杨玉忠曾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贩卖衣服攒下不少积蓄，但很快在赌场上输光，只好投靠王华，帮他照看赌场。

漯河检方起诉书称，1998年至2006年底，王华为牟取非法利益，积累组织财富，扩大组织规模，组织犯罪嫌疑人在漯河银都大酒店东二楼、银龙度假村、金信公司等地采用百家乐、电脑版俄罗斯轮盘等方式，开设赌场，聚众赌博，并且找人分别监督赌场的管理、会计、卖码、望风、接送赌客等具体业务，获取非法利益。

杨玉忠应该是王华赌场中的一员。杨玉忠的家属称，1999年杨玉忠服刑10个月，出狱后，杨玉忠一直说“华哥”会给他一笔钱。他向王华多次索要，但迟迟未能拿到。1999年12月28日，杨玉忠接到一个电话后出门，一去不回。

直到2013年，王华被抓后，向警方招供杀害杨玉忠和付勤香一事，受害者家属累积数十年的怨恨情绪终于全都迸发出来。

## 纵火

漯河地处河南中南部，发展迟缓，1986年才升级为地级市。王华很早就在这座小城出了名。

1981年王华因为盗窃水泥预制板被收审过三个月，之后8年在当地的服装鞋帽公司上班，1991年后开办了自己的出租车公司和公交公司，逐渐发家。2013年案发时，他担任漯河市三鑫稀土有限公司董事长、漯河市政协常委等职。

王华身材高大，微胖，双下巴，国字脸，嘴唇偏厚，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他的生意对手形容，王华凶狠、难缠、不择手段。进入政界后，王华剃去胡须，在众人面前温文尔雅，常常面带笑意。

奠定王华“江湖地位”和社会上“威望”

的，是他的“仇家”宛振雨被纵火烧死之后。

宛振雨在上世纪90年代的漯河经商，颇有影响，知名度甚高。因为生意上的债务纠纷，宛家人把王华砍伤。警方的审讯记录显示，孙培国称，王华想“让宛振雨在漯河街上丢丢人”，要“弄点汽油把宛家的金店烧了。”

接下这单“脏活儿”的人是孙培国。

孙培国与哥哥孙培超、嫂子苗会菊商量后，决定不找外人，“自己干，钱我们自己赚。”

孙培国告诉警方，1998年10月18日凌晨，孙培超和妻子苗会菊骑车到宛家的金店，把装汽油的塑料袋放在木条箱里，再把箱子靠在金店的卷闸门上，然后将卫生纸包着火柴放在塑料袋上，苗会菊点了一支烟放上去后离开。很快金店一片火光。

宛振雨和妻子孙淑兰正在金店看门，命丧火海。公安机关的审讯记录显示，王华承认前后给了孙培国30万元，但一直否认指使孙培国纵火杀人。

之后数年，王华一步步官至漯河市政协常委。“由此也看出王华的背景深厚。”一位不愿具名的漯河官场人士称。

当时漯河市源汇区公安分局现场侦查后认为，是电源插座起火导致，属于意外的火灾事故。宛家人无法接受，因为“附近根本就没有电源插座”。

1998年10月19日，在漯河市一位领导的要求之下，警方派人重新勘察现场。之后，并未给受害人家属明确回复。无奈之下，直到当年的11月20日，由宛家出钱，带领办案人员到沈阳等地做了火灾鉴定，才得出外来火源引起火灾的结论。

火灾发生两个月之后，源汇区公安分局消防监督科正式出具了《火灾原因认定书》，认定此次火灾事故的原因有可能属于纵火，应立案侦查。并抄送源汇区人民检察院、源汇区人民法院。

但是王华始终没有被调查。孙培国回忆，王华找到他说，没事了，警方已经认定为是电源起火事故。王华陆续付给孙培国30万元，孙培国和王华每次见面都带着录音设备，他对王华直言，“不得不防着你把

我灭口了。”

王华听后十分尴尬，手指哆嗦着把烟放进嘴巴里，一再声称自己很讲义气，一辈子也不会干灭口的事。

宛家一直向警方请求对王华进行调查，但警方始终未对王华立案。

事情峰回路转于2007年。

当年4月，苗会菊在其家中向吸毒人员出售海洛因，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满释放后，苗会菊发现孙培超另有新欢，儿子也被孙的大姐带走，房子被租给了别人。苗会菊惊怒不已。孙培国担心哥哥得罪了嫂子，她会去自首告发他们，便萌生杀掉苗会菊灭口的念头。但孙培超不同意，并将孙培国的想法告诉了苗会菊。

苗会菊决定告发孙培国兄弟两人。她找到宛家，称知道谁是凶手。2012年12月26日，苗会菊向漯河市公安局实名举报：1998年的大火幕后指使者为王华。随后漯河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对这起纵火案重新展开侦查。王华的代理律师陆永歌认为，公诉机关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是王华指使纵火杀人。宛振雨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代理律师李肖霖则称，纵火凶手跟死者并不相识，且纵火前后付给孙培国30万元，如果不是王华指使，与常理不符。

王华在漯河经营多年的关系网开始就此缓慢崩盘。

## 发家

王华发家于收购漯河畜产品进出口公司。1997年，漯河市委书记程三昌响应中央政策，在漯河开启了国企改制的序幕。漯河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当时有160多名职工，退休职工80多名，占地40余亩，有办公楼、仓库、万祥街门市部，按照当时的地价和房价，总资产超过3000万元。

一名老职工回忆，当时改制时，公司的运营状况良好，每年有几百万元的收入。但是时任市委书记的程三昌，体改委领导、市外贸局局长秦建忠力主拍卖，并支持王华购买。

程三昌被漯河当地人称为“程卖光”，





■王华名下的银都大酒店已经关门停业，酒店门前被人喷上了“杀人现场”的字样。

在1995年至1999年的任期内，亲手卖掉国有企业27家，个人获利上千万元，他随后潜逃新西兰，至今未归。此次中纪委的百人通缉名单，程三昌榜上有名。而2014年，秦建忠在任漯河市党组成员时已经被双规。

耐人寻味的是，程三昌的前任，原漯河市委书记王有杰因为受贿，并有巨额资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缓。而程三昌逃走之后，接任漯河市委书记的刘炳旺又因“买官卖官”，收受贿赂罪，被判刑17年。

程三昌的改制方案遭到职工的反对。为此，外贸局和体改委派驻了联合工作组，口头免去了外贸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的所有职位。在拔掉“钉子”后，程三昌提出新的改制方案——谁出钱多谁来做公司的法人代表。

漯河畜产品进出口公司职工回忆，当年职工一方出资了255万元，王华暗中以他人名义出资350万元，最终掌控公司。

1998年10月，改制完成后，漯河畜产品进出口公司更名为华中对外贸易公司，新公司成立不到一个月，王华以及他的华颖集团就搬进了华中对外贸易公司办公，公司财务、办公室、后勤等各科室负责人被更换，公司原职工大多离开，整个公司由王华控制。

王华将这间企业的门面房出售，并且在集资房的名义下，把公司的四栋仓库拆除，报建商品楼出售盈利。

## 官商

王华两次涉嫌命案，却能逍遥一直未被调查，杨威或是关键人物之一，杨威时任漯河市源汇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据一位熟悉王华的人士称，2011年，王华的两个属下反水，拿着材料去派出所报案，称王华敲诈勒索，报案材料中有详细的敲诈勒索过程，派出所立案后，很快接到上级部门通知，要求立即停止调查。

这和当时宛家以及杨玉忠家属的遭遇相同。杨玉忠和付琴香失踪后，家属们去漯河市源汇区公安分局报案，在派出所的楼道里遇到了杨威。

杨威同时跟王华及杨玉忠熟识，他热情地跟杨玉忠的家属们打招呼，让他们去刑侦大队报案后就匆匆离开。杨玉忠的家属报案后，十多年都未获立案。

宛振雨的家属回忆，当时他们向警方提供了很多线索，但警方“就是不调查”。王华案发后，时任源汇区公安局副局长杨威、漯河市源汇区公安民警孙景炎均被拘捕。

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的起诉书中称，1998年的火灾中……“根据火灾调查管理范围应该立案侦查，时任漯河市公安局源汇分局副局长的杨威违反规定，明知道该案应当刑事立案，而长期不安排，不督促办理刑事立

案手续，明知道王华为重大嫌疑人而不组织、不安排对王华采取侦查措施，应以滥用职权罪追究杨威刑事责任。原源汇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孙景炎作为这个案子的承办人，也违反规定，不立案，且私自提审证人，应以滥用职权追究其刑事责任。”

“两个科级公安系统官员能培养出横行漯河二十多年的大哥吗？”一位接近政府人士称，王华在当地政府的人脉远甚于此，当地官员见到他多以“华哥”相称，曾经很多人都笑称，“华哥是公安局的政委”。

王华于2002年开始任漯河市政协委员，步入官场。2007年开始连续两届任市政协常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场人士称，当时讨论漯河市政协委员的人选时，王华曾经遭到诸多人的质疑，但是一位市里主要领导当场表态支持王华，王华顺利当选。

王华的“江湖”名声在当地并非秘密，媒体人士也多对王的作为有所耳闻，但在当地媒体上，王华仍被称为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一位漯河媒体的高层回忆，他在举办一次慈善活动时曾找到王华，希望得到捐助，因为听到一些王华的“江湖”往事，原本不报希望，让这位人士意外的是，王华爽快地答应了。

当地新闻媒体2012年11月报道了王华向漯河福利院捐赠电梯的事迹。在这篇新闻里，王华被称为“扶贫济困、乐善好施传统美德的慈善人士”，体现了“企业家的爱心、义举和情怀”。时任漯河市委书记、市政府的几位官员出席了这次捐赠，并与王华一起剪彩。

王华从商界涉足政界，各种名誉纷至沓来。资料显示，王华曾获“河南省百佳慈善大使”、“河南省关爱新农村十佳慈善人物”、“漯河十大杰出民营企业家”等荣誉称号。王华还身兼多个社会职务，曾任漯河市召陵区工商联主席、漯河市工商联副主席和河南省总商会副会长。

王华被抓后，为排除干扰、减少阻力，河南省公安厅专门成立专案组，抛开漯河市公安局，直接组织警力办案。流传于漯河的“华哥”传说，终于落幕。

□ 编辑 路琰 □ 美编 黄静



Panasonic

松下电器

松下洗衣机

# 商务新时尚 整洁有型

热泵式空调暖风干衣，衣物平整，干练尽展



日本原装  
整机进口

松下阿尔法洗干一体机 XQG100-VR108



松下洗衣机新浪官方微博



松下洗衣机官方微信

## 松下洗衣机搭载 泡沫发生技术

快速溶解洗涤剂，激发超细腻微泡沫，深入衣物纤维，瓦解污渍

扫描二维码，请登录松下洗衣机官方微信了解更多产品相关信息 / 手机版网址: <http://wm.panasonic.cn/m>  
洗衣机 / 干衣机客服热线: 4006811315 4006611315 更多详情请访问松下洗衣机中文网站: [wm.panasonic.cn](http://wm.panasonic.cn)  
杭州松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洁净是一门科学

松下洁净研究所

Panasonic Washing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 “一带一路”下 瓜达尔港项目提速 中国开发瓜达尔港秘辛

特约撰稿/林子敬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挽着夫人彭丽媛走下飞机，巴基斯坦第16中队空军精英驾驶8架中国产“枭龙”战斗机在空中呼啸而过。4月20日，巴基斯坦一如既往地给予“铁哥们儿”最高规格的接待。

“巴中友谊比山高、比海深、比蜜甜、比钢硬。”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用最中国式的话语诉衷肠。

短短两天，中巴双方签订了51个合作协定和备忘录，中国对巴基斯坦启动了总计46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也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第一个落地项目。习近平访问前后，巴基斯坦西南部名为瓜达尔的一座港口小镇为世人聚焦。

“双方要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以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合作为四大重点，形成‘1+4’合作布局。”4月21日，习近平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中将瓜达尔列为“四大重点”之首，因为其背负着“中巴经济走廊”战略节点之名，作为起点通过铁路、高速公路和油气管道连接到新疆喀什。在中巴签署的51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中，与瓜达尔港直接相关的项目就有8个。

接下来一段时期，中国将对这座20万人口的贫穷港口小镇进行总额16.2亿美元的投资，包括修建瓜达尔港东部连接港口和海岸线的高速公路、瓜达尔港防波堤建设、

锚地疏浚工程、自贸区基建建设、新瓜达尔国际机场等9个早期项目，预计将在3-5年内完成。

“瓜达尔港曾经失去了宝贵的发展时间，无论是巴基斯坦政府还是新加坡国际港务局都没能让这里繁荣起来。当地民众已经对开发瓜达尔港的口号感到厌倦，但是中国人这次有组织、有规划、有充足资金的到来，还是让我们重新拾起了希望。”巴基斯坦著名媒体人、政治经济问题专家希迪可·俾路支(Siddiq Baluch)在其博客中写道。

### 曾经的死港

“瓜达尔港的开发历程异常曲折，是一部浓缩了殖民、冷战和地缘政治的历史。”在4月15日于海南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的“‘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战略研讨会”上，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穆沙希德·侯赛因如此感慨。

1954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改变了瓜达尔的命运，该报告认为瓜达尔拥有天然良港的资质，让这个贫困的渔村进入巴基斯坦政府的视野。瓜达尔虽然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却属于阿曼。经过长达四年的谈判，巴基斯坦于1958年以300万英镑从阿曼手中购得瓜达尔，结束了其200年的统治。

从那时起，瓜达尔港就提出了开发愿景，但碍于冷战、中东战争、伊朗战争以及印巴冲突等问题，几十年来仍然局限于纸上谈兵。直到2002年，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穆沙拉夫来到中国，与时任总理朱镕基会谈后，才达成中国开发瓜达尔港的协议。

“中国政府在一周之内就做出了决定，朱镕基总理让穆沙拉夫什么都不用担心，中国会建好瓜达尔港。”穆沙希德回忆道，“如果你要建设基础设施，中国的速度最快，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在这样的精神之下我们推进了瓜达尔港的建设。”2005年，在中国2.46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下，瓜达尔港一期工程顺利竣工。

2007年，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PSA)中标，赢得瓜达尔港40年的经营权。对此，穆沙希德表示，当时中方似乎对经营瓜达尔港没有兴趣。事实也表明，中国公司一开始并没有参与投标，中途才出场“打酱油”，据说出价远低于新加坡方面。外界猜测中方当时可能认为打通瓜达尔到新疆喀什的线路成本太高，而且存在技术困难。

PSA不仅规模大，还拥有丰富的国际运营经验。新加坡港本身在世界港口行业中拥有特殊地位，通过200条航线与世界123个国家的600个港口连接。“当时中国方面也觉得由全球第二大的PSA接手也是最好的选择。”穆沙希德说。

据希迪可回忆，当地民众那会儿十分亢奋，认为瓜达尔不久后就会繁荣起来，还能解决就业问题。而在新加坡公司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合同中，也明确规划了发展瓜达尔港的每一个环节。

巴基斯坦是一个弱政府、强军队、大家族、多宗派以及多外来势力渗透的国家，像瓜达尔港开发这种牵动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全局的项目，其中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精细把握。





然而，在随后的经营管理中，瓜达尔港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几近“死港”。巴基斯坦本土贸易量不足，西边的迪拜又大大稀释了其港口的功能，瓜达尔港以卡拉奇港分出一部分货物才能勉强维持运营，其港口本身的建设也没有太大的进展。

201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关于“瓜达尔港毫无作为”的新闻。此时，巴基斯坦政府开始重新寻觅新的运营商，而PSA也无意退出。当年《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巴基斯坦驻华武官时，他的办公室内还贴有瓜达尔港的照片。他指着墙上的照片说：“我们还是更希望中方来投资。”

2013年2月18日，巴基斯坦政府将瓜达

尔港的建设和运营权正式交予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PSA官方网站的信息显示，从2012年11月到移交给中方之前，没有一艘商船光顾瓜达尔港。至此，瓜达尔港失去了宝贵的5年发展时间。

### “中国是瓜达尔的天使”

“没有任何人否认瓜达尔港对于巴基斯坦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将近60年来，充分的建设动力还是没有将其发展起来。”希迪可感慨道。

对于瓜达尔港“失去的5年”，各方看法截然不同。穆沙希德认为新加坡方面有“私心”，故意延误瓜达尔港口的开发。在他看来，

■ 2015年4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抵达伊斯兰堡机场时受到热烈欢迎，巴基斯坦总统马姆努恩·侯赛因亲自到场迎接。习近平的专机进入巴国领空后，八架中巴联合生产的“枭龙”战斗机组成的编队为专机护航，将其护送到机场。

瓜达尔港对于中国来说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中东、非洲运输能源，最短的距离是通过瓜达尔港，然后直接送到喀什。“如此一来，中国的能源海运就不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为此新加坡将遭受巨大损失。”

不过，巴基斯坦政府也难辞其咎。据希迪可披露，当年巴基斯坦政府决定港口运营权时就充满权力斗争，总理阿齐兹已经决定把港口交给迪拜，但是总统穆沙拉夫推翻该决定，最后交给了新加坡。“斗争



的原因是争夺回扣。两个人都在瓜达尔港安插自己的亲信，承接瓜达尔项目，从中克扣资金。”

在不纯的动机和腐败的体制面前，单靠新加坡一个企业的力量不可能将瓜达尔港运营好。当时的合同中，政府也承诺修筑连接瓜达尔港到内地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然而巴基斯坦政府的服务承诺一直局限于“嘴皮子”，几乎没有落实。“如果一个港口没有连接内陆地区的高速公路或者铁路，就犹如处于外太空。”希迪可说。

此外，瓜达尔港缺水缺电，政府承诺的电力水资源供应都没有兑现。巴基斯坦的电力供应异常紧张，大城市每天平均停电8小时，小地方停电甚至超过20小时。瓜达尔的供水还依靠一个50年前规划、20年前才修建完成却已经破败的水库。

致命的打击发生在2010年。当时经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巴基斯坦与新加坡合同中关于巴基斯坦政府负责征集自贸区土地的做法不合法，海军不同意交出其在瓜达尔拥有的584英亩土地。这一判决导致先前的合同无法执行。

“不用说从海军嘴里‘拔牙’，就算从一般居民手中筹集土地也很困难。巴基斯坦实行土地私有政策，土地严重分散，巴基斯坦政府让开发企业自行解决征地问题。

企业得一块一块土地去谈，每平方米出价。在征地过程中民众要价越来越高，有些居民就是不卖。”在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园区工作多年的中国企业家王军解释。

王军认为，巴基斯坦是一个弱政府、强军队、大家族、多宗派以及多外来势力渗透的国家，一般企业的业务开展都得考虑这些问题，像瓜达尔港开发这种牵动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全局的项目，处理不好复杂关系的利益分配将难以取得成功。

于是，运营三年后，瓜达尔仍然没有脱离“死港”迹象，新加坡公司只得决定找机会退出瓜达尔港。由于当时合同规定，谁退出将承担违约赔偿，双方只好拖着，直到“救世主”中国主动承接了新加坡的运营权，“转让”的性质让新巴双方都不用赔款。

通过瓜达尔港开发失败的案例，希迪可总结出想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首先，巴基斯坦政府靠不住，没有钱、体制腐败和无效率，一般的国外企业也不行，没有实力

愿景很美好，  
但是一切都站在成功实现中巴经济走廊的基础上。  
如今中国和巴基斯坦在  
建设中还面临着巨大困难。

独立完成港口以及周边基础设施的所有开发。只有将所有工程都承包给有动力的外来群体，而且资金也得由国外提供，瓜达尔港才有可能摆脱停滞困境。”

恰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将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作为第一个目标，上述条件的实现也迎来曙光：中国承包了港口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供水供电基础设施，提供最有效率的中国工人以及巨额优惠贷款。最重要的是，并非一般的企业实施建设，而且国有企业，任务所具有的强制性能确保中方克服重重困难。

“中国是让瓜达尔走出黑暗的天使。若是2007年时政府就将瓜达尔港交给中国，估计现在瓜达尔港已经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了，好在现在开始还不算迟。”希迪可说，“虽然中国在实际开发时也会面对诸如征地难和利益难以协调的问题，但是巴基斯坦整体而言对中国的印象不错，特别是军队方面，应该会予以配合。”

## 安全隐患不可忽视

“瓜达尔港是俾路支地区唯一有总体规划的城市，规划由我们和亲爱的中国朋友一起完成，未来将发展成为一座智能港口城市。瓜达尔港将以重工业、制造业和石油化工为核心，通过设立特别产业区的方式向全世界开放，免税年限长达23年。”瓜达尔港发展局的穆尼尔·艾哈迈德已经开始展望未来这里的繁荣景象。

按照现在的蓝图，瓜达尔港真正建设起来后，能够解决200万工作岗位，并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深水港。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后，从迪拜到上海的运输路程将从10000公里缩短到3500公里。在能源安全领域，中国能够冲破美国等国家对中国形成的海上封锁；在经济意义上能够推动西部大开发；在军事意义上，瓜达尔港也有成为中国军港的可能性。

“愿景很美好，但是一切都站在成功实现‘中巴经济走廊’的基础上。如今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建设中还面临着巨大困难。”







日本早稻田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天儿慧向《凤凰周刊》直言。

首先是地缘政治和安全形势的问题。瓜达尔位于世人唯恐避之不及之处——被评为世界上最危险地带之一的俾路支。“基地”组织、宗派恐怖分子、反政府武装分子都在此山地安家。据了解，中国开发瓜达尔港的计划并非受到该地区的一致欢迎。2004年中国承建瓜达尔港工程时，3名工程师曾惨遭杀害。最近瓜达尔港也刚刚遭到袭击，致20人死亡。

在这个复杂的地区，美国、印度和阿富汗等国家都或多或少培植了势力，这些国家未必坐观中国打通中巴经济走廊，可能会利用俾路支的分离主义势力进行破坏。2013年10月，俾路支省内的火车被炸弹炸

翻，5人丧生。2014年6月，卡拉奇的国际机场遭遇袭击，造成40人死亡。

“中国的投资并非都能成功。过去10年，中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进行大量投资，据说近几年因为当地发生战争而损失惨重。”天儿慧说。

对此，穆沙希德则自信地称：“巴基斯坦和那些国家不同，至少我们还有强大的政府和军队。”近日巴基斯坦方面传出，政府将配备1.2万名安保人员把守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沿线。

“出动军队自然体现巴基斯坦政府对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决心，但是安保人员不可能永远在沿线守护，建好的工程也有被破坏的可能。”王军表示。根据其所在企业做的统计，巴基斯坦的人体炸弹和

■ 2007年3月20日，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出席瓜达尔港纪念碑揭幕仪式，当地民众聆听其讲话。当天，中国援建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正式启用。在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瓜达尔港基本上都处于闲置状态。

汽车炸弹等恐怖袭击事件为平均每月1-2起，袭击虽然不是针对中国人，但任何人都会有不幸“撞上”现场的可能。

王军在跑市场时遇到过“子弹满天飞”的场景，据说最动荡时，“铁哥们儿”也专门派出特种兵以确保中国企业人员的安全。“如果安全问题解决了，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巴基斯坦政府不需要出台优惠政策，各国企业都会纷纷涌入。毕竟这里还是有2亿人的市场。”王军感叹道。

（按照受访人要求，王军为化名）



# 香港股市的A股化隐忧

特约记者/凌德



4月8日，香港股市出现了近年罕见的辉煌灿烂的一幕。当天，恒生指数大升3.8%，收市报26236点，创下接近7年的新高；国企指数上涨733点或5.8%，报收13396点，创出近3年高位。

同一天，香港股市的总成交额也刷新了历史纪录，达到2524亿港元。其中，被视为港股表现“寒暑表”的港交所，股价更升到220港元，总市值高达28.6亿港元，首次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交易所。港股再创辉煌的同时，有些业内人士亦不免担忧，内地资金大举登陆，会不会导致香港股市的A股化。

## 再迎豪吃龙虾鲍鱼的时代

港股成交及指数在这一天均创出近年新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沪港通”的逐步落实。中央政府为了进行经济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决意扶持股市，在去年11月推出了“沪港通”，令南北水正式互通。结果A股一如所料率先爆升。相反，一河之隔的港股，在过去五

个月的表现却远远落后于A股。

直至今年3月份，中央政府突然宣布开放公募基金经过“港股通”买港股，内地保监会其后接力出招，容许保险资金投资香港创业板。内地股民视之为北水大举南下的“前奏”，于是一马当先，纷纷抢先杀入香港股票市场大炒特炒，刺激港股由4月8日起连升八天，在短短八天之内狂升了三四千点，每日成交量冲破2000亿港元，相当疯狂。

港股连日狂升，许多香港股民都“大有斩获”，全城沉浸在一片亢奋的氛围之中。有人沽货获利后购买新电话及相机，有人则选择豪花逾万元吃饭庆功。鲤鱼门快乐渔港酒家董事总经理罗谷瑜忆述，在过去一段日子，酒楼的晚市经常座无虚席，“客人的话题都是说股票赚到钱了，于是到酒楼吃饭庆祝。”

他说，一些豪气的食家，除了点加拿大象拔蚌、长脚蟹，更会叫龙虾、鲍鱼等贵价的食料，一席花逾万港元是等闲事，令酒楼生意额急升一成多。

另一边厢，港股持续上涨，也刺激了更多内地股民疯狂抢购港股。4月初，《凤凰周刊》记者在深圳多间银行发现，不少内地股民到银行开办“港股通”户口，有深圳散户更为可买港股而欢呼：“可以炒港股了！”

汇丰中国证券策略主管孙瑜戏称：“由于港股的估值较A股便宜，内地人到香港，最该买的再不是奶粉，而是便宜的股票了！”

而香港各证券大行对港股后市看法也愈来愈牛，纷纷上调港股目标。其中，摩根士丹利更吹起“摩笛”，索性把恒生指数目标价由26800点大幅调高至30000点，并且表示在最牛情况之下，恒指可达34000点。

然而，在北水南下游资涌港、恒指牛气冲天的背后，香港股市却不无隐忧。业界人士指出，虽然香港股市在“一国两制”下仍保有独立运作模式，包括政策法规环境及市场文化等，但随着越来越多内地资金赴港，港股正无可避免地进入了“A股化”的新常态。

之前为汇丰银行经济学家的香港《大



公报》财经主笔赵令彬指出,港市中大量内企及内地投资,在此情况下,日后港市走势将由A股主导。由此又将带来一些A股的特点,包括:一、波动更大更频繁;二、受内地政策特别是宏观及产业政策影响更大;三、市况将进一步与香港经济状况脱节。

对香港金融界来说,以上几方面,尤其以第一点的风险最受关注。由于投资者结构的差异,港股和A股一直存在较大的投资风格差异,随着两地金融系统的渗透愈加深入,香港股市极有可能会受到内地炒家有意地炒作,而动辄大起大落。

### 港股会否变成“政策市”

回顾历史,香港股市不时受到内地因素影响而出现大幅波动。最显著及令人难忘的一次是2007年,由于盛传内地将开放“港股直通车”,放北水来港买股而令港股急升,恒指突破三万点创出历史新高,但后来却因“直通车”未能实现,再加上金融海啸来袭,致港股大幅下调至二万点之下。

尽管如此,近年陆港两地金融市场的交流仍然日益频繁。根据港交所最新发布的《现货市场交易研究调查2013/14》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底止一个年度,不同类型投资者在香港股市交易中,本地投资者占港交所证券市场成交金额,由三成八升至四成五;外地投资者中,英、美的参与度依然高踞首两位,各占海外投资份额两成六。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内地投资者首次超越欧洲,成为港股第三势力,占比从一成一升至一成三。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期间,内地投资者来港投资,复合式年增长率达到两成八,升幅更是冠绝所有地区。换言之,发达国家在港股的参与度减低之际,愈来愈多内地投资者染指港股市场。

分析指出,愈来愈多内地散户参与港股,自然也会吸引内地庄家入场,把内地小盘股炒作模式带到香港市场。香港的创业板近年也因此逐渐沦为香港和内地庄家的“提款”乐园。

根据去年10月份出版的香港时政杂志《东周刊》统计,近两年上市的39只创业板新股,不少上市初期都狂升,其后却如断线风筝,现价较上市高位劲泻五成以上的有17只,比例达四成四,相当吓人。

例如,前年下半年上市的壹照明公司,主要在香港从事灯饰及家具产品零售分销。该集团前年只赚580万港元,按年大跌三成半,但挂牌首日却像吃了“伟哥”,一度较配售价五毫狂升逾十倍,市值冲上25亿,相等于市盈率四百三十多倍,叫人咋舌。不过,公司挂牌一周后突然发出盈警,理由是上市开支令大增,股价应声而下,至今由高位累积大跌八成,市值劲缩至5亿多元,但市盈率仍高达八十多倍。

另一只新股SDM Group公司,表现同样叫人啧啧称奇。公司在香港经营舞蹈培训业务,概念颇为独特,但前年才赚一千多万元,比上一年缩水近一成,去年首季更由盈转亏,基本因素并不吸引人。然而,去年该公司以一元五角配售上市,首日居然升上11元3角,爆升六倍,高峰时市值18亿,市盈率达180倍。即是假设盈利不变,小股东要等足一百八十年才能回本。

表面看来,创业板公司的股价大幅上升或下跌,乃游资和概念炒作,但香港金融

随着“沪港通”的开启,最近本港股连创辉煌,赚钱者又开始豪吃龙虾宴,但业内人士也担忧港股内地化,变成纯粹的政策市。

圈人士有另一番解读。分析指出,由于创业板都是全配售上市不设公开招股,上市前散户根本没有机会买货,有庄家于是先埋班加入,个别新股的最大承配人已占总配售股份一成以上,头二十大承配人更往往占了八九成以上货源,挂牌后再“搭棚”炒起股价,然后在高位派货向下炒。

大户赚到大钱,跟风上车的一众散户,

眼见股价大跌,却往往走避不及而血本无归。由于陆港两地股市监管有灰色地带,除本地散户外,据悉,内地股民和被迫要在香港投资七年的投资移民也有中招。有人在内地用“传销方式”兜售创业板股票,入场费低至数千元每人,个别创业板半新股甚至疑卷入投资骗局。

一向研究细价股的香港资深股评人吕志华批评,近年香港创业板已沦为大户提款机,港交所容许全数配售上市,等于鼓励庄家“合法”造市。他说,“创业板虽然规定新上市公司最少要配售给一百个专业投资者,但现实却是庄家很容易控制货源,然后炒高股价,等散户接火棒。”

香港财经评论员梁海明认为,中央政府开通“沪港通”,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吸引外资前来投资A股,改善A股市场的投资者结构,进而推动A股进一步国际化、市场化。如果港股真的A股化,沪港股市将会双输。

香港立法会金融服务界议员张华峰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认为,在“沪港通”开通之后,港股与A股越来越唇齿相依,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因为港股和A股市场两地的监管和法制不同,在短时间内港股较难A股化。但他也承认,内地资金及企业加强参与港股市场,肯定带来不少冲击。

张华峰指出,内地股市投资者的习惯、投资文化跟香港市场不一样,香港向来以基本因素、实质投资价值选股。内地A股常被视为政策市,受官方政策及消息动态左右,投资者对基本因素也不大重视。股市经常因为一些风吹草动便大起大落。如何保持香港原来的做法,如何避免港股A股化及跟国际市场脱钩,是一大重要课题。

他指出,港股正在进入资金不断上升的时代,但“北水”越多,香港越需要坚守国际标准、规范,政府、监管机构更需要竭力保持香港市场的公平公正,不能为了迁就“北水南来”而放宽监管准则或透明度,更不能为内地机构及投资者另订游戏规则。只有这样,香港才能保住国际金融中心位置。

编辑 段宇宏 美编 黄静



# 郑永年： 政商关系必须有，但需厘清边界

记者 / 孙杨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015年，中共持续两年多的反腐败行动已渐成常态，仅前三个月就又有郭正钢、仇和、徐钢等20余只党政军内的“大老虎”相继落马，有媒体统计，十八大以来落马高官已过百，而在受贿官员中，官商勾结的占100%。

另一方面，面对反腐高压，一些地方的官员出于“求稳、怕出事”的心态，则趋于不作为。据媒体曝光，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员甚至为了“避嫌”，不接电话，不批文件，走向“懒政”、“庸政”的另一个极端。

早在2013年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就曾发表对政商关系的见解，他表示：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

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现在，面对这两个极端，政商之间是否需要保持联系，应该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再度成为热议话题。

2015年博鳌论坛期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此接受《凤凰周刊》专访，透过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等国际视野，为中国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建言。

## 政商关系必须有

记者：在十八大以来中共反腐行动中，大部分落马贪官背后都有官商勾结、利益交换现象，这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是否已成为大陆经济发展中的桎梏？

郑永年：首先必须要承认，政商关系的问题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以亚洲为例，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都因为建立起了特殊的政商关系，迅速实现经济腾飞，并且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无一不是由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起更好的引导作用。

以日韩为例，政府、企业、官员建立起具有特色的、非常

紧密的铁三角关系，是其经济崛起，赶上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地区具有特色的中小型企业，也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相比之下，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政商关系发展得不好，就出现了腐败、排华等现象，影响经济发展。中国出现的官商勾结和腐败也属于没有搞好政商关系的结果。

现在我们提到政商关系，往往只讲它的负面影响，一提政商关系，巴不得一点都没有。实际上，很多国家恰恰是因为建立不起政商关系而经济不发展。在中国，政商关系几千年来都一直存在，现在也必须有，没有会很麻烦。真正的问题是，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政商关系。

记者：在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企业发展亟须转型的当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商关系？

郑永年：构建健康的政商关系，首先要明确政府的边界在哪里，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在中国，政商关系几千年来都一直存在，现在也必须有，没有会很麻烦。**

现在，很多地方官员的权力很大，影响太广。很多人一提到政商关系，就会想到官商勾结和腐败。实际上，政治和商业之间，有许多合作渠道，利益勾结和腐败滋生并不是唯一途径。

习近平一直强调，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一点很重要。在中国大陆，政府干预经济是几千年来的传统，而现在也同样，一些基本事实不会发生改变，比如不会出现大规模私有化、国家不会放弃资源控制，如土地等，企业家和社会的权利很少，如果一些握有权力的官员因为反腐高压而选择不作为，民营企业因为没有权力也无法作为，资本就会往外跑，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政商关系必须转型，形成“新生态”，以更好地适应发展。

记者：在世界范围内，构建政商关系有什么成功的例子可借鉴？

郑永年：新加坡是个很好的例子，通过立法、成立商会等方式，规范政府与企业间行为，理顺政商关系。

在中国，几千年来都宣扬道德主义，要求官员自我约束。



## 反腐败与建设政商关系不仅不冲突， 反而是打造良好政商关系的一部分， 通过反腐，可以清除官商之间 以往存在的不正常关系。

在这方面，现实主义的李光耀的经验则是，建立良好的政商关系要从人性的弱点出发，要解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这两个群体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不能给政府官员合理的利益，腐败就不可避免。

为了让政府官员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又不变得官僚化，李光耀采取的措施之一是高薪养廉。一方面，让官员体面地工作，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与企业进行人才竞争。现在看来，这样的制度很有效。

好的政商关系也需要从国情出发，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不能盲目照搬。例如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因为建立起了适合的政商关系而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后来也出现了腐败丑闻，所以也一直一直在调整政府与企业的权利边界。

### 厘清政商关系边界

**记者：**也就是说，中国要建立适合的政商关系，首先需要厘清权利的边界？那么这个边界应该在哪里？

**郑永年：**是的，中国经济若想继续发展，必须要确定政府和企业各自的权利边界，然后把它制度化。

例如，经济领域和社会领

域要分开，经济领域就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让企业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但是在一些社会领域，如福利保障、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等，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现在的一个矛盾是，社会领域被当做经济领域发展，教育、房地产等都成为支柱产业，医药成为暴利行业。

虽然在一些完全市场化的欧美国家，企业可以起主导作用，但是从日本、韩国、新加坡模式来看，政府在社会领域起主导作用也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记者：**你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式反腐与建立起新型政商关系是否有冲突？反腐会对中国政商关系变化产生哪些影响？

**郑永年：**我认为，反腐败与建设政商关系不仅不冲突，反而是打造良好政商关系的一部分，通过反腐，可以清除官商之间以往存在的不正常关系。

两年多来，中共新一届政府进行的反腐败成效很大。王岐山强调，反腐应该标本兼治，我认为是很对的，反腐败不能只停留在运动式的层面，要形成制度确立下来。反腐的最终结果，不是用数量来衡

量，而是能否形成一套长期有效的机制。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都是通过法律设立一个制度明确、队伍齐全的廉政机构，将反腐制度化，这个方法值得中国内地借鉴。

另一方面，将反腐落实为制度，还需要足够的外部制约。也就是说，反腐要增加透明度，相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比如官员的财产公开、公务员的收入透明化。全世界所有廉洁度较高的社会，都是因为内部和外部的制度建设同时都做好了。

当然，高压式反腐也需要提防另一种负面效应，即导致官员不作为的可能。过去，官员的政绩与GDP挂钩，官员知道目标在哪里——只要搞好GDP就可以了。现在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GDP不断淡化，反腐则保持高压状态，如果没有确定政商关系的边界，政府官员和企业都不知道做什么，可能连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正常沟通都干脆停止了。如果政商关系没有了，政府也不作为，企业也不作为，社会 and 经济发展就会停滞。

以廉洁政府闻名的新加坡，官员也长期生活在反贪局以及全社会的监督之下，为何没有出现不作为的情况？一方面是官

员有足够高的工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御金钱诱惑。另一方面，公务员的任务很明确，每年都有评估。既有激励又有监督，这就有助于建立起正常的政商关系。

**记者：**中国应该从何处入手，建立起激励和监督体系，将政商关系的边界制度化？

**郑永年：**我觉得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已经给出答案。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公务员的工资可以根据市场来确定，而不是像过去一味要求奉献，强调自我道德约束。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化。如果把这两次会议共五百多条改革意见全部细化，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标准落实下来，明确每个官员应该做什么，就可以确定好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说到底，就是要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划定企业经营边界，从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



# 中国水治理的新常态



陈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湖北水事中心研究员

春夏之交，中国国务院于2015年4月16日正式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总计10条，35款内容，238项具体治理措施，下称“水十条”），被认为是继“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又称“大气十条”）之后，中国大陆又一个历史性的“环境时刻”。

回顾大陆多年治水历程，曲曲折折，意愿总与现实相抵触，理论常与实践相背离。尽管中共高层、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水环境保护工作，投资巨大，花费不菲，但效果不彰：水环境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遏制，形势严峻；水污染被称作“最基本的伤害”之一，严重影响公众的基本生存权和环境权，危及社会稳定。

梳理其中原因，治水思路单一、狭窄与易变可谓主要的原因。

长期以来，环境保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具主义思想盛行，大陆相关部门重项目轻管理、重技术轻体制、重资金轻创新，以孤立、短视的方式应对水危机，将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水生态保护割裂，使水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脱节；政府单兵突进，运动式执法，治理水平偏低，旧患未去新患又至，积重难返，区域性、复合型、压缩型水污染日益凸显，水环境容量不断超载，水安全岌岌可危，终于酿成总体性环境危机。

总体性危机当然需要整体性应对——今天的水治理，不再是环保的单一行动，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环节、多方面的总体战。

正如“水十条”指出的，必须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这也意味着，传统治水思路和做法行不通了，水治理需要以整体、全局、系统理念为指引，进行全方位的升级。

## “水十条”精要

“水十条”秉承系统治理、

今天的水治理，不再是环保的单一行动，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多环节的  
总体战。必须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  
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

底线治理、整体治理的思维，打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局，跳出就水论水的怪圈，将水污染治理、水资源保障、水安全维护提升至环境法治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层面，予以理念重塑和制度重构。通过反思过往治水思路，“水十条”阐释了新的治水思路，这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治理水环境的纲领性文件与总体路线图。

“水十条”对水污染治理提出了总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阶段性改善，到2030年力争总体改善，到2050年实现生态良好。这一目标立足现实，理性谨慎，与国家环境保护的战略目标大体吻合，亦与环境法治转型、环境治理改革基本同步，体现出前瞻性和现实性结合的精神。

其一，融水治理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深化改革思维贯穿始终。水治理任务艰巨，必须依靠深化改革，通过创新加以推进。

“水十条”在238项具体治理措施中，有136项是改进强化的措施（提高污水处理标准等），有90项是改革创新措施（对超标企业实施“红黄牌”管理等），还有12项是研究探索性

的措施（研究建立国家环境监察专员制度等）。

其二，注意水治理与经济联动，倒逼经济转型。“水十条”注重经济结构调整，注重总体谋划，把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刚性约束，以环保倒逼产业结构调整 and 空间布局优化，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运用水环境保护这把“手术刀”、水环境质量考核这根“指挥棒”，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建立新的发展模式，以契合未来将更加生态化、低碳化经济新常态，对经济整体健康稳定发展起促进作用。

其三，放大市场机制，激活环保产业，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在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水十条”明确了水污染防治的新方略，以水环境保护倒逼经济结构调整，以环保产业发展腾出环境容量，以水资源节约拓展生态空间，以水生态保护创造绿色财富，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提供重要支撑。

据测算，“水十条”通过加大治污投资力度，大幅提升污



染治理科技、环保装备研制和产业化水平等措施,为环保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将带动环保产业新增产值约1.9万亿元,其中直接购买环保产业产品和服务约1.4万亿元,使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四,把握水要素特点,厘清政府职能部门权责,强化部委的分工牵头,推进部门之间协调联动。“水十条”立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自然资源的双重属性,打破区域、流域和陆海界限,打破行业和生态系统要素界限,实行要素综合、职能综合、手段综合,建立与生态系统完整性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形成从地表到地下、从山顶到海洋的全要素、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生态系统一体化管理,维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以及生态系统健康。

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水十条”统筹兼顾各部门职责,各类水体保护要求,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充分调动发挥环保、发改、科技、工业、财政、国土、交通、住建、水利、农业、卫生、海洋等部门力量,开创“九龙”合力、系统治理的新气象。

其五,汲取“大气十条”经验教训,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政府责任。“大气十条”首次提出,组织部门参与治理考核,结果作为各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评的重要依据。对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行为,严格问责。这说明,治理指标不再是软约束,而是关系官员位子、帽子的硬杠杠,释放出“动真格”的倒逼压力。鉴于此,“水十

条”责任主体更加明确,每一项举措均明确了牵头、参与和落实部门。着力推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体现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推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把党政“一把手”的环保责任落实到位。

上述种种举措,权责的明确和问责机制的完善,让“水十条”落实更有力度。考核机制的绿色化,将成为有力的指挥棒,督促各级地方政府真正重视水治理工作。

其六,推进水环境多元共治的新机制。按照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环境管理转型的总体要求,“水十条”提出,改革创新水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依法施策与市场驱动并举,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多主体共治,推动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从政府一元管理走向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多元共治。

最后,注重地方政府跨界协作,寻求流域、区域单元重点突破。区域性水环境质量改善是未来治水思路的突破点:与大气污染不同,水域有上下流域之分,往往涵盖的区域比较多,因此需要分流域进行不同地方政府间的跨界协作,所以建立区域联防联控协调机制是污染治理的必要措施;“水十条”突出重点,将7大重点流域、9个重点河口海湾、3个重点区域、36个重点城市作为重中之重,以硬措施落实硬任务;强

化调度管理。

将生态流量纳入水资源调度方案,区域水资源调配及水力发电、供水、航运等调度,要服从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切实保障生态流量。上述诸多提法,颇有新意,对正在呼声日益高涨的流域立法具有直接指导作用。

### “水十条”隐忧

尽管“水十条”出台后,普遍评价颇高,认为其决心大、措施实、发力准。但静水流深,平静之下的隐忧不容小觑:

首先,是否会出现实施赤字?制定“水十条”只是第一步,落实这些措施必然会面临不少挑战。这既是因为过去多年水环境保护“欠账”太多,也是因为这一行动涉及到江河湖海及地下水等方方面面,问题复杂,任务艰巨。能否在2020年、2030年如期完成已经明确的工作目标和主要指标,对有关方面是不小的考验。而且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刚性约束,最严格的水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明确的地方政府考核等系列“紧箍咒”,会极大地触动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奶酪”,引发反弹。在现有的体制机制制约下,

**环境政策往往先是执政党和国家意志的表达,随后才转化为法律表达。长此以往,环境法的身影会愈发孱弱,可能有损法治的权威。**

“水十条”的实施要吸取“大气十条”实施过程中的教训,比如,部分企业直排偷排严重,点状排放、游击作业成为污染防治的“硬骨头”,这说明新《环保法》威慑力不够,地方部门执法偏软,问责不及时。再如,环保部负责人透露,行政管理部门指使监测站编造、篡改监测数据的情况时有发生。依法治水,环保“高压线”要发挥作用,需要严格执法、严格考核,及早应对,防止制度空转与制度疲软,避免“实施赤字”。

其次,水污染防治新机制是否能运转顺畅?由水资源的内在机理决定,水环境质量改善涉及生产、生活各领域,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开发、管理等多方面,关涉利益主体众多,利益博弈明显。要有序整合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监管力量,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实施系统治理,强化水环境的统一监管,仍是一个长远目标。在现有整个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改革未获得重大突破之前,水污染防治新机制的建构与事实任重道远。

最后,政策优先于法律是否会损害法治权威?政策先行,政策治国,也许只是当前中国应对环境危机、环境法律不好用以及环境法治滞后的权宜之计。环境政策往往先是执政党和国家意志的表达,随后才转化为法律表达。长此以往,《环境法》的身影会愈发孱弱,可能有损法治的权威。





龙泉驿远眺

# 龙泉驿：车轮上的“桃花源”

世界那么大，我只想去龙泉驿

龙泉驿，车行无疆，驿路如画，一座世界级汽车产业城，一座国际化生活品质城。

记者/金兑

成都，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捧一碗茶，把自己窝在藤椅里，看熙来攘往、云起云落。

龙泉驿，一个“不想走只想留”的地方，驾一辆车，把自己嵌进风景中，赏华盖云集、花开花谢。

龙泉驿，地处成都东部，为成都市东部副中心，素有“四时花不断，八节佳果香”之美誉，是国务院正式命名的“中国水蜜桃之乡”。

2014年10月，“天府之国”四川接连收获的两份“大礼”都与龙泉驿相关：一份来自国家：2014年10月2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天府新区，西部第五个国家级新区花落蜀中，囊括龙泉驿；一份来自企业：2014年10月16日，总投资123亿元的神龙汽车第四

工厂在成都龙泉驿区奠基，将为蓉城贡献36万辆汽车的年产能。

这两份大礼交汇于龙泉驿，让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城吸引了四川全省乃至全国的目光。在上述国务院的批复中，天府新区将以龙泉驿为主要地区布局现代制造业；而随着神龙汽车项目的开建，龙泉驿汽车产量继连续三年实现“产业倍增”之后，2015年总产量超“百万辆”的目标更是近在咫尺。

如果你就此认为龙泉驿是一个充斥着钢筋水泥的工业城镇，那就错了。龙泉驿还有婉约的一面：每年3月，15000亩桃花竞相绽放，沿着蜿蜒崎岖的道路向山上行进，两旁桃枝斜出，将娇俏的桃花送到游人面前，清脆婉转的鸟鸣声与阵阵桃花香味交相呼应，若即若离。要不是一座座现代化的小楼

呈现在眼前，这种景象会让人误以为进入了晋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别处是“人面桃花相映红”，龙泉驿却常常上演着“车城桃花相映辉”的景象。

“桃花”“汽车”是龙泉驿区两张亮丽的名片，也体现出了这个城镇的独特性——一方面，汽车等现代制造业让龙泉驿成为了四川县域经济的标杆、样本，全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一座世界级汽车产业城正在中国西部快速崛起；另一方面，“桃花”等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条件又让龙泉驿具有打造宜居天堂的底气与资本，一座以“居住在龙泉有安全感、生活在龙泉有幸福感、工作在龙泉有成就感、走出龙泉有自豪感”为表现的国际化生活品质城正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在龙泉驿，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



化,两条并行的铁轨,承载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列车,正快速前行。

## “东川门户”:驿路美如画

龙泉驿,顾名思义,是一个驿站,也是一个交通地位十分重要的地方。其坐落在来往重庆与成都之间的“官道”上,扼蓉城咽喉、居川渝要冲,有“东川之门户”“东出锦城第一驿”之谓。明朝时,“龙泉驿”三字正式见诸史册。1927年,当时四川省政府动工修建成渝公路,确定经过龙泉镇,彻底巩固了这里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使龙泉驿从一个驿站上升为现在副地级行政区。

1949年以后,龙泉驿作为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更是被不断强化。特别是新世纪初始,成渝经济区浮出水面,龙泉驿随即成为了衔接成渝两大都市的枢纽。龙泉驿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如此介绍龙泉驿的位置:“龙泉驿中心区域距成都市中心12.6公里,距双流国际机场28公里,居川渝要津,是成渝经济走廊的桥头堡;东大街东延线等五条大道与成都市中心紧密相连,成渝高速、成南高速、成渝铁路、成昆铁路穿境而过,通过成渝高速公路可至广西出海,通过沪蓉高速公路可直通上海;以成渝高速公路、成南高速公路、成洛路、成龙路和三环路、外环高速路、成环路为主的“五纵三横”城市干道和交通道路网络覆盖

全境;拟建设的成都东西向的城市轻轨铁路直达城区中心。”

而对于去过龙泉驿区的人来说,他们对这里交通的便利或许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龙泉驿主要公路干道最低为双向8车道,部分路段甚至达到12车道,城市干道均按照“高尔夫”坡地景观打造理念设计建设,绿化带宽100至200米,设有步行健身道、楼台亭阁、儿童游乐园、风车水景、乒乓球桌等景观设施,人行其中,犹入画卷。

2014年10月26日,在众人期待中,成都地铁2号线东延线“文明成都”专列从成都行政学院站缓缓驶离,开往东延线目的地龙泉驿站。这条地铁的开通则更让龙泉驿成为成都市近郊中心区快速通道最多、交通环境最好的区域。现在到龙泉驿区,无论是乘坐地铁2号线还是自行驱车,用时不过30分钟。

其实,交通便利的背后是龙泉驿人对这座古城城市规划的雄心:打造国际化生活品质城。正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咎宝毅所说:“发达的交通枢纽是龙泉驿区建设国际化品质城的重要平台”。

这种雄心还表现在对龙泉驿进行科学城市规划方面。据龙泉驿区发改局副局长段贵全介绍,《龙泉驿区新型卫星城总体规划》提出了北部新城带动区域发展、生态网

络构建空间格局、组合城市群架构全域体系等规划策略,充分梳理和完善区域交通、产业、结构、配套、文化等方面内容。“规划通过显山、露水、融绿、塑格局的策略,打通望山视廊和俯视视廊;构建高层建筑簇群集中分布区,展现现代城市风貌,形成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组合型卫星城。最终实现龙泉驿山、水、绿等自然要素互相融



沃尔沃成都轿车基地



一汽大众总装车间



经开区城市中的田园风光



合,建筑图底分明,统一性与多样性兼顾的城市形态。”

到访的专家经常评价说,龙泉驿区在城市建设和城市功能的完善上下足工夫,整座城市的承载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 “龙泉驿造”:60秒生产一辆汽车

国际化生活品质城的建设离不开强有力的经济支持。2015年1月,中共成都市龙泉驿区委书记廖仁松在区委经济工作会上总结2014年经济状况时曾面露喜色说:“在汽车主导产业强力拉动下,2014年龙泉驿区地区生产总值达944.6亿元,占到了全市经济总量的近十分之一,位居全市第一,即将率先迈进全省县域经济千亿俱乐部;增长速度达12.7%,分别比全国、全省、全市高5.3、4.2、3.8个百分点,领先发展势头强劲;规上工业利润增长16.2%,高于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0.7个百分点……”截至记者发稿时,2015年第一季度的龙泉驿GDP虽然还未统计结束,但继续飙升的状态应是无疑的。事实上,这片土地上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已经不是第一次领跑全国、全省、全市的平均值了。2014年8月16日,四川省统计局发布2013年县级经济综合评价结果,龙泉驿就已跃居榜首。

汽车,让龙泉驿在面对全国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下

“迎风挺立”。龙泉驿之所以能够与汽车结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该地是成都(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在2014年10月批准的天府新区总体规划中,又被列为“一带两翼、一城六区”空间布局中的高端制造业产业功能带和高端制造产业功能区,其核心是以汽车研发制造为重点,发展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业。在2015年3月,《人民日报》曾如此描述龙泉驿汽车的发展现状:

“在天府新区龙泉驿片区,随处可见‘以秒为单位’的生产节奏:5秒钟,一块厚重的钢板冲压成型,51秒搭起一辆汽车的整体骨架,不到60秒,生产线上开出一辆崭新的汽车”。另一项数据或许更能说明龙泉驿汽车产业的位置:从四川2013年的整车产量看,“龙泉驿造”数量为72.3万辆,对全省贡献89.6%,可谓“四川造”十之有九在龙泉驿。

目前,随着大运汽车项目竣工投运,东风神龙乘用车成都基地开建,中法成都生态园、沃尔沃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和一汽大众四期等一批重大项目的相继入驻,成都经开区已经累计引进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吉利、沃尔沃等11家整车企业,搭建了年产170万辆整车生产平台和汽车千亿产业集群。

不仅如此,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创新体系也在悄然成型。在一汽大众成都分公司,全新的自动化焊装车间设备开动率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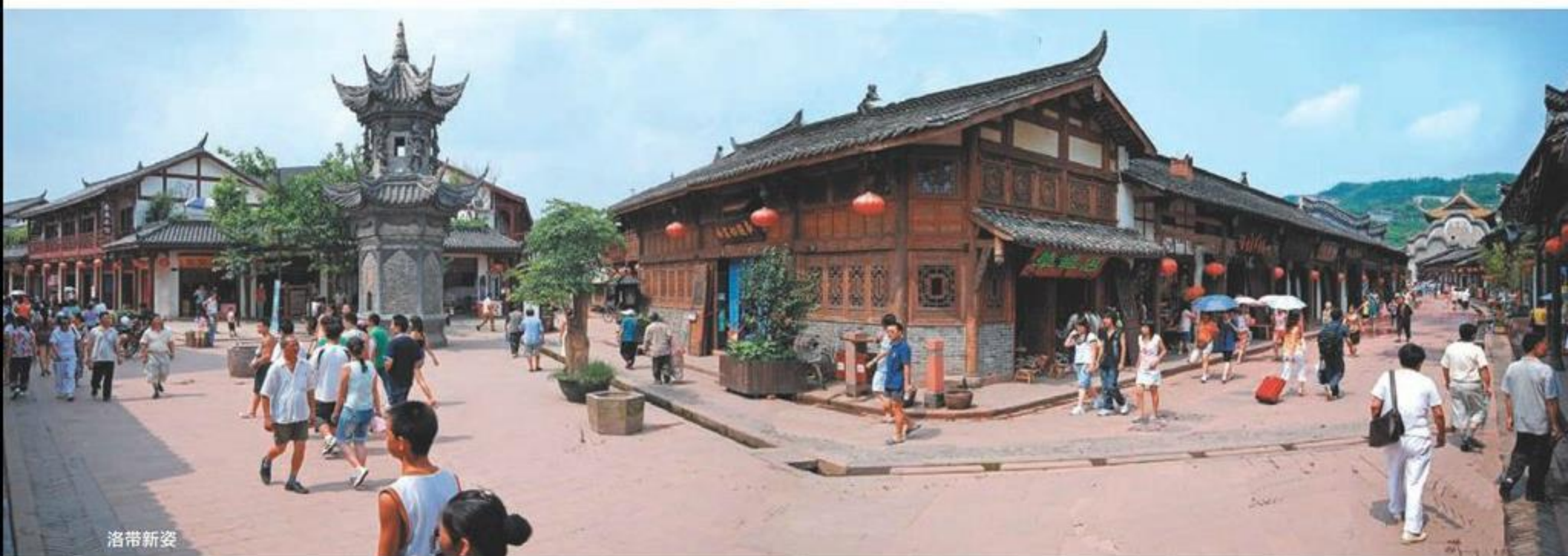
高可达95%,在国内汽车企业中处于领先水平。57台国际领先的激光焊接机、362台机器人各司其职,通过巧夺天工的“裁缝”,让一堆散乱的零件变成一辆完整的汽车,这种创新的焊接技术比传统技术节约近50%的能耗。此外,以成都汽车产业研究院为创新服务龙头,已经聚集了75家高新技术企业和46家创新型企业。

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上述成绩的取得并不容易。“从2005年至今,龙泉驿区的汽车产业发展已经有十个年头,龙泉驿也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龙泉驿打造的成都国际汽车城也初具规模,这个过程也艰辛地走过了多个阶段。”国家级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投资服务局投资服务处处长谢兴云感慨道。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最开始阶段,龙泉驿区的招商团队曾全国奔走,不放弃一点可能性,直到一汽的入驻,才打开了僵持的局面。2005年5月,一汽签订了入驻龙泉驿经开区的协议,铸写了龙泉驿区汽车产业的开篇。

付出终有回报。汽车城十年磨一剑,就像埋下一粒种子,龙泉驿全体动员浇灌它,把它培育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 “绿肺”:带你去看桃花源

阳春三月,又逢植绿好时节。3月15日,



洛带新姿





龙泉驿区委书记、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廖仁松，区长、经开区管委会主任何勋等260多名机关干部、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共同植下了8300株苗木，以实际行动为生态龙泉山添绿，为生活品质城添彩。

对于以汽车为主的现代工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孰轻孰重？龙泉驿人有着超前的认识。“在推动区域经济科学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有现代化的城市形态、高端化的城市业态、特色化的城市文态，更要有优美化的城市生态。”段贵全说，近年来，龙泉驿区的生态环保工作紧紧围绕“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旅游兴市”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省级生态市等创建工作。2013年，龙泉驿区还成功创建全省美丽乡村先进县（市），并顺利通过省级环保模范城市验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年3月，成都龙泉驿都要举办被国家旅游局正式命名的“中国·成都国际桃花节”，每到此时古驿龙泉完全进入节庆活动的氛围。前往赏花观景的人、车辆挤满了龙泉山，这里成了花的海洋，人的海洋。

说到桃花节就不得不提桃花故里景

区。据桃花故里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桃花故里旅游景区位于老成渝路20~34公里段龙泉山脉中西部的山泉镇，平均海拔900米，气候适宜，是一个特别适合水蜜桃和枇杷生长的地方，1987年被国家农业部定为中国三大水蜜桃基地之一。2003年，胡锦涛来到桃花故里风景区山泉镇，盛赞花果山的美丽风光：山好，水好，风景好！

“作为拥有龙泉山脉良好生态本底的龙泉驿区，还扮演着成都‘绿肺’的角色。”龙泉驿区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说，为了给这样的生态本底增加更加绚丽的色彩，龙泉驿区正合理加快建设东风渠绿带、“198”森林绿带、生态楔形绿地、东山森林“绿肺”等重大绿色基础设施，正逐步构筑起“一带一心三纵三横多区域”的田园生态体系，将大力营造城市湿地系统和城市园林景观。

一幅“城在景中、景在城中、城景相融”的生态田园城市画卷已经展现。6年来，龙泉驿区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100多亿元，240亩洛水湿地公园和1290亩环城生态区“花田湿地”建成开放，新建邮票绿地30个，新增城市绿地面积17.4万平方米……

除了自然景观，龙泉驿的文化景观同样熠熠生辉。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洛带客家古镇。

这座位于龙泉镇北10公里的小镇建于三国蜀汉时期，传说因蜀汉后主刘禅的玉带落入镇旁的八角井中而得名。镇上居民中客家人有2万多人，占全镇人数的九成，故有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之称。镇内千年老街、客家民居保存完好，古建筑群落规模宏大、雕梁画栋，老街呈“一街七巷子”格局，空间变化丰富，而且有婉转清流飘街而过；街道两边明清建筑风格商铺林立，游客置身其中，闻客家乡音，品客家民居，赏客家民俗，即可感悟到百年客家历史文化的精髓。

然而，时间并未完全停止在过去。在洛带古镇核心区域，孕育出了一个融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新精神的文化产业珍品：“中国艺库”。“中国艺库”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也就肩负了一个重要使命，那就是以创新驱动整个洛带古街提档升级、丰富业态，全力打造一个更具活力、更具吸引力的艺术古镇。在中国艺库的街区，美术展览馆、艺术机构、艺术主题客栈、情景剧场等随处可见，艺术家们把自己对艺术的体会融入到了一个个场馆中，来到中国艺库的人们在游玩、看展览、购物、喝咖啡、吃饭等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得到了高品质的艺术享受。

据了解，中国艺库正和全国大型旅行社全面商谈，开发以中国艺库为中心，辐射整个成都的成都古镇旅游全新黄金路线，形成最高端的文化消费圈层和最大的文化财富磁场，将洛带古镇打造成为“成都新天地，洛带不夜城”。

从汽车到桃花，从洛带古镇到中国艺库，从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城到建设国际化生活品质城，龙泉驿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到底应当如何评价这里，或许供职于一汽-大众的一名工程师的话颇具代表性：在这里，可以春赏桃花的浪漫，夏品枇杷的甜蜜，在至真至纯的自然意境中，聆听大自然跳动的脉搏，在如诗如画的栖居意境中，畅享现代都市的繁华与文明。

来成都，带你去喝茶，安逸得不想走；到龙泉驿，带你去看车轮上的“桃花源”，巴适得只想留。



# 2015: 英国迎来最难预测大选

20世纪大多数时间两党对抗的局面正在经历变革，小党派的崛起正在挑战英国的政治生态和未来政府治理与决策模式。

特约撰稿 / 柯昱强 (发自英国伦敦)



2015年适逢大选年。虽然全球媒体已将目光转向美国，一场或许能够定义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以及欧盟未来的选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5月7日，五年一次的大选将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举行。这也是英国下议院的第56次大选，地方选举也同时进行。

今年的英国大选亮点纷呈。除了全民健保（或称NHS）、公共开支、移民政策和英国在世界中的位置等传统英国议题外，即将举行的这场大选还可能重新定义英国在欧盟的位置。更重要的是，随着选战的开打，英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愈发明显。

2010年的选举先是产生了1974

年以来的首次“悬浮议会”，即无多数党议会。当时，保守党赢得了650个下议院席位中的306个，距离326多数差20席；工党在布莱尔和布朗执政13年后仍赢得258席，两大党席位总数超当年的86%。

那场选举把一度没落又并不起眼的自由民主党和其党魁克莱格带





分析人士说，即便英国保守党赢得选举并试图改变其与欧盟的关系，也要涉及欧盟范围内的条约变更。这可能意味着欧元结构的改变。

到了英国政治的中心，从而形成了保守党、自民党和工党的三角政治组合。随后，保守党党魁卡梅伦出任首相，克莱格成其副手，工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由党魁米利班德代表。

## 民族主义政党崛起

不过，在过去的五年内，英国政治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原本更不起眼的小党派正迅速崛起，成为英国政治话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场选举可能预示着我们熟知的（政治）系统的终结，”英国《卫报》副主编怀特（Michael White）在4月的一篇专栏中写道。

这一说法不无道理。至少在五年前，极少数党派，诸如绿党、苏格兰民族党（SNP）和英国独立党（UKIP）在大选中获票仅6%，其在议会中也占据极少席位。然而最新的民调显示，这些小党派在此次大选中将至少各获票超过5%。

这其中，民族主义政党正在迅速崛起。在苏格兰，去年大闹独立的SNP表现甚至可能将超过工党。另一个在大选中惹人注意的政党是由法拉吉领导的英国独立党（UKIP）。党如其名，该党在欧盟和移民等问题上十分强硬。

虽然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法拉吉的言论十分过激且不可理喻，但自2004年在欧盟选举中崭露头角以来，UKIP已成为英国政治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去年的英国地方选举中，UKIP也获得超乎寻常多的支持。

在4月初英国独立电视台（ITV）举行的七党（除了上述六党外，还有威尔士党）联合辩论中，法拉吉的表现最佳，民意调查中占24%；而米利班德是21%；卡梅伦是19%。这次仅有的联合辩论中，法拉吉批评英国

的全民健保项目过于宽厚，因而被一些外国人利用，成为他们的“健保旅游”项目。同时，他还将英国目前的财政与社会冲突窘境归咎于合法和非法的外国移民。在他看来，在英国携带艾滋病毒的人也多为外国人。

## 两党制的崩溃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政治生态的转变，仅表现出英国民众对传统和主流政党正丧失信心与兴趣，不会长久下去。不过，欧洲大学学院的政治学者丹尼森（James Dennison）对《凤凰周刊》表示，这一变化已经在深刻影响着英国政治的运作和政府决策的方式。

“SNP目前已经在苏格兰议会中不时赢得选举，而UKIP近年来在欧洲议会赢得许多席位，更不要说一些掌控地方议会的小党派了，”丹尼森说，“这些结果将会产生实际政策影响，正如我们从去年苏格兰公投中所看到的那样。”

丹尼森认为，对20世纪以来通常两党对抗的英国政治格局来说，最大的影响是，这让英国的政治更加不可预测。“过去通常是比较清楚谁会赢什么席位，从而预测到下一届政府将由谁来掌控，但小党派的兴起大大减小这些过去所谓的‘安全席位’。”

比如，根据目前民调，UKIP可能在5月的大选中赢得超过100席，这已经让无论工党还是保守党都胆战心惊，因为UKIP气势凶猛地动了他们的“奶酪”。丹尼森特别指出，在苏格兰，小党派的兴起还在让更多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民众参与到政治中来。不过，这一参与度究竟如何，还要等大选结束后见分晓。

在政府决策和运行方式上，最新的多份民调显示，由于今年的大选

■ 2015年4月20日，英国克鲁郡，英国首相卡梅伦和财政大臣奥斯本造访火车维修厂，为大选造势。





■ 2015年4月18日，英国拉姆斯盖特，英国独立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举行公共会议为大选造势。

将不会有某个政党取得多数席位，这样可能要让某两个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与五年前的那一次选举相似；或者，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政党达成某种协议，由某个政党执政。

截至4月21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选举预测数据显示，目前执政的保守党将获得33%的票数，工党为34%，英国独立党（UKIP）14%，正与保守党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为8%，绿党6%，其余党派6%。

若这种情况持续，由米利班德领导的工党就要和其他党派进行组合联合执政，成为名义上的多数党，入驻唐宁街10号首相府。虽然此前米利班德公开否认会与SNP“联合执政”，但媒体猜测，若这一趋势持续，工党最终获得SNP支持的可能性更大。

目前的预测是，SNP可能在5月大选中赢得苏格兰59个议席中的56个左右。虽然从整个英国范围来看，其获票不会超过4%，但赢得议席的

数量将会近10%。

工党与SNP均未对此进行明确表态，保守党却已经开始大喊这样的安排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除了党魁卡梅伦以外，英国前首相梅杰亦发表看法说，一个由SNP支持的工党政府将成为“制造混乱的食谱”。梅杰认为，这种情况将让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SNP“敲诈”工党。

## SNP的一种策略？

若这一情况最终发生，则意味着工党在宣布执政前需要和可能支持它的SNP进行谈判。在英国，SNP的独立倾向并不为人陌生。虽然去年其承认“苏独”运动受挫，但却并未明确表示放弃这一努力。

有评论人士担心，作为扎根苏格兰的政党，SNP并不会将整个英国的利益放在其政治议程中的首位，最终可能会开出一些影响到英国整体利益的条件。“它（SNP）的兴趣在于能为苏格兰获取多少好处，”英国

《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如果它的要求损害了英国其他地区的利益，它可能不认为这是附带损害，而是附带利益。”沃尔夫接着说，“英国越弱，其留在欧盟的可能性就越小。”

对于质疑，SNP的女党首斯特金4月宣称，其所代表的不仅是苏格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英国的利益”。“我们会让你的声音在西敏寺更大声和清楚地被听到。”不过，许多分析人士说，“这只是SNP的一种策略。”

丹尼森则认为，情况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更有可能的是，工党和SNP达成协议，同意与其一同投票，或者在基于具体议题上完全不投票，从而获取一些让步，而非（苏格兰独立）公投。比如让苏格兰议会有更多下放的权力。”

大选前夕，英国三大党也频频就移民问题发表演说，移民俨然上升到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总的来说几乎都是在抨击移民进入英国带来的种种问题，主张上台后要采取更为严厉的移民措施。

此外，英国未来和欧盟关系的议题很快也会再被拿出来讨论。从目前的公共辩论来看，大党中只有保守党呼吁过在2017年就欧盟去留问题展开公投。不过，分析人士说，即便保守党赢得选举并试图改变其与欧盟的关系，也要涉及欧盟范围内的条约变更。这可能也会意味着欧元结构的改变。

“没有条约的变更，很难想见其他27个欧盟国家会同意英国的做法，”丹尼森说，“要知道这些变化很快就将发生了，比如限制在英的其他欧盟国家公民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等。”

□ 编辑 漆菲 □ 美编 虎妹



# FENDI



下杂志  
XIAZAZHI.COM

产品垂询热线: 8621-53859078



# 中俄蒙经济走廊的理想与现实



李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  
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4月中旬,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中俄蒙铁路运输合作三方磋商会议如期举行。三方确认,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跨欧亚发展带”“草原之路”倡议的框架内开展铁路过境运输合作;支持扩大现有铁路通道运量及其进一步发展;研究成立三方运输物流联合公司的可能性等。

中俄蒙经济走廊这一概念是去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时提出的。他当时表示,中方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获得俄方和蒙方积极响应。可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今年4月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表示,中、蒙、俄三国已就启动经济走廊建设达成共识。

## 中俄蒙互补合作

当前形势下,中国希望振兴东北经济、俄罗斯遭遇西方制裁加快开发其远东地区、蒙古则期盼将其能源出口,三者对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使得中俄蒙经济走廊的打造具有紧迫性。

中国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初赴东北吉林调研,“督战”东北经济。中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需要俄罗斯的技术合作,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需要中国的投资、技术和劳动力。为实现两国毗邻地区开发战略的对接,2009年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

俄罗斯方面,2012年9月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峰会标志着俄罗斯开发东西伯利亚和远东战略的正式启动。俄方提出“跨欧亚发展带”构想,希望吸引欧洲和亚洲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形成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此为抓手实现西伯利亚和远东最大限度的开发。俄罗斯总统

普京也建议用跨欧亚铁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对接。

蒙古方面,2008年通过的《千年发展战略》不仅要建成同中俄两个邻国相连的欧亚跨境运输线路,而且要租用其他国家港口开展海上运输。2011年还通过国家铁路网规划,要建设三纵一横铁路网。2014年进一步通过决议,将在与中国邻近的两段铁路采用与中国相同的标准轨,实现与中国铁路网的接轨。此外,蒙古国正在积极努力希望在天津建立专属经济区,还要打通乌兰巴托到天津港的出海通道。

中俄蒙经济走廊包含的内容,首先需要加强国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中俄蒙互联互通,其中包括三条重要的铁路运输线:

第一条是赤塔—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符拉迪沃斯托克,对接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一通道将黑龙江与欧洲联系起来,确立其出海口位置。黑龙江对接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另一个出口同江铁路大桥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中,黑河大桥也在规划中。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俄罗斯铁路部门已就打通这条中欧路跨境运输建立了密切协调机制,

现已开通多趟“中俄欧”铁路国际货物班列,并基本实现常态化运营。

第二条是赤塔—乌兰巴托—乔巴山—霍特—毕其格图—珠恩嘎达布旗—长春—吉林—珲春—扎鲁比诺,将东北亚地区六国联系在一起。

第三条是对赤塔—乌兰巴托—二连浩特—北京—天津通道进行现代化改造。

除了铁路运输,中俄蒙经济走廊还包括能源管道建设:一条是俄罗斯的天然气东线天然气管道从东北到北京;另一条是俄罗斯东线东向的石油管道,基本上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走,再从中国的黑龙江、大庆到北京。蒙古方面也希望为中俄天然气管道提供过境服务。

然而,光是上述互联互通,并不能实现中俄蒙经济走廊的最终目标,最关键的是如何将中、俄、蒙三国的贸易带动起来。目前三国在贸易合作上呈现明显的互补优势:俄罗斯的林业、农业、能源以及蒙古的能源都是中国需要的,而俄罗斯远东地区亟须外国投资、发展加工业,蒙古则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等。在金融方面,从中俄角度来讲,为摆脱对美元依赖,中俄尽量使



用本币结算。而未来的中俄蒙之间的合作也可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

## 新旧挑战兼具

然而,在打造中俄蒙经济走廊的过程当中,新旧挑战并存。

由于俄罗斯使用的是宽轨标准1520毫米,而中国采用的是1435毫米,因此在中蒙和中俄以及俄罗斯与欧洲的边境口岸过境列车都要经过换装过程。蒙古自2008年开始制定铁路建设规划,2011年得到批准,但关于究竟采用何种轨距的讨论一直拖延,直到去年才尘埃落定——在蒙古境内主要用宽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使用标轨。由此中国与蒙古铁路对接、运输直至欧洲的技术问题终于克服了。但接下来新的挑战是,如何使得中俄蒙联通的铁路进行持续性运输。

这与已经开通的中国国内(经俄罗斯或中亚)到欧洲的铁路的遭遇相同。从中国到欧洲进行海上运输差不多要20天,使用铁路运输可将时间缩短一半。但成本也高了不少。例如,从重庆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到欧洲,这一条线的成本一个集装箱是1万美元,而海上运输仅需4000到5000美元。

中国各省目前开通了“郑新欧”、“陕新欧”、“连新欧”,“苏满欧”等集装箱货运班列,但这是因为地方

政府给予发货商运输补贴,例如河南政府的补贴使得一个标准集装箱的运输成本与海运成本持平。但这种补贴只能持续三年左右,因此,除非形成规模效应或想办法让从欧洲回中国的铁路上载满货物、使整个成本降下来,否则会对铁路运输的持续性形成挑战。而中俄蒙经济走廊的几条铁路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

资金问题上,中俄蒙三方已达成建设铁路的意向,如有需要亚投行或俄罗斯的私募基金可以提供低息贷款。但在一些连接两国的地段,仍存在一些陈年痼疾。例

成为中国商品的倾销地、廉价原材料供应地、汉语“殖民地”等,俄方对中国公民实行了更为严苛的签证制度,加大对中国公民进入远东地区的限制。该制度要求,中国公民除持有俄罗斯单位的邀请函外,还需要经过其出入境管理局的同意。不过,最近这些签证手续有所简化。

在这种背景下,由中国进入俄罗斯远东的务工人员一度减少。尽管有中国代表团最近访问远东时,表示鲜有听闻“中国威胁论”,但这并不代表俄罗斯方面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如何减轻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忌惮,是目前中俄蒙经济走廊面临的重要难题。

## 光是互联互通,并不能实现中俄蒙经济走廊的最终目标,最关键的是如何将中、俄、蒙三国的贸易带动起来。

如,连接中俄边境的黑河大桥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准备筹建,现在还处在论证阶段。除了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让俄罗斯方面一直警惕外,也有来自当地利益集团的干扰。比如有当地轮渡公司干涉黑河大桥的建设,因为一旦桥修好,其将面临倒闭的风险。

另一个挑战来自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对中国的忌惮。早在2009年,中俄两国元首就签署了规划纲要,但由于俄境内一度传言远东地区将

## 俄蒙倾向多元化选择

不能忽视的是,中俄蒙经济走廊的版图并不只涉及中俄蒙三国,中国东北的振兴不仅需要俄罗斯的技术,更主要是借助日本和韩国技术实现老工业基地的整体升级。俄罗斯希望面向整个亚太地区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蒙古也希望引进日韩等国的技术和投资,所以中俄蒙经济走廊的外延可以扩大

到整个东北亚地区,也就是与朝鲜、韩国和日本合作。中韩自由贸易(FTA)谈判已在2014年年底结束,中日韩FTA谈判还在紧张进行中。如果将来上述国家都同意建立自贸区的话,那么东北亚自贸区就指日可待。

不过在俄罗斯看来,目前它并不愿意搞自贸区,因为其经济结构单一,除了能源和原材料产品,并无其他资源可向中国出售。

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利用需要大量投资,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吸引亚太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一方面,俄罗斯的林业、农业、能源以及蒙古的矿产能源不仅是中国需要的,也是日本和韩国需要的;另一方面,相比中国,日韩等国在诸多领域还有着绝对优势。例如,俄罗斯对石油的加工深度只有20%-30%,但日本、欧洲的加工深度可达到80%-90%。

今年年初,俄罗斯在远东地区设立了跨越式发展区(类似于中国的经济特区),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外资在这里开办企业和工厂;此外,今年其还要建设四十个投资项目,已经确定了六个项目涉及矿产开采、加工,交通岗卡欧建设等。俄罗斯的上述举措,也是希望让周边国家通过竞争与其合作。

(记者王衍采访整理)

□ 编辑 漆菲 □ 美编 虎妹



## 俄方眼中的中国世界级阅兵 中国为何举行反常规大阅兵？

特约撰稿 / 田聿

北京计划将于今年9月3日举行一次阅兵，以纪念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相关文章中提到：“对于中国来说，这次阅兵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这将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非国庆日举行的大阅兵。”

对此，俄罗斯《收音点》周刊称，“中国从未如此隆重地纪念过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活动。这也是中国政府首次邀请外国领导人参加的阅兵，届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百分之百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在5月9日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

利用战争胜利纪念日举办阅兵是国际惯例，美国、法国、俄罗斯莫不如此。去年6月，法国邀请美俄英等国领袖参加盟军诺曼底登陆70周年阅兵式，俄罗斯则隔三岔五就举行各种形式的红场大阅兵以展示国威军威。对于中国来说，举办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俄罗斯的诸多学者与媒体也对中国的这次“反常规运作”表示关注，甚至提出中方可从俄方的纪念性阅兵活动中获得借鉴，将阅兵和全面性、常态化的宣传组织活动结合起来。

### 高调反日，低调反美

依照传统，中国的阅兵是“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自1949年10月

1日以来基本上坚持了这一原则，只是在文革期间中断了几次。最近一次大阅兵出现在200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收音点》周刊指出，随着国力的增强，习近平较其前任拥有更大的政治抱负，并且已经在对外政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他想通过本次阅兵向世界证明自己执政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共所达到的新巅峰。

俄媒也认为，本次阅兵还是别有用意的，对此中国政府也毫不掩饰。用意之一就是敲打日本。自从安倍政权上台之后，无论是钓鱼岛还是历史问题，日本已不止一次地惹怒中国政府。其次，正如《人民日报》所说的，日本右翼势力当道的背后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北京政府要通过阅兵向日本展示中国的国防实力，同时警示国人时刻做好准备”。

当前中日双方在经济领域合作密切，但是政治方面却是天寒地冻。自2012年爆发日本“购买”钓鱼岛事件，2013年12月26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再次惹恼中国。往年，中国对此只是由外交部发表一份抗议声明，而2013年却采取一系列严正措施。2014年12月13日中国政府举行隆重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并将这一天定为国家公祭日。

2014年12月，据日媒披露，中国在浙江省南麂岛建设军事基地，该基地距离钓鱼岛仅300公里，比冲绳

群岛与钓鱼岛之间的距离还短100公里。虽然中方回应说“中国是在自己的家里进行一些正常的建设活动，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日本认为这“严重威胁”本国安全，为此安倍政府将2015年军费增加了5%，理由是“应对中国军队在上述争议地区的危险举动”。

“近年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它要通过这次大规模阅兵向世界展示自己政治上的独立与强大的军事实力。无疑，其中包含着向日本炫耀肌肉的意味。”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首席研究员、中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帕维尔·卡马诺夫表示，目前东亚地区正在面临着紧张的政治格局重组，日本与一些国家认为是中国在改变这一格局，中国则认为东亚地区的不稳定现状主要是由美国与日本造成的，“目前的格局变化是历史、政治与军事问题日积月累后造成的必然结果”。

“前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早在2012年就公开说过，将对60%的远东美军进行重新部署。近年来美国继续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军事合作，包括日本、台湾、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及地区，这让中国感到很不舒服。”卡马诺夫说。

### 可从俄阅兵活动得到借鉴

“还记得2009年大阅兵时，中国人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仿制）能力，



他们在短短十几年内研发出一系列先进武器,仅在阅兵中出现的就有52种,其中包括巡航导弹、无人机和歼击机等。”俄罗斯“网络政治”网站预测,2015年9月,中国政府将向世界推出一场史无前例的精彩表演,届时或将有150多部装备和5000多名军人经过天安门广场,包括2014年刚刚从俄罗斯引进的S-400“凯旋”地空导弹。

“中国一共进口了4个营的S-400,暂时还没有国内仿制型,这也是它会出现现在阅兵中的主要原因。”

此前曾有外媒透露,解放军已经在北京郊外的秘密地点为这次阅兵式进行训练。

在俄方看来,观察新中国阅兵历程,阅兵规模和密度与其所受的外部威胁成正比——建国后最密集的阅兵时期出现在1949-1959年,当时每年都要在北京举行一两次阅兵。之后按照节俭办阅兵的原则,自1984年之后按照“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频率组织阅兵。考虑到此次抗战纪念阅兵,选择在一个特定时刻,尤其面临历史、现实安全问题交织的复杂外部安全环境,因此有必要从更立体的角度为阅兵寻找新意,使其政治和社会舆论价值再上一层楼。

比如,可选择合适的嘉宾国参加阅兵现场活动,特别是安排二战老兵方队通过检阅台。在这一方面,俄罗斯在2015年“胜利日”阅兵中就巧妙地在西方阵营中打进一个楔子,那就是邀请以色列派遣老兵方队参与。作为在西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袖珍超级大国”,以色列在俄美关系中穿针引线,曾发挥过非同寻常的作用。前以色列摩萨德局长帕尔万就对俄罗斯记者说过,正因为以色列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俄裔犹太人,这使得以色列在斡旋俄罗斯与西方阵营关系方面享有“先天优势”。



俄《观点报》引述以色列二战老兵联合会领导人帕别尔诺的话称,“目前在以色列生活有1万多名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当时有50多万犹太人在苏联红军和游击队中参加作战行动,20.6万人在战斗中牺牲,150人成为‘苏联英雄’。因此,以色列会派出老兵代表团参加红场阅兵式。”此前有消息指出,以色列正试图影响美国的犹太院外集团,向美国政府施加更多压力,促使其在对俄关系上采取灵活策略。对中国而言,反法西斯战争庆祝活动能够巧妙选择西方伙伴,是打破目前二战历史话语权受美国支配的一招“妙棋”。

俄“网络政治”网站建议,围绕阅兵,中方可进行军民融合式的宣传,并适时开展相关比武活动,形成更为长久的“阅兵效应”。例如,2015年俄国防部专门围绕“胜利日”大阅兵,在1月至3月举办“王牌传媒-2015”全俄军事新闻大赛,大赛虽由俄军方组织,但面向全国,民间组织机构和地方人员也可参赛。参赛

作品须符合两项条件,一是发表时间为2014年,二是题材与军队和军事相关,作品出处不限,既可出自中央或地方传统媒体,亦可出自社交媒体或者个人博客。有趣的是,这些奖项都有军味十足且形象生动的名称,譬如最佳电台节目奖取名“指挥员之声”、最佳互联网作品奖取名“字节侦察”,最佳照片奖被称作“精确瞄准”,而最佳摄影报道奖干脆唤作“炮火打击”(俄文中“炮火”一词的前部即为英文的“艺术”)。

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俄军果断向克里米亚派兵“保护当地侨民和军事设施”,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的新闻画面中,这些以“当地武装分子”身份为掩护的俄军官兵举止得体,不拒绝国际媒体的拍照,也乐于与当地居民亲切交流,一时间“有礼貌的人”成为俄现代军人的代名词。2014年的当地民调显示,有接近90%的俄民众认为,在面临现实威胁时,军队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

■ 2009年10月1日上午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举行,多种新式武器接受检阅,这是中国第14次、也是新世纪的第一次阅兵。

□ 编辑 漆菲 □ 美编 虎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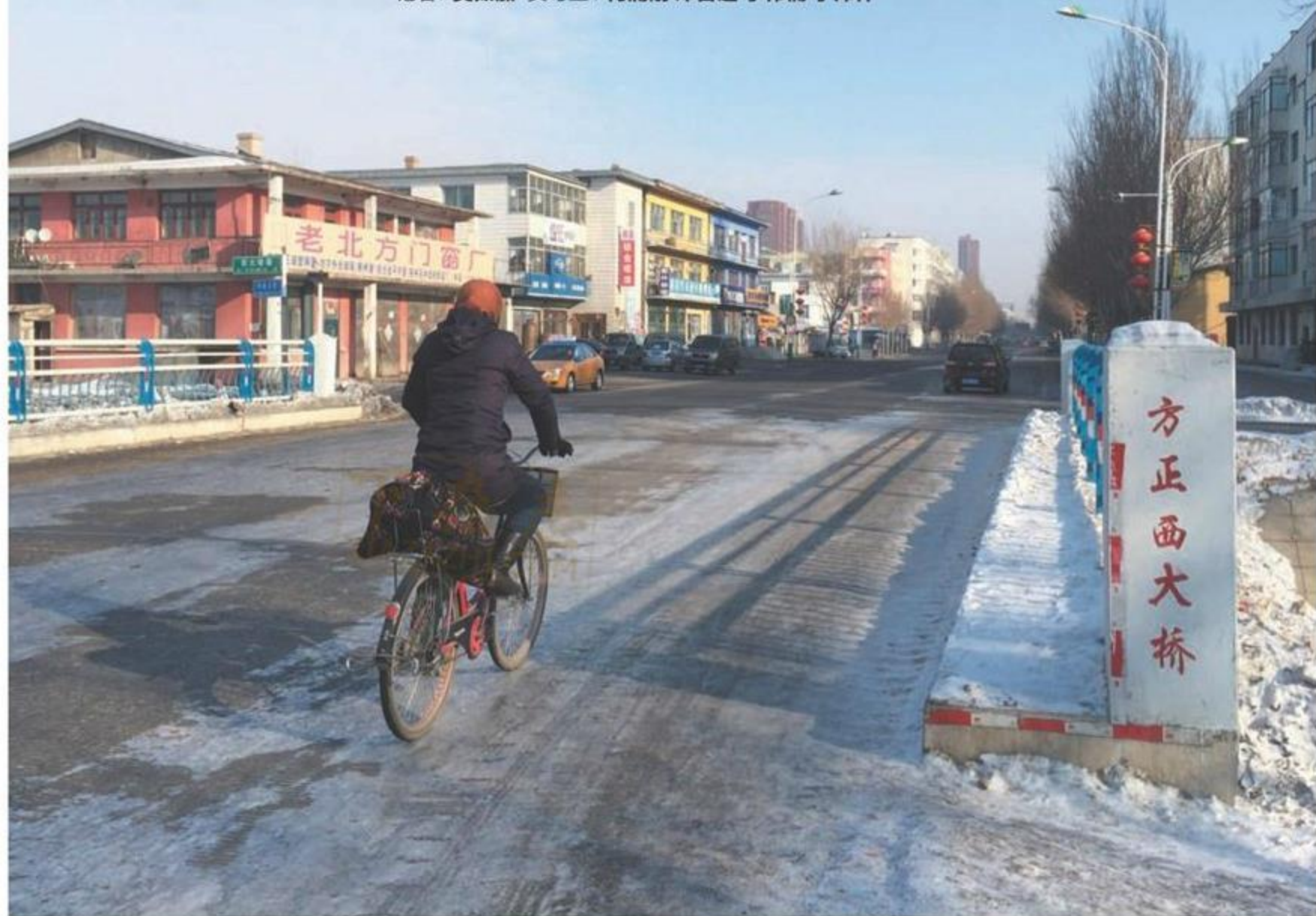
4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上应约会见安倍晋三，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这是近两年来中日关系陷入冰点后有望进一步解冻的最新迹象。

由于历史渊源，黑龙江省方正县成为中日关系中一枚特殊的棋子。四年前的一次砸碑事件，让这个中国北方唯一的“侨乡”进入公众视线。作为独特的日本侨乡，方正县因此发达，也因此受伤。风波过后，这个小县城的日本痕迹正在消退，但仍难以在起伏不定的中日关系中置身事外。

中国独特日本“侨乡”的艰难时事

# 方正已无日本人

记者/吴如加 实习生/肖涌刚 邓哲远 李伟楠 李沛桦



摄影 吴如加





“每一班从日本飞往哈尔滨的飞机上，都有方正人。”方正县政协委员、收藏家林长山思考了一会儿，简单道出了方正与日本的关系。

从哈尔滨驱车一路向东，3小时后进入方正县辖区，迎面是一片浩瀚的稻田。尚未竣工的哈佳铁路穿过稻田，将方正与哈尔滨、佳木斯连接起来。这座位于松花江南岸的小县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铁路时代。

穿过茫茫稻田，再跨过一座桥，便从西面进入了方正县城。走在方正县的街道上，如果格外留心，偶尔能注意到一两处印有中日两国文字的招牌。这让人很难把眼前的景象和四年前媒体中那个“店铺招牌基本都带有日文”的方正县联系起来，当时方正县正因“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事件陷入舆论的口诛笔伐。

如今的方正看上去和任何一个东北县城别无二致，从街道的景观上，已完全看不出一点“侨乡”味道了。

“‘侨乡’这个词，我们大概有四五年没提了。”方正县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凤凰周刊》。他所言非虚，这从方正县近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可窥得一斑。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侨乡”一词出现了11次，2011年出现了8次，2012年锐减至3次，2013年只剩1次，2014年，“侨乡”两字已经彻底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消失。

但方正与日本的联系无法切断。据方正县政府2011年公布的官方数据，方正县居住在日本的华人华侨有35000余人，与在日本华人华侨有血缘关系的侨眷有48000余人，华人华侨和归侨侨眷合计总人数为86270人，占方正县人口总数的比例高达37.49%。

由于和日本的历史渊源，方正县成为中日关系中一枚特殊的棋子。在每一次中日关系的起伏中，方正县都难以置身事外。即便

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方正县也很难彻底切断和日本的联系。

## “侨乡”变成“汉奸县”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东北小县城被卷入全国舆论的漩涡，源于4年前。2011年7月30日，一则关于“黑龙江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元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的微博在网上迅速发酵。该微博称，为了GDP和政绩，黑龙江省方正县花费70万元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以求吸引日商投资，并把这一事件称之为“中国式碑剧”。

事后证明，所谓“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只是方正县政府为中日友好园林中的日本人公墓及中国养父母公墓分别设立两面名录墙。而引起众怒的则是其中之一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

方正县确曾积极进行侨乡建设，并希望通过树立“侨乡”的文化品牌，进行招商引资。譬如投入资金建设日式风情商业街；通过举办莲花节，邀请华人华侨和日本客人到方正参观访问，同时进行招商推介。但值得注

意的是，即便是在立碑事件之前，方正也没有一个日资企业，没有一家日本料理餐厅。

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手法，在中国的县域经济中非常普遍，不同的是，方正县用于搭台的文化概念与日本关联紧密，中日外交关系不稳定，注定了这一概念的脆弱。当两国处于“蜜月”中时，这一文化概念或可带来一定经济效益，而一旦两国关系恶化，“侨乡”便面临着千夫所指的危险。

多年后反思立碑事件，方正县民间学者郭相声认为，如果当时那堵墙上只有纪事，而不是在另一面刻了日本开拓团亡者名录，事态或许不至于此。“千差万错，把日本人的名字刻上去了，这就不好办了。”郭相声曾走访大量幸存开拓民及遗孤，并参与编著《方正侨乡史话》。

一时之间，全国舆论大哗，方正县被网民称为“汉奸县”，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军也遭到了诸多谩骂与攻击，他的照片被挂在网上，网民用修图软件给他穿上了日军军服。

当时还在方正县史志办工作的杨兴江接到了他的好朋友李龙打来的电话，后者是著名抗联将领赵尚志的外甥。

“他给我来电话，问我那个碑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是搞史志的，他以为跟我有关系，气呼呼的。我说我一点都没参与。”杨兴江回忆道，“因为他爱国啊，他舅舅打日本人牺牲了。民族义愤超过朋友的情义，再好的朋友当‘叛徒’他都不允许。”

虽然当时方正县的常务副县长洪振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此进行了说明，称立碑是为了“警示和教育后人更加痛切地认清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并解释立碑之举已“经过国务院与外交部批准”。但方正县仍得不到舆论的谅解。

当年8月4日晚，5名保钓人士私自潜入中日友好园林，在名录墙上泼上了油漆并

赴日方正人给这个  
县城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2011年末方正县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5亿元人民币，比毗邻的木兰和延寿两县之和还要高，在全国2861个县中排名第三。这些存款中的80%都来自于在日本的方正人。



开始砸碑，将此次事件推向高潮。8月5日晚，方正县政府低调地拆除了名录墙。当时，近百名南京来的爱国者已齐聚哈尔滨，正准备前来方正县向当地政府问罪。

一建一拆，前后不过十余天。然而，立碑事件对方正县的影响并未随着名录墙的倒下而消失。愤怒的人们不会知道，方正县早在2006年就已经建成了黑龙江省首个“抗联英烈纪念馆”，但他们一直记得，方正县为日本人立碑。

## 天皇的弃民

方正县城东西4公里，南北1.5公里，按正常速度行驶，5分钟后，便可从东面穿城而出。此刻，目力所及之处，满满又是稻田。

一块路标耸立在城东不远处，告诉过路的人们，往北4公里是伊汉通码头——当年逃难的日本开拓民聚集于此，等待祖国派军舰将他们接往哈尔滨，但是他们最终也没等来船。不远处的炮台山下，便葬着5000多客死异乡的日本开拓民。

日本自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后，尤其在“9·18”事变侵占东北全境之后，便一直热衷于在中国东北开展移民活动。40年间，约有32万日本移民进入东北，其中大部分在黑龙江境内。1936年8月，日本拓务省和关东军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拟从1937年始，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百万户500万人。

在日本政府的哄骗、利诱之下，许多原本生活贫苦、居于社会底层的日本农民，或为维持生计、或为逃避兵役，加入了前往中国东北的开拓团。

但现实并不如开拓民所想象的那样，满洲滴水成冰，酷寒难耐。更糟的是，几年之后，随着战局逆转，16岁以上45岁以下的日本国民均被列入征兵行列。开拓团中的强

“是有深仇大恨，  
但是看着日本战败后的  
那些小孩都奄奄一息了，  
脑袋瓜子尽是湿的，穿  
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那可怜样，你不救都快  
死了，毕竟他们不是  
日本鬼子。”

壮劳力也多被征去，余下的多为妇孺老弱。

1945年，战况日趋不利，但开拓民们对此一无所知。及至1945年8月2日，战场形势已危如累卵，关东军新闻发言人仍发布消息称，“关东军稳如磐石，我国邦人，尤其是驻在中国境内的开拓团诸君尽管放心，勤劳奉国”。

几天之后的8月9日凌晨，155万苏联红军越过边境，进入中国东北，向关东军发起进攻。由于力量悬殊，许多地区的关东军纷纷撤离，但是开拓团却没有接到撤离的通知。8月15日，裕仁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而一些聚居在北满的开拓民，直到8月17日才获知日本投降的消息。

军队撤走了，但彼时的日本政府不仅无力协助这些开拓民回国，甚至做出了让日侨“就地定居”的决策。8月31日，日本政府发出命令，“现地国民应尽力高举已有的共存共荣的大旗，以忍苦努力为第一义务。”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政府抛弃了这些因国家错误而被困于海外的国民。

寒冷、饥饿，加之疫病横行，困在方正县的开拓民开始大量死亡，山野里遍布尸骨。据《方正侨乡史话》载，滞留在伊汉通的一万多名开拓民中，有5000多人未能活过那个寒冷的冬天。

“老百姓看日本人暴尸荒野，觉得太可怜了，就自发掩埋。后来民主政府发现问题后，又发出了号召。”原方正县办主任杨兴江说。

据《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记载，至1946年3月，中共在方正县成立政府之后，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又组织当地百姓在荒野中收拾、挖掘开拓民的遗体，并一车车拉往炮台山东侧。将尸体码成垛浇上煤油，堆上木柴火化，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而后挖了一个大坑将白骨掩埋。

1960年，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方正县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散落在这一区域的日本人遗骨进行收集、掩埋，并修建了一座日本人公墓。1973年因水库扩容，经黑龙江省政府拨款，方正县又将公墓迁至地势更高的炮台山西北坡，改成混凝土建筑，并在墓址北侧，立起一块3米高的花岗岩石碑，面朝日本方向，上书“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九字。近5000名客死异国的开拓民被合葬于此。1984年，在麻山地区集体自杀的530余具开拓民遗骨也被迁葬至此。

据《看历史》杂志报道，文革中，方正县的日本人公墓几次险些被毁，当地人相传，周恩来曾说过：“这里不是日本国军人墓地，这是日本国民的墓地，民众是没有罪的”，公墓因此得以保全。

方正县也因此成为了全中国唯一建有日本人公墓的地区。1994年，“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经县政府批准，更名为“中日友好园林”。

## 敌国之后

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方正与日本之间有过一段血仇。

方正地区曾是抗联的重要活动据点，许多战斗在此发生，著名抗联将领赵尚志就曾率部在此地与日军激战。整个日据期间，方正县共有1117人因抗日牺牲。

方正县的百姓也是日本开拓团的受害者。开拓团进入方正之后，大量掠夺土地，





■ 2011年8月5日，方正县一政府部门大楼上的条幅。侨乡经济，成为方正县域经济的发展动力。

而将原本在当地耕作的农民驱赶至偏远地区。执行征地任务的伪满地方政府，宣称“土地是‘国家’的，要由‘国家’收回，然后再租给大家种”，或以暴力相挟，或以低价强购，逼着农民交出土地。

“土地不给不行，不给就扒房子。”郭相声说。

当时大量农民被驱往一处山沟，由于土地不适合耕作，冻饿交加，致命的传染病很快降临。“死了四百多，有的屯就剩两三口。”全家死绝者更是多达20多户。

开拓团不同于一般农民，用日方自己的话说，即“一手拿枪，一手拿锹”。开拓团中的青壮之士，实为日本军队的后备力量，尽管被征入伍并非其本意，但并不改变开拓团武装移民，辅助日本侵略的性质。

“开拓团民都发枪啊，打起仗来都是兵，不打仗时就是农民。”杨兴江告诉《凤

凰周刊》。

虽是仇讎，但眼见着敌国的妇孺陷入绝境，方正人还是忍不住泛起了同情。

“人们的感觉很复杂，一边是恨日本兵，一边是同情日本老百姓，各种心情交织在一起。”杨兴江说。

“瞅着可怜啊。”郭相声说，“是有深仇大恨，但是看着日本战败后的那些小孩，都奄奄一息了，脑袋瓜子尽是湿的，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那可怜样，你不救都快死了，毕竟他们不是日本鬼子。当时仅在伊汉通一个地方，3岁以上16岁以下的孤儿就有七百多个，很多都得了病。”

这一年冬天，共有4000多名开拓团妇女和儿童被善良的方正人收留在自己家中，使其免于饥饿与死亡。女人多嫁给了方正的男人，而孩子们则被方正家庭收养，称为“日本遗孤”。

方正县华侨商会副会长郭晓玉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同一个班里就有七八个日本同学”，小孩子不懂事，有时还会开玩笑地冲他们喊“你个小日本鬼子”。

“我住的屯就有不少日本孤儿，七八岁、三四岁到屯里了，被中国人收养了，中国名字、中国姓，说中国话，娶中国媳妇，大家也不觉他们是日本人了。对待他们，确实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郭相声说。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这为解决在华遗留日本人问题提供了条件。日本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纷纷活动起来，日本国内的新闻媒体也参与其中。当年的遗留妇女和遗孤陆续联系上在日本的血亲，踏上归国之路。

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双方关系进入蜜月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留华日侨归国的高峰，当年走入方正家庭的妇女和孤儿多是在这一段时期返回了日本。



感念于方正人当年的义举,1995年,日本遗孤远藤勇出资200万日元,在中日友好园林内日本人公墓的西侧,修建了“中国养父母公墓”,上书“永世不忘养育之恩”八字。

2011年建起的“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墙”上,则刻有日本遗孤感谢方正人的碑文:

“日本开拓团民罹受战败之困,撤离方正,多有幼童弃于此处,沦为遗孤,其羸弱之体难抵饥寒露宿之势。方正父老不以其为敌国之后而漠然,而以炎黄传承之礼拯救其于水火……”

### 每一栋盖起的楼里都有日元

随着大批日侨返回日本,方正与日本之间中断了十几年的联系又被重新拾起。当年掩埋日本人遗骨、收养日本妇孺的方正人不会预见到,当年的义举,将为日后的方正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日本官方及民间友好团体到方正访问、旅游、祭扫。日本官方及民间团体也为支持“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建设提供资金。方正渐成两国交流交往的桥梁和纽带。

由于方正的特殊历史背景,日本官方对方正也频频释放善意。

1999年,方正县政府代表团赴日本访问期间,受到了日本自民党的热情接待,时任内阁总理大臣小渊惠三以贺电形式对方正代表团表示了欢迎,官房长官野中广务亲自到场致辞,并在讲话中称:“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方正正是日本人的灵魂中心”。

1996年,方正县获得了日本ODA的援助支持。所谓ODA计划是“官方开发援助”的英文缩写,意指发达国家通过经济技术合作的形式,支持发展中国家所实施的计划。日本政府对中国的ODA始于1979年,至

2008年底已全部停止。30年间的援助总额达36412亿日元,约占中国政府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40%。ODA的援助中约90%属于低息贷款。

作为一个县城,方正能够获得日本政府直接实施的ODA援助计划,在中日两国的经济交往中实属首例。

为期三年的ODA计划包括水稻全程机械化和黄牛繁殖改良两大项目。日本方面通过派遣专家、援助设备及车辆、传授技术、建立实验场等方式对方正县的上述两个方面进行技术改造和人员的培训,相当于每年对方正县进行3500万日元的支持。

当然,日本政府的全部援助计划,也比不上旅日方正人自己带回来的日元。

1989年,日本国会通过《入境管理修订法》,进一步放宽了海外遗留日本人及其家属的回国标准。根据新法,遗华日侨在归国时,其子孙家族也可以被带到日本,同时,日本遗孤的养父母及配偶也可以移居日本,并可获得永久居住权。日本政府同时又规定,遗日华侨未成年的继子、养子也可以被带回日本定居。

如此一来,得天独厚的移居门槛,以及当年中日之间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的巨大差距,使得遗华日侨的配偶、子女对日本心生向往,纷纷前往日本定居。据统计,目前在日本居住的方正县二、三代华人华侨总计约有3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移居日本。这些人构成了方正县在日人口的







■ 2011年8月6日，在中日友好园中参观的游人及附近村民。前一日晚，迫于舆论压力的方正县政府连夜将园中的“开拓团碑”拆除。

正县嵩日日语学校校长刘伟还记得，1989年自己刚去日本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折合人民币约1万多元。而据《中国统计年鉴》，当年中国城镇居民全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373元。

即便按照近几年中日之间的经济情况对比，赴日劳务的吸引力依然很大。

按照日本每月平均工资约30万日元计算，在2010年日元兑人民币汇率高点时，约合24000元人民币。即便按照刚毕业大学生的平均工资，每月20万日元计算，2010年赴日方正人每月的工资也能达到16000元人民币左右。而根据方正县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方正城镇居民全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22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886元。因此，许多方正人一年的收入，也不过相当于在日本工作一个月的所得。因此不难理解，为何一些方正人不惜全家举债也要前往日本，因为这终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除了通过技术、劳务、留学、研修等方式取得留日资格外，女性还可以通过跨国婚姻嫁给日本人，达到移民的目的。在方正县，女人越洋外嫁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以至于跨国婚姻中介一度成了一项产业。早在2011年，便有诸多媒体报道过这一现象。

在《方正县向日本移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一文中，作者赵宁记录这样一则逸闻：一对夫妇，妻子与丈夫离婚嫁到了日本，丈夫竟然在当地的饭店里大摆筵席，宴请亲朋好友，庆祝自己的妻子马上就要嫁给外国人，自己家马上就要过上富裕的日子。

据2011年媒体报道，当时婚介所介绍女孩嫁往日本的行情已经涨至了10万元人民币。一些家庭为此不惜举债。在经过短期的日语培训后，外嫁日本的方正女性通常都能够找到适当的工作，并将大量收入汇回方正。

赴日方正人给这个县城带来的影响显

而易见。根据2012年东北财经大学赵宁发表的社会学论文《方正县向日本移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2011年末方正县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5亿元人民币，比毗邻的木兰和延寿两县之和还要高，在全国2861个县中排名第三，人均存款数达26500元，位列黑龙江省之首。而这些存款中的80%都来自于在日本的方正人。

用郭晓玉的话说，方正县每一栋盖起的楼里都有日元。

### “立碑”风波后遗症

“这个县吧，太小了，太弱不禁风了。”方正当地的一名公务员私下向《凤凰周刊》感慨。在中日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方正这个夹在两大国之间的小小县城，在爱国者看来格外刺眼。

“砸碑”事件之后，“中日友好园林”长期大门紧锁。门外的雪地中矗立着一块石碑，上书“中日友好园林”六字，但是“中”字不知何故，似被墨汁涂黑。远看之下，只剩“日友好园林”。

“当时的网络舆情，很难进行疏导。因为中日的大背景很特殊。”多年之后，一名经历过“立碑”事件的当地政府官员坦承，彼时确实感受到了极大压力。“这个事情对方正造成的伤害很大。”

至今在百度输入“方正县”进行搜索，除百度自动置顶的百科词条、政府门户、贴吧和地图外，便是网民对方正县的谩骂。“中国第一汉奸县”的耻辱至今仍套在方正县头上。

“方正县的人出去到哪儿都受歧视，说我们是汉奸县。”刘伟至今仍对此耿耿于怀。“老百姓是无辜的。”

“方正县老百姓到外地去办事都很困难。遇到做买卖的，价格就给你往上提。”

主要部分。而他们取得永久居住权后，又可以将其在中国的配偶和子女再带到日本。

待这些先期赴日的方正人，在日本站稳脚跟之后，便能为国内亲友赴日提供各种便利。热心朴实的东北人，也乐于为身边的人谋划赴日劳务的路径。先期赴日者迅速发家致富后产生的示范效应，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方正人漂洋过海，追求幸福。

“原来都挺穷，非常穷，等三四年以后回来的时候就不穷了。比如一个村里，有一两家走了，三四年回来以后就成了村子里最富的人。原来是最穷的，现在最富了。”郭晓玉如此描述赴日的效应。

郭晓玉所述并非神话。对于早年赴日的人而言，这简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方



杨兴江说，“住店都不让你住。一看你方正县的身份证，就说没有地方你走吧”。

“方正县是黑龙江八个革命老区之一，抗战时期牺牲了一千多人。怎么就成了‘汉奸县’了呢？”常年研究方正县历史的郭相声对网上的谩骂极为反感。“是，我们是立了一个带名字的碑，但本意是纪事，被错误理解了。”

从1983年至“立碑”事件发生前，方正县政府一直与日本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仅《方正侨乡史话》记载，方正县官方共组织过18次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并先后与日本山形县的大石田町和长野县的泰阜村结为友好城市。

“立碑”事件之后，官方层面的往来彻底断绝。“从此不来往了。现在的往来都是民间的，官方不接待了。”郭相声说。原本自2009年起，日本政府开始资助中日友好园林的管理费用，但是，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方正县人民政府向日本外务省传达了拒绝财政资助的要求。

“方正县领导特别伤心。我是刘军的话，我也伤心。”郭相声说。

方正县政府网站至今保留着“魅力侨乡”一栏，从2010年7月到“立碑”事件之前，这一年时间里，关于跨国友好往来的新闻有13条，对象全部是日本，其中最后一条是“日本水稻专家高桥一裕来我县进行水稻栽培、经营技术指导”。而“立碑”事件之后至今3年多的时间里，总共只有两条更新，一条是关于韩国，一条是关于俄罗斯。

2014年1月，经日本遗华孤儿代表鬼冢建一郎发起，日本鹿儿岛的遗华孤儿在鹿儿岛修建了一座“中国人养父母感谢之碑”。同年9月，鬼冢建一郎来到方正，表示希望自己筹资在中日友好园林里建一座中国养父母感恩碑，但并没有得到方正方面的积极回应。

从1983年至“立碑”事件发生前，方正县政府一直与日本保持着良好的互动，方正县官方共组织过18次代表团赴日本访问，但“立碑”事件之后，官方层面的往来彻底断绝。

“我和鬼冢建一郎说这个事太大，方正县决定不了。而且中日关系正处于敏感阶段。”当时代表方正民间人士接待鬼冢建一郎的郭相声说道，“他很伤心，发了一顿牢骚，走了。”

“‘立碑’事件之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郭相声说。郭本人也因为“立碑”事件，受到了诸多影响。他原先在方正县侨联主办的刊物《方正侨乡》担任主编，“2010年开始，办了5期，砸碑后就不办了。”

2011年，为了纪念对方正县水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日本水稻专家藤原长作，郭相声撰写完成了《藤原长作先生在方正》一书。

“联系好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合同都签完了。正好砸碑事件一出，那边一看，这‘汉奸县’来的书，害怕了。对方说，上级领导说这个事挺敏感。”郭相声对此不能释怀。“藤原长作是个农民科学家，他没有当过开拓民。”

## 日本痕迹逐渐消退

方正县华侨商会里空空荡荡，一些用于装修的材料被随意放置在地上。“现在商会已经接近于瘫痪。”副会长郭晓玉坦承。

“钓鱼岛没有事的时候，民间的往来非常频繁。日本人，每天在大街上走都随处可见。”郭晓玉说。“自从钓鱼岛出事以后，现在方正已经基本看不见日本人了。”

“由于汇率下调，回来的人（华侨）也少了，而且对这边的投资也没有热情，所以也不会到我们这儿来了。旅游的、办事的、投资的，方方面面的人都没有了。”

和郭晓玉面临同样处境的，还有方正县嵩日语学校的校长刘伟。近几年，她深切地感到，自己从事了近20年的这一行业已经不行了。“去日本的人少了，过去高峰的时候，人很多。当时（日语）学校遍地都是。这么个小县城就有十多座。现在不行了，正规的（学校）也就剩三四家。”

存活下来的日语学校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萧条。过去一个班级的人数往往能达到六七十人，而现在只剩十几、二十人。

刘伟认为，生源减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以及近几年来日本经济的萎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近年来中日关系的恶化。

“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许多家长感觉中日这么僵，担心（孩子）去日本之后的人身安全，所以很多人断了这个念想。”刘伟说，“当时钓鱼岛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有很多人手续办完不去了。”

而郭晓玉认为，方正县日本色彩的褪去，更多是经济原因，而非政治：“我们不考虑那些政治背景。政治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无所谓。”

在郭看来，方正人并不比中国任何一个县城的百姓更喜欢日本，或者更恨日本。他们希望通过出国提高生活水平，而日本不过是他们生活中已然习惯的一个存在，将这个存在置换成任何别的发达国家，他们也会欣然接受。当中日关系恶化时，当提起中日间的战争时，他们也会在心里或嘴上骂一句日本人。但是和任何一个县城一样，政治的热情只是漫长生活中的偶尔，大多数时间，他们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和日本的亲



■曾经按照工商部门的要求，方正县街头商户的广告牌匾必须标有日文，但如今已很少见到。

人、朋友相安无事。

较之于抽象的外交关系，安倍内阁实施的刺激财政、货币宽松的经济政策，导致日元汇率迅速贬值，则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方正县。

2012年7月，100日元可兑换8元人民币，如今只能兑换5元。“侨民带回来的钱不值钱了。”在商人郭晓玉看来，这才是方正褪去日本色彩的主要原因。

方正县侨务经济的萎缩，使得郭晓玉放弃了曾经的生意。“现在不做了，没法做了。”

“（日元贬值）对方正人的影响不是大，而是致命。”他举了一个例子。“十月份有个从日本回来的人，他的弟弟病了。他得拿着日元去换人民币。（换的时候）都掉泪了。他需要二十万人民币，就得拿三四百万日元去换。要是原来，二百五十万日元就解决问题了。所以将近一百万日元就白扔了。”

出于对汇率、经济状况以及入境成本的综合考虑，现在的方正人，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其他国家。到韩国去，对许多方正人而言成了更为经济的选择。许多当地人都向《凤凰周刊》透露，目前，嫁往日本的方正女性已经越来越少了。“原来一个月有几十个人（嫁到日本），现在可能就一两个人了。”

与此同时，嫁往韩国的女性逐渐增多。据刘伟所述，目前方正县内已出现了一些地下韩语学校。

“方正人最开始去日本，出去了以后，人们的视野就宽了，走的国家也就多了。”郭晓玉说。

在政治和经济之外，方正县面临的最大敌人是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传统侨力资源日趋枯竭。早在2010年，《新晚报》的一篇报道就曾指出，由于二战结束已久，现在一代战争遗孤的中国养父母已经全部过世。同时，生于日本长于日本的遗孤后代



们，对方正不可避免地渐渐疏离。方正与日本之间原有的亲情纽带难以延续。来方正的日本侨民及侨眷，已由最高时期的每年3000余人次，锐减到每年不足300人。

或许再经过一两代人，除了县城外围的这片水稻田，方正县仅存的一点日本痕迹也将消失。

在采访的最后，郭晓玉主动提起了藤原长作。作为日本的水稻种植专家，藤原长作在方正人的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1980年，76岁的藤原长作随日本考察团祭扫“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由于感念方正人在历史上的善举，并出于对祖国战争行为的悔罪心理，藤原长作主动提出愿意自费到方正县推广水稻高产技术。

在得到方正县政府的邀请之后，1981年，藤原长作带着自己精心挑选出的13.8公斤种子来到方正，在方正县政府选好的试验田中亲自插秧，开始推广自己的“水稻旱育稀植”栽培技术。

经过多年努力，历年水稻亩产只有300至400斤左右的方正县出现了亩产千斤的稻田，方正大米畅销全国，成为继辽宁盘锦、黑龙江五常之后，全国第三个大米原产地

域保护产品。在习得这一技术之后，方正县派出了近千名水稻技术人员奔赴各地进行推广。至藤原去世时，中国共有十几个省、670万公顷的稻田采用了他的栽种技术，产量提高了一倍以上。

“南有袁隆平，北有藤原长作。”郭相声如此评价。

藤原长作过世之后，他的亲属按其生前遗嘱，专程将其一半骨灰送到方正，安葬于中日友好园林。

彼时还是下乡知青的郭晓玉曾经在田间听过藤原长作讲解栽培技术。当时，这位年过七旬小个子老头戴着草帽，站在水田中，身边站着一个翻译。

“我不喜欢战争英雄。”郭晓玉说，“战争时杀了多少人的英雄，我不喜欢。我喜欢民间的，为老百姓做事的英雄。”

这个阳光明媚却寒冷彻骨的上午，郭晓玉坐在萧条空旷的商会办公室里，又想起了30多年前第一次看见藤原长作时的情景。彼时，中日两国正处于历史上的蜜月期。

“他们都说，日本人在那儿种水稻呢，我就过去看看。”

□ 编辑 李光 □ 美编 虎妹



# 离乡三千里

## ——中国新娘在日本

记者/李光 吴如加 特约撰稿/林子敬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国际婚姻数，自1996年以来一直处于日本国际婚姻第一位。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中日跨国婚姻数量于2000年首次突破万人大关，几乎占日本全国国际婚姻总数的三分之一。1993年，拿“日本人配偶永居”绿卡签证的中国人（多数为女性）尚不足三万人，到2008年已经大大突破10万大军。

根据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外事办提供的数据，在2011年前后，每年都有200名以上的该县女性嫁到日本，超过方正县每年登记结婚的新人总数的十分之一。据统计，方正县每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侨汇收入可达8000万日元。正是得益于这些远嫁日本的方正姑娘寄回的大把日元，其在当地的亲属迅速脱贫致富。

尽管这些中国新娘在日本并未感受到明显的政治压力，然而，中日之间特殊的历史问题以及与之缠绕的民族情感，就像一道看似愈合的伤口，随着阴晴不定的天气变化，仍不时隐隐作痛。

### 跨国婚姻隐患

“15年前我一时冲动，给自己的人生下了一次赌注。”方正新娘李爱萍回首15年的婚姻生活后说，“幸好赌赢了。”

1999年，24岁的李爱萍和前男友分手，心灰意冷。男友是日本战后遗孤的后代，当时即将要移居日本，男方的母亲认为李爱萍家境贫困，兄弟姐妹多，而且没有日语基础，结婚会给儿子的一生造成负担。陷入失恋的打击，李爱萍却心生一念：“既然日本这么好，那我也要去日本。”

于是，李爱萍找到做国际婚介的朋友，支付了4万元人民币中介费，然后，从几个日本男人的照片和简历中选择了现在的日本丈夫。如今，李爱萍已经给父母在方正县买了房，还能让父母在冬天时去海南三亚过冬。

日本友人曾告诉李爱萍，一般来说，日本男人娶中国女人，婚姻很难稳定，每三对夫妻中会有一对离婚。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3年以来，中日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高达40%。

李爱萍庆幸自己属于剩下的两对之一，她现在已经是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虽然婚姻并非一帆风顺，李爱萍笑道自己曾经多次“离家出走”，投靠住在东京的姑姑，她的姑姑在1990年代初就作为战后遗孤回到日本生活。

李爱萍刚到日本就怀上第一个孩子，做了七年全职家庭主妇，一直到孩子上小学后才重新找工作，当时她已经32岁，开始在电子工厂的流水线上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虽然李爱萍到日本后就开始学习日语，还请了台湾人做家教，但她说自己至今未能融入日本社会，只是接受了在日本的生活习惯。

随着日本城市化的发展和出生率不断下降，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加之很多农村女孩不愿意再嫁给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日本农村男性面临的结婚难问题愈发严重。日本农村家庭的长子又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因此迎娶一个外国妻子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跨国婚姻应运而生。

由于历史原因，方正县的女性外嫁日本有着先天的便利——在日本的方正人为数众多，通过人脉介绍，更容易找到合适的日

本男性。

“在一些日本人眼里，这些一句日语都不会讲的中国女人之所以要下嫁给一个日本乡下男人，就是因为钱。”一位旅日华人说。在方正县，下嫁日本的行为也被说成“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这一评价未免片面，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2001年嫁到日本的大连新娘王宏伟说。现年44岁的王宏伟是福岛县国际交流协会登记的翻译志愿者，当地官方部门或医院等机构需要处理一些不懂日语的中国人的问题时，就会请她去做翻译。王宏伟也因此接触到很多中国新娘的人与事。

2004年，一名中国籍女性给患有糖尿病的丈夫注射大量胰岛素试图将其谋杀，最终被千叶县地方法院以杀人未遂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2009年6月，日本高知县中学教师将其中国妻子杀害；2010年5月，日本静冈县又发生中国籍女性用菜刀杀死日本婆婆的惨案……

王宏伟认为，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加之缺乏感情基础，很多家庭矛盾丛生，最终酿成血案。

### 当孩子以母亲为耻

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后，2011年，王宏伟和同在日本福岛县生活的姐姐王梓创办了“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为当地的中、日跨国婚姻家庭提供支持，为有中国血统的下一代进行汉语普及教育。支援会不定期组织“日中妈妈交流会”、“日本文化体验会”、“暑假露营”、“秋季野外活动”、“国际结婚家庭幸福促进会”等各种各样的活



供图 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



■ 2014年8月，日本福岛县须贺川市当地节日牡丹节期间，“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的孩子们在须贺川市牡丹园表演唐诗双语朗诵。

供图 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



■ 2015年2月，“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上，一对幸福的会员夫妇，中国妻子从2000年就来到日本。

动，希望促进当地的中国新娘能够更好地融入家庭和日本社会。

但很多时候，姐妹两人感到力不从心。“开始想得比较单纯，就想教孩子学中文，通过学习中文增强孩子的身份认同。”王梓说，“但是事实上当你开始教孩子学中文的时候，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帮助这些中国人的家庭。”

茉莉是其中一例。茉莉嫁到日本后育有一子，起名正男，但因为茉莉在东京“做那种工作”，所以正男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国内，要么在青岛的姨妈家寄养，要么在方正县和姥姥一起生活。虽然缺少母爱，但正

男的童年生活起码算得上正常，就在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茉莉突然回国将他带到了日本。

“我妈把我带来日本的时候，也没跟我说一声，我都没跟我的朋友说声再见。”正男沮丧地对王宏伟说。王宏伟第一次见到正男时，他已经因为拒不上学而几次遭到妈妈的殴打。正男虽然是日本籍，但因为从小到日本只在日本生活过半年，所以一句日语也不会讲，在日本上学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

在王宏伟的协调之下，国际交流协会、教育委员会、学校和家长坐在一起，针对如何让孩子尽快适应日本社会的问题进行了

座谈，从日语最基本的五十音图开始教正男。有一次，王宏伟去学校看望正男，临走时正男问她：“我能回中国吗？”

王宏伟一愣，告诉正男一个残酷的现实：“孩子，你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你拿的是日本国籍。”

正男木然地望着王宏伟，似乎还没有搞懂国籍的概念，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回到中国的时候，难过得低下了头。

在“职业安定所”做翻译时，王宏伟经常会接触到前来求职或领取失业保险的中国人，因为不懂日语，他们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陪同。但王宏伟发现，“孩子因为中文能力有限，翻译出来的东西，跟妈妈说的往往是两回事”，而且写着一脸的不耐烦与嫌恶，好像在说“为什么我的妈妈会是她？”

一个母亲，无法与自己的孩子交流，反而成为孩子的耻辱，“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了吧”。一次次目睹这样的场景后，王宏伟就拿这些去“吓唬”身边那些不懂日语的中国妈妈：“你现在不教孩子学中文，自己又不学日语，你可以想想你的将来是什么样。悲惨的结局已经在那儿摆着呢。”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体重六十公斤。”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对话经常在日本人与中国新娘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但性格含蓄、内敛的日本人往往不会继续追问，通常会礼貌性地应和几句之后便结束对话。“很多人以为对方听懂了她的日语，但很多时候，她们的理解都是南辕北辙。”王宏伟说。

王宏伟接触到的很多中国新娘日语可以做到简单的日常交流，但是需要表达稍微复杂的内容时便力不从心。因为语言障碍，很多中国新娘回家后便直奔电脑，通过网聊排遣内心的孤寂，但与家人的疏离又徒增猜忌。

一个日本男生就因为怀疑自己的母亲



有外遇而偷偷把她和网友的语音聊天录下来，然后交给他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但中国同学帮他“鉴定”后发现，母亲的聊天对象不是外遇，而是远在中国老家的闺蜜。

也有一些中国新娘的日语很好，但基本不和中国人往来，这让王梓感到更加难以接受。王梓用中文跟她打招呼说“你好”，她则用日语“こんにちは(你好)”回应。王梓用中文继续问：“你吃饭了吗？”她继续用日语回答说“まだですよ(还没呢)。”再继续用中文问她“你家孩子今年几岁了？”得到的仍然是日语“もう六歳ですよ(已经六岁了)。”总之不管你问什么，她永远用日语回答你。

谈起这类中国新娘，王梓有些气愤而担心，“她很努力地学习日语，努力地变成一个日本人，努力地隐藏自己，生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但一个人如果不能正视和接纳自己的身份，迟早会出心理问题的。”

## 政治压力淡漠，战争阴影犹存

王梓和王宏伟居住的须贺川市已经是福岛县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整个城市里却没有超过十层的楼房，多是两三层高。以至于让她们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日本后发表结论说：除了东京等几个大城市之外，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大农村”。

在这个远离东京的“大农村”里，王梓说自己几乎感受不到右翼势力的影响，也从未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视，但童年时代所接受的对日本人的仇恨教育仍然会像幽灵一般，偶尔飘进她的脑袋里。

尽管王梓自认为在80年代“自由化”时读了很多解放思想的外国书籍，已经告别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但直到今天，当她和丈夫吵架吵得厉害时，仍然会不自觉地想：

“就他这副嘴脸，要是在侵华战争期间，得

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加之缺乏感情基础，很多家庭矛盾丛生。

杀多少中国人啊。”然后，当年看过的电影或小说里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场景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太可怕了！”王梓从未将这种感受讲给丈夫听过，因为“说出来太伤人”。

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和家人还是和朋友，双方都很少主动提及中日之间的那段敏感往事，但每当与丈夫的同事聚餐喝过酒后，日本人就会“没完没了地道歉”。王宏伟说，一开始还挺感动的，但后来发现他们“一喝多就道歉，而且问题是天天喝。”

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发生在家里。一家人坐在榻榻米上小酌之后，公公就开始向儿媳认真地鞠躬道歉，已经坐得双腿麻木的王宏伟也只能毕恭毕敬地鞠躬回礼。

亲家母来日本时，公公也会道歉，“然后我妈就很大度地原谅了他。”王宏伟说，每次，自己的母亲都会像外交官一样告诉对方：“这是过去日本政府的事，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之间还是中日友好。”

“其实我公公、婆婆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王宏伟说。婆婆自幼丧父，继父被征兵征走后死在战场，为了能有顶梁柱撑起家庭，她大姐很快结了婚，但没过多久姐夫同样被征兵后死在外面。因为家境贫寒，学校发的雨鞋她也舍不得穿，光着脚走到学校门口才舍得穿上。

家人和朋友的道歉已经让姐妹俩习以为常，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梓一次面对来自儿

子的道歉。有一天，正在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之后对王梓说：“妈妈，今天我们在教科书里学到，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事。”王梓意外地说：“是吗？你们学这个了吗？”

“是的。”儿子从书包中掏出历史教科书，边翻边说：“就这段历史，妈妈你看，那时候日本人对中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真是对不起。”王梓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身上有一半也是中国人，你不用跟我道歉。”

回国探亲时，王宏伟会嘱咐两个儿子尽量说中文，让孩子尽量表现得不像日本人，以免被人说成是“小日本鬼子”。她自己除了会会老友，也很少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待着，“我妈做了好吃的我就吃”。

故乡，对于这些取得日本国籍的中国新娘而言，有着更为复杂的体验。王梓还记得十九年前第一次回国时，满怀激动地扑下飞机，“以为全国人民都张开怀抱拥抱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归来”，可海关的小伙子脸色却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翻看着她的护照说：“日本人，那边排队去。”

在支援会教孩子们学习中文时，孩子们背的第一首“汉诗”（中国古诗在日本统称为汉诗）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前年中秋节夜晚，全家人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赏月时，王梓的女儿突然用中文缓缓地说出一句“低头思故乡”，没有说其他三句，只说了这一句。那一刻，王梓觉得，11岁的女儿似乎理解了自己作为一个异乡人的感受，顿时热泪盈眶。

王宏伟想教孩子们用中文背诵另一首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杜甫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被姐姐王梓制止了，“这个太悲了，还是先放一放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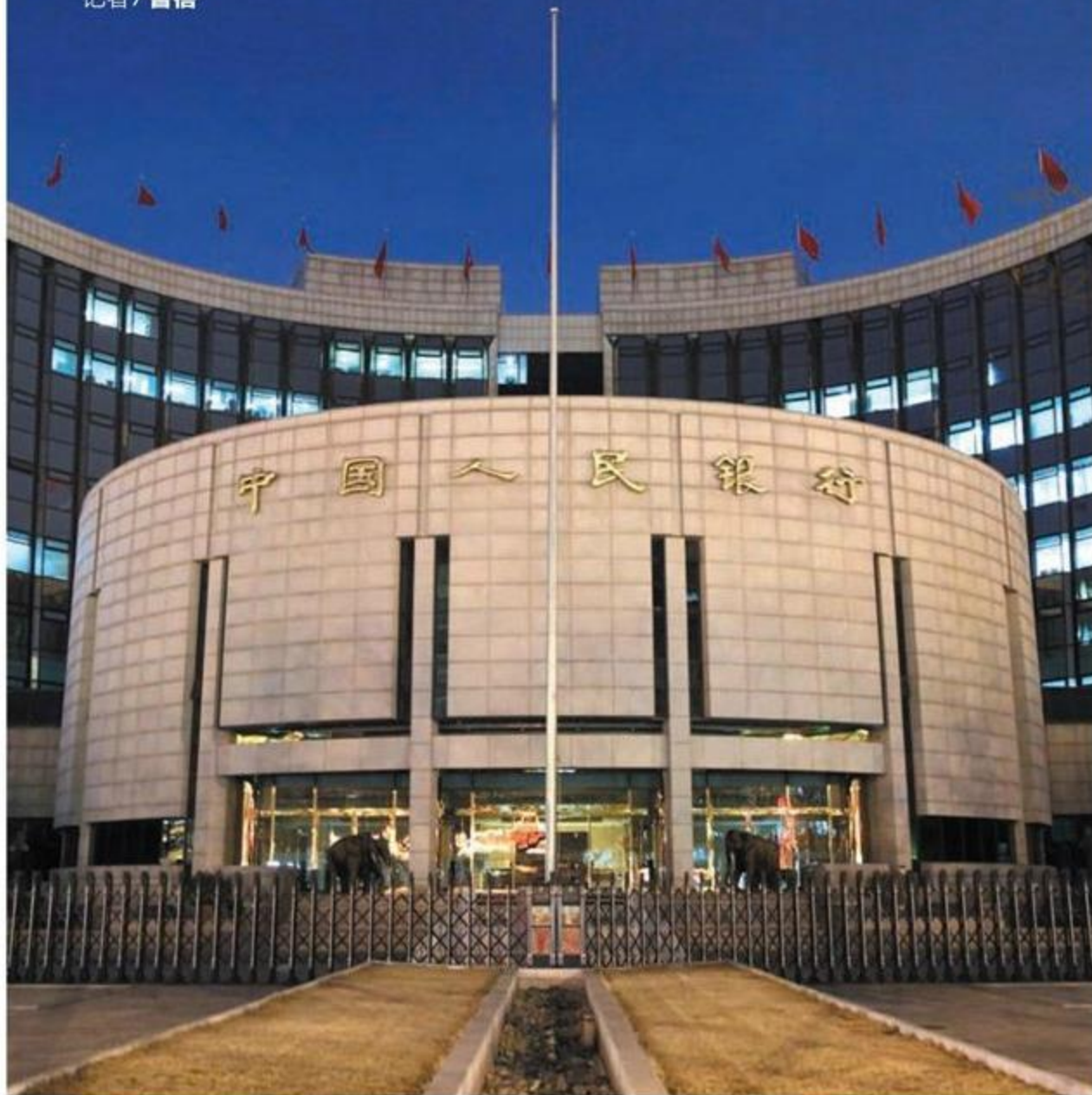
□ 编辑 段文 □ 美编 虎妹



经济下行压力加剧

## 大陆或将继续降准降息

记者/曹蓓



万亿元左右。

市场情绪转忧为喜。但4月20日(周一)的股市并未如想象乐观,盘中大幅震荡,尾盘跳水。截至周一收盘,上证综指下跌70.22点,跌幅为1.64%,创一个半月最大单日跌幅;深证成指下跌277.7点,跌幅为1.96%。然而两市却放出天量成交。根据上交所FAST行情显示,截至收盘,沪市成交达1.1476万亿元,创出历史新高;深市成交6550亿元,两市成交金额合计达1.8026万亿元。

## 意料中的意外

市场对降准早有预期,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此次央行降准的时间窗口是为了对冲周五证监会的利空因素。此前,央行多次通过在公开市场下调逆回购中标利率的方式来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逆回购利率已从年初的3.85%降至3.3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GDP为140667亿元,同比增长7.0%,增速比上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是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均难言乐观。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0%,其中出口下降3.4%。工业生产增速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固定资产投资也出现疲软。

宏观经济数据仅仅是一方面。分析人士认为,促使此次央行大手笔降准的原因来自于外汇占款。

由于人民币是非自由兑换货币,外资引入后需兑换成人民币才能进入流通使用,国家

4月的第三个周末,对于内地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很难有放假的心情。

中国证监会在4月17日(周五)对融资融券业务提出了七项要求,包括券商做两融业务不得开展场外配资、伞形信托等活动。这被市场解读为有意鼓励卖空,打压股市,致使恐慌情绪蔓延。随即在新加坡交易的新

华富时A50指数闻风直线下挫,收盘暴跌6%。第二天,证监会不得不出面澄清这“纯属误读”。

周日,央行大手笔推出“普降+定降”政策组合拳,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并针对性地实施定向降准。虽然在此前,降准已是市场普遍预期,但1%的幅度,仍然大大出乎意料。

据《凤凰周刊》记者统计,上一次央行降准1%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此后降准幅度均为0.5%。市场预期,此次降准,将释放1.2万亿元的流动性。更有乐观估计,央行此举实际释放基础货币规模约1.66万亿元,相当于全面降准1.33%。按照现行4.1的货币乘数计算,增加的M2(广义货币)上限在6.82



为了外资换汇要投入大量的资金,需要国家用本国货币购买外汇,因此增加了“货币供给”,从而形成了外汇占款。外汇储备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它的增加无异于投放基础货币。外汇储备增加越多,人民币的发放增长越快。

但是自2014年4月份开始外汇占款已负增长。今年一季度,外汇占款减少2521亿元,同比减少增1.04万亿元。也是受到外汇占款大幅减少因素的影响,一季度末,M2同比增长11.6%,也未达全年12%的调控目标值。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称,从资金成本的角度,目前银行新增存款的资金成本均在5.2%左右,缴纳高额存款准备金后,成本已接近6%,导致信贷成本超过工业企业5%左右的利润率。

早在去年年底,金融机构对2015年货币政策的展望中,多次降准和降息就几乎没有悬念。但是,监管层本次动作则有些出乎意料。

2014年底,中金公司发布2015年宏观经济专题报告中预测,2015年货币政策放松空间加大,预计央行将全面降准4次并降息两次。但是今年一季度过后,中金称,多组利率数据共同说明:一季度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回落不明显,央行需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除了一次基准利率对称下调25基点(0.25%),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次数已调整为6次。

就在央行此次降准前几天,摩根大通称,中国3月进出口双双大降,贸易顺差亦创一

年最差水平,预计中国方面会进一步宽松来改善这一状况,将在4月降准,6月降息。但摩根大通预计降准的幅度为25个基点,显然没有预计到央行此番的大动作。

彭博社评论,“降准的幅度比市场预期的要大得多,银行流动性将非常充裕。”澳新银行集团驻香港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表示,“这也会给已经炙热的股市添柴加火。”周末的降准不光使中国央行自身的货币政策更为宽松,也令其政策更为贴近正在与超低通胀斗争的全球近30家其他央行。作为

##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还在与资本外流和国内市场减速抗衡,后者 威胁到了实现其城镇化目标的就业机会。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在与资本外流和国内市场减速抗衡,后者威胁到了实现其城镇化目标的就业机会。

### 会有更多降准降息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放水”仍将继续。

在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增大的趋势下,财政收入延续了低增长的态势,地方财政收入增势大幅减缓,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

财政部数据显示,3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691亿元,比上年同月增长5.8%;扣除部分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影响,同口径增长4.2%,增幅比1-2月(1.7%)有所回升,但总体仍延续低增长态势。而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2.4%,其中税收仅仅增长1.2%,也被业内称为是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

早在年初,德意志银行就发布特别研究报告预言,财政收入下降将是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需面对的最大挑战,而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正是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下滑。

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广义口径的政府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全国收入23%、地方收入35%,是很多地方政府,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地方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以江苏省为例,其一线

城市只有15%的出让土地卖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但到了二、三线城市,这一比例就分别攀升到60%、70%。根据德意志银行判断,全中国约有50%的城市将出现财政收入负增长,全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可能下降2%。

地产市场萎靡不振、地方政府债务、传统行业持续低迷等诸多因素,是摆在不少地方政府面前的难题,也让部分地区的财政捉襟见肘。辽宁省财政厅数据显示,1-2月,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453.5亿元,同比减少98.6亿元,下降幅度高达17.9%。在目前已经公布数据的地区中,财政收入增速为个位数的超过一半。

由于经济和产业下行压力加大,一些地方的经济活动也

开始出现收缩。有陆媒报道,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多地的大多数矿山企业已停产或面临停产,矿山企业代表自曝“产1吨矿最多亏300元”。

面对压力,更多的货币政策被期待加码。

按照央行高层在公开场合的表态,“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有空间,我们的利率也没到零”,引发了市场对未来央行仍将多次降准的猜测,甚至多数分析称,降息也在不远处等候。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称,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但下行压力加大,金融调控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有新举措,稳健货币政策要灵活有效,加大定向调控和结构性改革力度,在搭配组合运用好现有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根据需要创新推出针对性强的金融措施,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相互配合,为稳增长、调结构提供支撑。

不过,大陆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随后撰文称,在实体经济疲弱时,政府不能依赖货币政策,而要用财政政策,这是因为无论发行多少货币都不会到实体经济中去。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采取大量注资GE公司的财政政策,使其快速重组,并改善经营状况,最后政府资金退出时还实现了盈利。美政府救市的同时还去了杠杆,值得中国好好研究。

□ 编辑 王毕强 □ 美编 虎妹



链接

## 2015年一季度不同城市土地市场情况

各级城市土地市场降温持续，一线城市尤为明显

城市类别	指标	成交面积 (万平方米)	出让金 (亿元)	楼面均价 (元/平方米)	溢价率
一线城市	绝对量	574	549	9563	19.3%
	同比	-48%	-54%	-11.5%	-16.9%
二线城市	绝对量	5913	1213	2033	9.3%
	同比	-51%	-46%	9.7%	-1.0%
三、四线城市	绝对量	8412	944	1122	7.6%
	同比	-43%	-41%	4.6%	-0.9%

数据来源: CREIS 中指数据, fdc.fang.com

解读

### 房企爆发裁员潮

【本刊综合】政策暖风尚未驱散房地产行业的寒意，万科、碧桂园、雅居乐、合生创展等多家房企不约而同地通过“瘦身”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尽管各家企业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但房地产行业裁员风潮逐步蔓延的趋势难以逆转。业内人士指出，行业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不管是营销方式，还是人才标准、决策模式等，都需作出相应调整。不少房地产企业以往热衷打造全产业链，从产品设计、后期维护、园林等“一条龙”包办，现在很多房企都在收缩业务范围，选择外包的方式降低人才储备成本，因此对不同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减少。同时，房企对传统地产业都不太看好，地价成本上升快，利润在压缩，基本上都在考虑怎么转型，比如涉足养老、足球、旅游。很多房企正在退出已经饱和的三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并对原有的项目团队进行优化调整，通过裁员，或者分流到新的业务上，未来精简人员是一种常态。

### 下半年房价将上涨？

【本刊综合】流动性充裕之下，房地产市场首先迎来成交回暖。而根据历史数据，成交连续上升约6个月之后，价格将会上升。这一演进的趋势，将率先在一、二线城市实现，部分业内人士预计，一、二线城市在今年下半年将出现供需的逆转，房价重新上涨。分析人士预计，4月20日降低存款准备金后，市场分化行情仍会延续。今年3季度主要一、二线城市的库存去化周期将恢复至合理水平，供求逆转后房价将进入上行通道。由于城市间中长期库存、短期供求及地理位置的差异，一、二线同级别城市间住宅价格也表现分化。一线城市中，深圳房价已进入上行通道，房价或将继续保持稳中有涨甚至加速上涨；广州短期库存压力增大，宅地供应收紧，未来价格将稳中有升。二线城市中，武汉潜在需求旺盛，在利好政策推动下量升价稳；杭州库存仍处高位，出清周期回落至13个月以内，未来房价或将止跌企稳。

焦点

## 10亿平方米空置房成谜 开发商逃离三、四线城市

【本刊综合】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在IMF2015春季年会上表示，“目前中国楼市的首要问题是空置率太高，空置面积达10亿平方米，要将地产开工率维持在中等水平，还要进一步提高销售率。这意味着中国的房价还是太高，房价水平还要继续调整。”在朱民提供上述数据之前，西南财大教授甘犁关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地区住房空置率为22.4%，约为4900万套住房。但这一数据却遭到华远地产前董事长任志强的质疑。

目前，空置率始终没有权威数据。国家统计局曾公开回应称，由于对空置率及空置的概念不明确，还不能计算出空置率这样的指标。北京市房协一位负责人表示，出于各种原因，有些住宅数据是政府不愿意公开的，但这部分信息却至关重要，不动产登记制度出台后，大部分数据都有望得到公开，这对房地产行业各个环节的主体都可以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也有利于地方政府针对当地实际情况调整政策。

尽管官方没有明确空置率数据，但三、四线城市的“空城”危机仍在发酵。

“过去几年房地产企业迫于一、二线城市开发压力，转向三、四线城市进行造城运动，新建了很多楼盘，但之后实体经济增速减慢，导致楼盘销售困难。三、四线城市出现空城化不可避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三、四线城市之前的积压库存量巨大，而需求有限，因此这些区域酝酿着非常巨大的泡沫破灭风险。”中原地产认为，自2013年以来三、四线城市的新房成交量一直处于低位，新的楼市危机随时可能出现。从部分房企此前透露的2015年拿地策略来看，房企对于三、四线城市的地块选择愈发审慎。

下半年  
逆转

□ 编辑 王毕强 □ 制图 美编 虎妹



# 争议微商

微商在微信朋友圈迅速蔓延后，随之而来的是问题重重，但无论如何，这是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大势，“正规军”也在酝酿进入。

记者/曹蓓



下课后，璐璐把教具都收拾好，急忙赶回教室。拿起手机，看到已经到账的6130元，一笑，这才放松地坐下。

这是昨天最新招到的代理打过的第一笔钱，也正是因为这个代理的加入，她下个月应该就可以晋升为一级代理，从二级到一级，她冲击了大概两个月。

她是一名普通的幼儿园副园长，也是一个微商。

和很多加入微商的人经历相似，去年12月，朋友送给璐璐一盒面膜，她用了效果不错。朋友是这款面膜的代理商，顺势拉她做起了面膜微商代理。“发发朋友圈就可以，还能赚钱，还能臭美。”璐璐想着，加入代理也不过是进个二三十盒的面膜，最糟糕不过是卖不出去自己用，于是成了微商大军的一员。

“以前我一见朋友圈卖东西就屏蔽，真正做起来，没想到成绩还不错。不到半年时间，我就从初级做到一级代理。”璐璐说，现在她已经代理了四个品牌，每个月只这一项的收入就超过2万元。

## 是不是传销？

对于微商，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一般来讲，微商指的是在移动终端平台上借助移动互联技

术进行的商业活动，通俗讲就是通过手机开店做网络购物。其区别于传统电商的最大特征是，微商是以人为中心。在移动互联网带入的社交时代，核心是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关系获得信任，通过信任卖出商品是微商的关键所在。

时下，微商已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商业链条：下一级代理从上一级代理那里进货，交易完成后，由上一级代理发货。在这个过程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环，培训。“靠零售根本挣不到钱，做微商最终还是要发展下一级代理，让他们从你这儿拿货，给他们做培训，批量走的话，销售量稳定也长久。”璐璐说。

最初的微商，一般都是从自己的亲戚、朋友开始发展客户。为了开发更多的“下线”，就需要更多的人，通常有几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微信功能搜索附近人，附上类似“赠送试用装”的信息；另一种方法是寻找一段手机号，如果对方绑定微信，即可增加机会。此外，还可以通过QQ导入或与其他人互换群等，据说方式超过百种。

这些方法大多是通过微商的内部培训实现的。培训在网上进行，由厂家的专业代理建一个群，传授营销方法，传达公

司的政策，并伴有成绩较好的代理分享经验，群里还会定期发一些图或文字。

这样的方式不免让人想到一个词，传销。

对于这种定性，璐璐非常反感。“这当然不是传销。微商的上一级代理只是作为下一级代理的仓库，至于下一级代理再招到代理，跟他们的关系就只是增加了供货量，售货量的多少也没有利润分成。”

大陆《禁止传销条例》中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传销侵犯的主要客体要件欺诈性（侵犯公民财产所有权）和扰乱社会管理秩序与经济秩序。多位律师和专家认为微商并不属于传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基于以上理由。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微商并没有触及到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也不能称其有欺诈性。

“传销是从下线拿钱过

来，而微商是自愿加入，且下一级代理拿货多是自主决定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称，“此外，传销大多伴有对下线人员的人身控制，而微店是主动找卖家做代理，很多是兼职，因此形不成人身控制。”

## 问题频出

与很多新兴事物一样，在疯狂增长的背后，关于微商的问题也频频出现。

一位自称是初涉微商的新人日前公开爆料，称朋友圈中，从交易对话到转账记录，从效果展示到检验报告，包括诸多正能量的口号，原来都是微商揽客的手段，这一切都是由“上家”准备好的，都是假的。而这些假内容，都可以通过“微信对话生成器”、“支付宝转账截图生成器”和“网银转账截图软件”等应用软件生成，还可以通过淘宝的加入团队实现。

不仅如此，微商所销售的产品，出自何处、质量如何，长期以来也饱受质疑。根据大陆中央电视台前不久的调查，微商在朋友圈出售的面膜大多出自黑作坊，原料低劣且添加“皮肤鸦片”糖皮质激素，有的甚至超标6000倍。

面对诸多问题，有关方面





在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社交时代,核心是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关系获得信任,通过信任卖出商品,是微商的关键所在。

也开始警惕。如福建省消委会和福建省工商局网络市场监管中心日前联合发布消费提醒,广大消费者需警惕微信朋友圈买卖带来的“维权难”等隐患。

“现在利用‘微商’进行网络传销、非法集资、诈骗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福建省上述两部门提醒消费者要谨慎对待一些不法微商的新型营销手段。由于微信朋友圈买卖行为属于私下交易,微信用户并不用登记身份证等真实信息,一旦发生商品质量、售后服务纠纷、食品安全等问题,取证很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消委会很难受理。

而作为微商最大发布平台的微信,根据腾讯2014年全年财报,截至去年12月底,微信月活跃用户达到5亿人,绑定银行账户的微信支付和QQ钱包账户超过1亿个。

微信相关负责人对《凤凰周刊》表示,微信是一种生活方式,用户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微信使用方法,但前提是合法、合

规;对于微信官方运营的微信小店系统,我们是鼓励推广的;对于第三方开发和代运营的微店,由第三方提供服务器存储和安全服务,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

今年3月,微信公布了建立品牌维权流程,并处理了首批由Louis Vuitton、Adidas、Richemont投诉并举证的93个冒名侵权公众账号和233个售假个人账号。微信称,接收到来自商标权利人的投诉,指出有少量用户利用微信买卖假冒商品。

“我们会根据接入的品牌,为用户开放提交微信售假线索的入口。用户提交的线索会直接流转到商标权利人,商标权利人做出售假验证后反馈验证结果,如果确认售假属实,我们将对售假账号进行封号处理。”

## 正规军介入

即便问题重重,但是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微商终究是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最重要的一个

商业形式,只是需要留给监管、消费者和参与者时间。而这时,很多正规军已经开始谋局。

4月,上市公司健康元宣布将携手思埠集团大举进军微商。思埠集团主要经营面膜、洗面奶等产品,销售模式正是主要通过朋友圈等渠道进行信息传播。

健康元进军微商,与微商目前的产品线结合比较紧密。家电领域的大块头国美电器,则是在另一个领域做相同的事。

在国美2014年全年业绩解读会上,总裁王俊洲称,2015年国美将设立超过10万个移动微店。据悉,国美所有的门店员工将成为这些微店的店主,除了需要在国美推荐的产品清单里选择部分产品在朋友圈进行售卖外,也可以在国美在线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商品推荐给朋友。

国美在线董事长牟贵先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称,10万个是比较保守的数字。“据我推测,会是个大的数据。”

去年12月份,国美的微店

项目开始启动。而在此前,国美从去年11月,就已组建了超过百人的独立部门,并由国美在线副总裁带队。目前,国美已在西安和厦门试点开办1万多个微商。“五一后,我们将开始在全国推进。”牟贵先说。

小A是这个项目的一员。她是国美实体店的一名员工,同时也是试点微店的店主。跟其他微商一样,经过培训,她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向好友推荐产品。但卖出货物并不是她的主要任务。“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体验,通过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形成书面的报告向上提交。”目前,小A等国美微店店主使用的已是国美开发的第二代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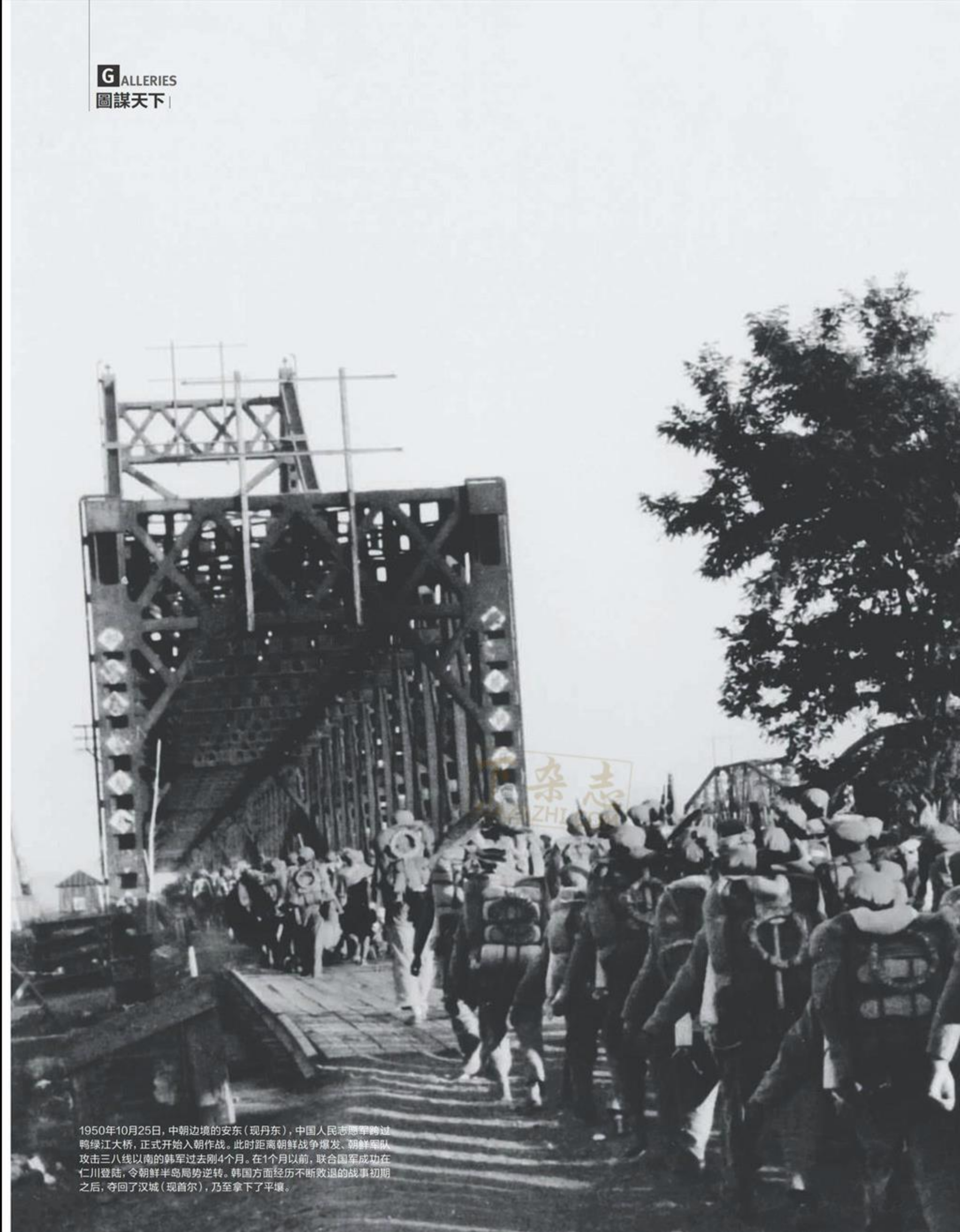
“微商这种形式,既不属于线上,也不属于线下,它就是基于移动互联网诞生的。这种模式要做好,既要有想法,也要有资源,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国美的全零售计划中,微店被放在了中间位置。“在‘互联网+’的风口上,微店是一种很典型的模式。”牟贵先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互联网+”的行动计划,随即这一概念迅速发酵。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将重点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兴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

业内人士称,互联网基本的技术内涵,与电信通讯不同,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创造者。

□ 编辑 王毕强 □ 美编 虎妹





1950年10月25日，中朝边境的安东（现丹东），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大桥，正式开始入朝作战。此时距离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军队攻击三八线以南的韩军过去刚4个月。在1个月以前，联合国军成功在仁川登陆，令朝鲜半岛局势逆转。韩国方面经历不断败退的战事初期之后，夺回了汉城（现首尔），乃至拿下了平壤。



# 亲历抗美援朝战争

孟昭瑞





1950年10月，作为部队的摄影记者，刚满20岁的孟昭瑞拿起相机才不过两年。血气方刚的他主动请缨，要求奔赴朝鲜战场。在中朝边境，他拍下了鸭绿江岸轰炸的战火，也抢拍到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的场面。与那首原名《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志愿军战歌记录的一样，孟昭瑞也揣着一股“雄赳赳、气昂昂”的心气。

整个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孟昭瑞先后11次赴朝拍摄。从战争的第一阶段（1950.10—1951.5）中美两军现代军事史上的第一次交锋的云山战役，到第二阶段（1951.6—1953.7）惨烈异常的上甘岭战

役，再到1953年7月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他和他的相机都在现场，定格下一帧帧历史。

除了这段弥足珍贵的朝鲜战地记录，许多国人此前熟悉的历史时刻画面也都是由孟昭瑞记录下来的：从刚入行时拍摄记录的北平入城式、开国大典，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审判“四人帮”……这些在中国当代史中有着重大意义，覆盖到政治、军事、科技各方面的事件，都被收进了他的镜头。

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在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记录中，孟昭瑞亲历了血与火的

洗礼，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他耳闻目睹将士们在战场上倒下的故事，也亲眼看见慰问团被敌机空袭，同行在他眼前牺牲。一段令他难以忘怀的记忆是：在朝鲜一所村小学的教室外面，孟昭瑞亲眼看见，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为了取回电影机冒死跑回房间，结果被一颗炮弹炸成两截。

这些朝鲜战场上的影像，不乏是在交战环境下，战场局势千变万化，摄影记者更需机动灵活地捕捉历史瞬间。孟昭瑞回忆随军拍摄生活：“跟着他们在大雨滂沱的泥泞路上强行军走了两天一夜……还差点被俘，就连兵团首长都掌握不了战役的突变，致使敌





人增兵进行反扑,变化之快,难以预料。”

无论当日是如何叵测与痛苦,孟昭瑞的快门声没有停止,每一声“咔嚓”,都凝固下冰冷、沉重的战争史。2015年年初,他的摄影作品《亲历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出版。这本历史画册共收录了200余幅拍摄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历史照片,收录有志愿军官兵誓师、上甘岭激战、志愿军军官与朝方领导人合影以及朝鲜停战协议签署的诸多画面,其中许多照片是首次发表。

就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孟昭瑞溘然长逝。(曾鼎)



左图 1950年11月中旬,在云山战斗中被俘的美骑一师之一部。云山战斗是中美两军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也是摄影记者孟昭瑞在朝鲜战场采访的第一个大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中国第三十九军在云山攻击美军第一骑兵师第八团,导致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其中一次最严重的损失”。中方事后称,共歼敌2046人(其中美军1840人),缴获敌飞机4架,击毁与缴获坦克28辆,缴获汽车176辆,各种炮190门及大批枪支弹药等。

右上图 坚守在上甘岭战壕里的战士们,手里拿着毛主席的照片宣誓:“请祖国和人民放心,请毛主席放心,人在阵地在。”在这个狭小的阵地上,上甘岭战役前后历时43天。在仅仅3.7平方公里的地区,双方伤亡据称达到约3万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以高昂的伤亡代价,死死守住了上甘岭。

右下图 上甘岭前线的高炮部队,士兵们一看见美国飞机就认为,“用胜利回答祖国人民”的机会到了。据称在11月1日早晨,仅5分钟的激战,就击落敌机两架,击伤3架。事后,志愿军的作战精神面貌由宣传战线广为传播。这次战役更是因中方的英雄人物黄继光而广为国人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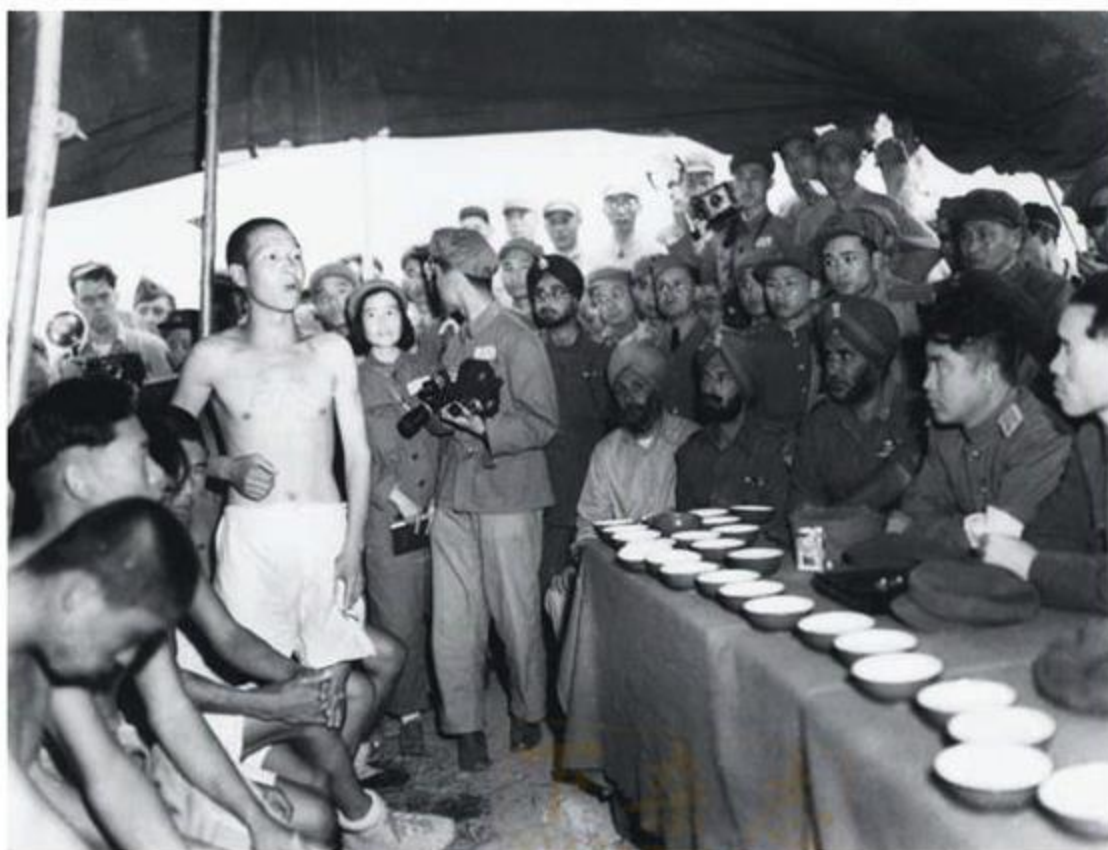


1951年12月25日，朝鲜北部碧潼战俘营，欧美战俘在杀鸡，准备圣诞晚餐。虽然志愿军本身生活十分艰苦，物质条件极差，但中方还是想方设法为战俘采购味美可口的食品。为了表示对他们风俗习惯的尊重，还特意给每人买了一只鸡——没有火鸡，志愿军工作人员专门从国内买来鸡作代替。

朝鲜停战签字不久，双方交换战俘。摄影记者孟昭瑞回忆说，中方被俘人员通过板门店步行桥时，将美国发给他们的衣服、鞋袜全脱下来丢到桥下，只穿一条短裤，赤着身子。他们说：“我们在战俘营吃尽了这些狗杂种的苦头，回来时才给每个人发了一套新衣服，想叫我们给他们撑面子”。







被俘人员宋忠明向中立国工作人员、中外记者控诉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为了听取归来的中方被俘人员的控诉，中方特地在接收站附近设立了一个供记者们听取控诉的帐篷，让被俘人员尽情倒苦水。回忆战俘营生活时，志愿军被俘人员时常会提到自己或者战友被强迫在身体各处刺上“抗俄反共”、“杀朱拔毛”一类的标语。孟昭瑞说，有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把敌人刺上的反动口号覆盖上，又刺上了“抗美援朝”字样。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文本上签字。画面里从左三到左六，分别是领导中方谈判事宜的代表李克农、乔冠华、丁国钰、柴成文。就在前一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已经与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板门店的会场内举行完签字仪式。协定随后交付双方的司令官，由他们各自在其驻地签字。自此，志愿军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本文图片由  
《亲历抗美援朝战争》提供  
孟昭瑞著  
后浪出版公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年4月出版

□ 图片编辑 丁大伟  
□ 文字编辑 路琰  
□ 美编 虎妹



# 红色藏人革命家平措汪杰

共产主义革命中，西藏曾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平措汪杰最早在西康引入星星之火。解放军进藏时，缺乏熟悉西藏风情的干部，精通汉藏两语、熟悉西藏政界、信仰共产主义的平措汪杰完美地补了缺。

记者 / 陈祥

1951年夏，一支三百余人的军队行进在昌都到拉萨途中。他们是“进藏部队先遣支队”，隶属于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18军，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带队。队伍一路上翻越重重横断山脉，面临交通恶劣、补给匮乏、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和严寒等困难。

“这对汉族同志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困难，何况当时一无这个地区的详细地图，二不明道路。”王先梅追随丈夫王其梅行军，忆及这趟艰难跋涉时感慨万千。王先梅特别感激以平措汪杰（以下简称平汪）为首的一批“藏族同志”，他们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担任向导、翻译、调查、组织牦牛运输等任务，还帮助选择宿营地、识别水和草是否可食用，介绍高原气候的常识。

“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葛然朗巴·平措汪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3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这是《人民日报》的讣告。在八宝山，平汪的遗体身穿藏服并覆盖党旗。习近平在内七常委、已退休的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等人、习仲勋夫人齐心，都献上了花圈。平汪能得到这份殊荣，与他的贡献密不可分。

## 带红色汉人进藏的红色藏人

解放军入康区时，20岁的平汪开启了人生中的风光时刻。朱德发来电报，要他向负责西南地区军政的二野首长邓小平、刘伯承报到，为二野进藏做准备。进藏的最大难处是后勤补给困难，藏军虽然效法英军轻步兵，但发展程度低下的西藏社会导致藏

军无甚战力。

共产革命中，西藏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解放军缺乏熟悉西藏风情的干部，精通汉藏语、熟悉西藏政界、信仰共产主义的平汪极完美补了缺。邓小平指出平汪的任务，是统战拉萨上层阶级，维持汉藏关系。他被

任命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委员会委员、18军民运部部长，同18军一道入藏。平汪召集藏人共产小组旧部，一起为解放军工作。

18军顺利攻下昌都，俘虏了噶伦、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结束东藏的战斗。





1960年入秦城监狱，直到1978年出狱，  
后任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习仲勋在1983年人大会议上介绍人大常委成员平汪时说：  
“他曾作出巨大贡献。”

1951年4月，平汪陪同阿旺晋美去北京，参加共产党和噶厦政府的谈判，平汪担任翻译并做了诸多消除误解的工作。这次会议诞生了著名的“17条协议”，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签署协议后的当晚酒会上，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说：“这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汪同志！他为签订《十七条协议》立下了大功。”宴会结束，平汪累虚脱晕倒。翌日晚上，中南海怀仁堂举办更大规模宴会，噶厦的官员第一次见到十世班禅。毛泽东夸平汪：“你们长期为解放藏族人民而奔波，辛苦了。”

1951年9月9日，平汪参加了解放军进藏先遣队的拉萨入城仪式，面对噶厦政府的热烈欢迎，“我们很有气派地进入了拉萨，士兵们扛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型照片，我和王其梅行进在队伍前面。”平汪回忆起风光的一刻，他也因此被称为“带红色汉人进藏的红色藏人”。

18军主力部队，于10月26日抵达拉萨。12月1日，一野（西北局）的部队到拉萨，当时二野负责达赖的工作，一野负责对班禅的工作。两部整合成新的西藏工委，二野占8人，一野占3人，平汪是工委内唯一的藏族成员，对稳定汉藏间关系起到桥梁般的作用。

1958年平汪被调到北京的全国社科院工作，随后被批评存在“地方民族主义思想”。1960年他入秦城监狱，直到1978年出狱，后任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习仲勋在1983年人大会议上介绍人大常委成员平汪时说：“他曾作出巨大贡献。”

监禁期间，平汪发明了一套辩证法体系，最后写成巨著：80万字的《辩证法新探》、20万字的《月球存有液体》、60万字的《自然辩证法新探》。晚年的平汪，以哲学思考为主业。

### 从憎恨刘文辉到热爱苏联

1922年，平汪出生于西康巴塘（今四川省巴塘县）。7岁到12岁，平汪在中国政府的现代化学校里学会了汉语，也奠定了视野。巴塘还有所美国教会学校附孤儿院，他从那儿略微了解到西方文明。

1932年的西康事变对十岁的平汪造成巨大冲击。蒙藏委员会委员、国民党西康省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在年初率中央政治学校西康特别训练班学生来到巴塘。他一边发展地方党务，一边考察康藏国防情况。一心想让西康独立建省的格桑泽仁，逾越了中央赋予的权限，抓住驻康定的川康边防军哗变扰民亟须镇压的机会，组建地方临时政府和民团介入康藏纠纷，他自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及省防军司令”。



格桑泽仁的做法激化了康藏局势，南京方面勒令他解散民兵，他假民意抗拒中央指令。很快，藏军与格桑泽仁部交火，不过藏军同时与四川省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开战。刘文辉接济军火给格桑泽仁，格桑泽仁部还是被藏军重创，最终刘文辉部击溃藏军。当格桑泽仁奉命回内地后，刘文辉部清洗了平汪父亲所在的巴塘民兵，处决了几个首领。

事变背后的各方角逐非常复杂，但平汪简化历史，将格桑泽仁视为生平第一个偶像。平汪一辈子都记得格桑泽仁穿制服、骑马抵达巴塘的情景，他在晚年自述里形容偶像“浑身散发荣耀”。“我恨死了刘文辉，渴望有一天能报仇。”那次动乱后，平汪“渴望成为像格桑泽仁那样受过教育的现代藏人”。

不平常的家庭环境接着塑造平汪，父亲是反抗刘文辉的积极分子，舅舅洛桑顿珠任职于中央政府的蒙藏委员会。走出封闭世界的机会来临，舅舅在1935年回到康定，在参与西康建省并反对刘文辉的行动失败后，他不得不回南京。闯荡内地以学习现代化知识，一直是平汪的梦想，他坚决要求随舅舅远走。

为鼓励边疆青年赴内地求学深造、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央政府于1931年成立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特别班，1933年扩成校附设蒙藏学校。舅舅两兄弟一家都是蒙藏委员会要人，故平汪在1936年顺理成章进入该校，着制服体验军事化管理，当时有三百多学生，其中藏人不到20人。课程主要有中文、数学、历史、地理，老师上课用汉语，对





■ 1959年9月，藏民聚集在宣传墙前观读藏语版毛主席语录。

于藏族学生额外教授藏文藏事。优渥伙食外，每月发10块银元的补贴。每次把学校与故乡的简陋村庄对比，平汪总为自己的经历感到惊讶和自豪。

不久，淞沪战争爆发，平汪所在的学校逐渐西迁。此时生活水准直降、学校纪律松弛、课程经常暂停，种种矛盾促使有反政府倾向的学生组织雏形渐现。平汪对刘文辉依然怀着刻骨仇恨，但他热爱整个中国，他希望能加入在战争中大出风头的新兴军种——空军。平汪带着藏族同学达瓦，请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写介绍信给空军副总指挥毛邦初和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周至柔，要求成为飞行员，平汪还幻想能驾机轰炸刘文辉总部。

空军方面未给回复，俩人盘缠用尽陷入

困顿。幸好舅舅派格桑泽仁带来钱，格桑泽仁极力反对两位藏族青年从军，理由是藏人到内地应以学业为重而非打仗，一旦伤亡将浪费政府的教育投资。他俩同意回去，翌日收到空军官校的特招通知书，颇为尴尬。

1938年末，平汪随校到重庆。他发现重庆的共产党刊物比南京多，学校当局在混乱秩序中无法限制学生的阅读选择。支持共产主义的班主任非常赏识他，常在夜里把平汪叫到自己房间“开小灶”，他给平汪找到众多共产主义刊物，包括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让平汪记忆犹新的是，班主任给的第一本书是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二本是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两册书对他产生巨大影响。他感谢这些读物：“彻底改变了我作为一个藏族人看事情的方式”。

由于深信任何民族在苏联都享有平等权利，平汪崇拜加盟共和国体制的苏联。他的志向依然是让藏族不再受刘文辉的欺凌，但解决问题之路径已然清晰，首先需要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然后西藏以平等身份入共产国际。平汪最初对中国共产党所知甚少，第一次详细了解是依靠班主任给的《西行漫记》一书。

### 屡建藏人共产主义组织

1939年，一个由藏人自发组成的红色地下组织“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在蒙藏学校成立。最初的成员是平汪、根曲扎西、喜饶、玛甲顿珠、阿旺格桑，他们多由于阅读左翼书籍而走在一起，发誓要投身社会主义事业、藏族自治事业。



此秘密组织一无严密组织结构，二无明确的行动纲领，他们更像是一个小规模的读书会。平汪众人将《国际歌》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歌曲翻译成藏文，他们还给斯大林和毛泽东写信，称谓是“全世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东方所有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

为争取更多藏族学生，他们成立一个更大、更公开的外围组织“西藏各地区学生四川联合会”。提高学校伙食待遇是一大斗争目标，而当时正是中国独撑抗战的最艰难时刻。他们的有组织活动到底引起了注意，平汪不顾校方的警告和劝诫，带领藏族学子抗议校领导并砸坏桌椅。最终，蒋介石亲自来训话，未收效。不久后，平汪和根曲扎西被学校以不遵守校规为由开除，根曲扎西的罪名是违反校规与妻子同住。

平汪留在重庆，与在校的、毕业后留重庆工作的秘密组织核心成员保持联系。他们自告奋勇走进了苏联大使馆，遇到苏联外交官、汉学家费德林。平汪三人汇报了组织发展成果，期盼能去莫斯科学习，但苏联并不将其当回事。平汪第二次见费德林时，要求去苏联接受军事训练以回康区打游击。最终，费德林给了平汪一百元巨款，足够他维持半年生活。不过即便没这笔钱，平汪生活仍然无多少压力，他吃住在舅舅家里。

正如所有进步人士都会为周恩来倾倒，平汪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后激动不已，他托人给共产党的外围要员邹韬奋写信，希望能去延安，学成后回老家推翻刘文辉。邹韬奋的秘书接见了平汪，劝告他去延安不便。平汪按指示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代表周恩来接见平汪，惊讶道：“我从没想过能听藏族人讲这样的话。”

平汪多次去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最终赠予他和喜饶各450元路费，言明若不能过西安，就去青海开展革命。果然，俩人到西安后先后折回重庆。此时，平汪的仇恨对象已从刘文辉扩张到整个国民政府。随后，当费德林认为平汪可以去苏联留学时，突然爆发的苏德战

争打碎了他的留学梦。平汪决意回康区开展革命活动，费德林给了一千多元，另有数百美元和英镑，这便是革命启动资金。

1942年，平汪在康区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星火社”，名出毛泽东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批成员有平汪、阿旺格桑，还有三名巴塘的康巴人。手无寸铁的平汪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欲统战当地实权人物来为革命积蓄力量。他联系上手握数百民兵武装的贵族夏克刀登（以下简称夏克），利用藏族贵族与国民党县政府的矛盾，借民族情绪灌输革命思想。平汪直言要在金沙江以东建立一个统一的藏人政府，最终要卫藏、康区、安多统一起来。传统藏人夏克对统一大西藏的理念觉得不可理喻，当时世人将康巴人和藏族人视为两个民族，夏克恨拉萨甚于刘文辉，对南京（重庆）政府则毫不在乎。

时日一久，康定的国民党办事处发觉平汪所为。1943年平汪西渡金沙江，跑到国民党插手不到的卫藏地区。平汪得到了昌都总督宇妥·扎西顿珠的赏识，他满足了宇妥了解高原外世界的渴求。宇妥曾在英属印度接受过

**1942年，平汪在康区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星火社”，名出毛泽东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批成员有平汪、阿旺格桑，还有三名巴塘的康巴人。平汪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欲统战当地实权人物，为革命积蓄力量。**

军事教育，是拉萨高层里的开明人士，他希望平汪留下来帮助训练军队以抵抗刘文辉。平汪心怀改造藏族社会的雄心壮志，执意要去西藏的政治中心拉萨，他把共产小组和共产主义书籍、画像等信物带入了拉萨。

1944年平汪给自己的组织重新命名，对内是“西藏雪域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对外号称“西藏人民统一联盟”。他们欲先改革西藏政府，让后藏班禅行辕、康区、安多的人进入核心统治圈，第二步是在康区开展游击战。平汪得到了四位噶伦之一、宇妥

的小舅子索康·旺钦格勒的器重和庇护。不过，四个噶伦都深信轴心国将取胜，最眼前的威胁——英国将撤离印度，而日本不会染指遥远的西藏。

沮丧的平汪只好转道求助于印度共产党。当时，卫藏人去印度的交通远较去内地便捷。在有众多藏人居住的印度东北部城市噶伦堡，平汪联系上了印共，随后去加尔各答找印共中央委员会。他的联络人是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巴苏医生，巴苏曾领导柯棣华在内共5人的印度援华医疗组为八路军服务。平汪要求印共助他经中亚赴莫斯科，印共最终以易遭英国逮捕为由，给路费劝他回西藏。

待平汪回到拉萨，已经是1945年初。噶厦政府态度冷漠，平汪一行带着几杆枪回到康区酝酿武装起义，二战已于他到家前结束。平汪结识了云南康巴地区德钦县的一个实权人物恭布泽仁，他汉名海正涛，曾任职于红军长征经过康区时建立的地方临时政府。他们成立了“东藏人民自治同盟”，然恭布泽仁死于争夺枪支引发的内江，平汪一行仓皇出逃，于1947年底回到拉

萨。1949年7月，他被噶厦政府驱逐出境，理由是他的共产党身份。“拉萨不是贵族的拉萨，是全体藏族人的拉萨，我有权待在这里。你们今天可以把我赶走，但明天我还会回来。”平汪向围观的民众发誓。

世事难料，当平汪在老家巴塘准备武装暴动跟刘文辉进行最后一搏时，刘文辉易帜了，多年的反抗目标烟消云散。共产党很快召唤平汪，请求他协助解放军进藏，他又回到了拉萨。

□ 编辑 段宇宏 □ 美编 黄静





反映残酷神裁内容的油画，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 英国古代法院的神明裁判

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法院存在很多奇葩的裁判方式，其中最让现代人感觉滑稽的大概要数神明裁判。

顾名思义，神明裁判就是把人断不出的案件交给“上帝裁决”。其形式共有四种：热铁审和热水审都是烫伤受控者的手，三日后观察伤口有无溃烂，无溃烂则无罪；冷水审，是把受控者丢进水中，沉下去表示

被上帝接纳，是无罪，浮起来的就算有罪；最搞笑的是吞噬审，受控者被要求吞下一盎司的面包或奶酪一块，人们郑重地祈愿，如果有罪，面包就会哽住他喉咙。

陪审制出现后，古老的裁判方式逐渐式微。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公会禁止教士参与神明裁判，这种裁判法才算事实上被废除了——因为没有教士主持，没人会把神明裁判的结果当回事。

## 官方生育观念的骤变

1949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儿童保育事业的发展》，指出“人民政府明令禁止溺婴堕胎”，并把堕胎与溺婴、卖儿女相提并论，认为是旧社会妇女儿童处境悲惨的证明。1952年，《文汇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一名“为了生活”堕胎的女教师，说她“为了追求个人享受，竟残害下一代”，且明言堕胎在“新中国是绝对不容许的”。

节育在建国初的话语里也同样不受欢迎，1951年，《新民晚报》发表文章《反节育》，批判日本的节育运动，称生育是“为未来美好的社会远景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应该对节育“予以否定”。1953年，避孕用

具被禁止进口。

1954年底，中央态度转变，又开始“赞成节育”，并于次年3月指示卫生部“宣传避孕”。媒体舆论也随之反转，1957年，《文汇报》更发文称帝国主义鼓励生育是因为资本家“需要产业后备军”，歌颂“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可以公开讨论宣传避孕”。对堕胎的评价也开始转变，改称为“人工流产”，允许自愿选择，卫生部也宣布“过去限制人工流产的办法有缺点”，“产生很多流弊”。

然而，这个节育宣传时期也没能持续太久。1958年，毛泽东提出“人多力量大”的口号，积极主张生育控制的文章再度迅速从报纸上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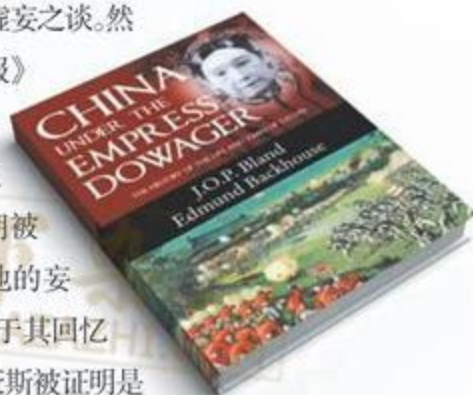
拜克豪斯

## 编造与慈禧艳遇的英国人

清朝深宫如万重帘幕，叫外人难窥实情，即使是实际掌控中国半世纪的慈禧太后，也很少与西方人会面，让他们只能以猜想、打听为主的形式去了解这位晚清一把手。

然而，在众多西方人中，竟有一位声名并不显赫的英国人拜克豪斯，用两册回忆录详细“回忆”了他与慈禧的多年亲密接触：他在戊戌变法当年来到中国，并在义和团动乱中挽救了600件宝物、25000卷图书。两宫回銮后，他通过大太监李莲英，归还了这些皇家文物，其中就有慈禧喜爱的精致玉雕。看到宝物失而复得的慈禧大为欣喜，亲自接见了拜克豪斯，还赐予爵位。此后，他与慈禧接触渐多，终在荣禄死后与她发生关系——太后虽年过七旬，精力依旧旺盛，甚至在得知拜克豪斯的双性恋身份后，要李莲英为他们安排了一次多人游戏。

根据后世历史学家研究，拜克豪斯的回忆录纯属虚妄之谈。然而他与《泰晤士报》记者合著的有关慈禧及晚清史事的专著，却长期被西方引为权威，他的妄想症当然不会限于其回忆录，因此，当拜克豪斯被证明是骗子后，西方知识界一片哗然。





## 中国人最初如何理解蒸汽机

1793年，英国遣使马戛尔尼到华访问，随行带有一座瓦特的蒸汽机模型，不过他却没有把这座模型送给乾隆皇帝或任何清廷高级官员。结果，中国人真正见识蒸汽机运行，已经是中英开始交战的道光年间了。

当时，中国官员无法理解蒸汽如何用作动力，而误以为推动英国人疾行快船轮子的是火焰。1840年6月，两广总督林则徐向道光皇帝报告英军舰队有三艘“车轮船”，“以火焰激动机轴，驾驶较捷”。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的钦差大臣耆英，受邀到英国蒸汽船的轮机室里参观，亲眼观摩了蒸汽机的运转，仍然只是向皇帝汇报说“大约按运钟表之法，巧借水火之力”，而未能描述真正的机器原理。

然而，1840年代初的广州与澳门已经有中国商人学会了蒸汽机技术。1842年，广州



描绘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蒸汽船的版画。

THE NEMESIS STEAMER DESTROYING CHINESE WAR JUNKS, IN CANTON RIVER.  
(From a sketch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Hon. East India Company.)

行商潘士荣就捐造了一艘蒸汽船，由于广州官员报告这艘船航行不甚灵便，道光皇帝下令不必继续此项试验。耆英在1845年左

右也一度从澳门找了一位美国人来造蒸汽船，可惜这名美国人在1847年死亡，他的造船工作也没能完成。



1946年，中国东北，苏军张贴的中苏友好海报绘上了镰刀斧头与青天白日的标志。

## 苏军在旅大禁止公开反蒋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大连，开始了旅大地区近五年的苏军军管时期。

当年10月，在苏军支持下，中共旅大党组织在当地建立了党政警群机构，但受当时形势所限，中共大连市委也不能公开运作。苏军对中共在旅大的活动设定了很多限制。他们针对中共办的报纸派了新闻检查官，凡是庆祝解放军前线胜利或骂国民党蒋介石的文字一律删除。

中共召开群众斗争大会，苏军有时也出面干涉，驱散开会的群众，甚至扣押主持会议的人。

苏军的做法惹得中共基层干部普遍不满，有人还抱怨道“以苏为主”实际是“以我为奴”。殊不知苏军的做法是怕中共行动超出《中苏同盟条约》允许的范围，惹来外交麻烦——尤其是同美国。暗地里，苏军不但帮中共落脚，还支持他们在此从事军工生产，装备大量“武警”开赴前线，只不过这些情形不能让普通党员知晓。直到国民党日薄西山的1949年4月，旅大区党委才将莫斯科最初内定的大连市长迟子祥从政权里清除出去，此人在1951年以美蒋特务罪被处决。

□ 文 赵新宇 □ 编辑 段宇宏 □ 美编 黄静



# 对抗书业浩劫： 台湾独立书屋结盟求生

文 / 杨素 (台湾作家)

**丰**富藏书、宽敞空间、华丽装潢，富丽堂皇的大型连锁书店几乎占据所有城市最显眼的空间位置。相较之下，小型书店、独立书屋无力还击，在这严酷的资本主义年代，一家跟着一家陷落在经济浪潮中，更别提网络购物、书籍折扣战，书业浩劫让独立书屋的生存雪上加霜，在寒冬中苟延残喘。

台湾自不例外。

更别提近年来台湾阅读风气日显淡薄，物价、店租节节高涨，利润微薄，生意越来越难做，大小书店早因不堪负荷而出现一波波倒闭潮，就连连锁书店都难逃被淘

汰命运。过去十年，台湾书店总数更从近两千家一路下降到千余家，没有竞争优势的独立书屋更是哀鸿遍野。

就在这个关头，台湾的小书店终于放弃了通过公共部门进行资源补贴的期待，决定了独立书屋的自救计划。独出心裁地，这一批希望有所作为的小书店，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借镜，以集体采购、进书、配送、联合营销等方式，互助自助，降低成本与风险分担，希望走出21世纪文化出版业的困境。

为了自救，台湾业者先是成立独立书屋文化协会，争取公部门政策与资源挹注。但毕竟

书店生存还是要面对市场供需，为更符合产业实际需求，历经7个月奔走，终于在2014年底，由40多家业者合组“有限责任台湾友善书业供给合作社”，并选出在淡水一带经营独立书屋有成的“有河book”负责人詹正德担任理事主席。

这支背水一战的队伍，力量算不上强大，同时成败未卜，但面对文化危机，他们仍抱着“不可能也必须去做”的精神，一路走了下去。

## 独立书屋成人文风景

强调以在地特色建立书与人的关系，





一家家窝在街角的独立书屋或小书店曾是台湾的重要特色。可能是特色藏书,可能是别有个人魅力的经营者,也有可能提供可尽情自在吃喝、聊天、充满咖啡香或酒香的阅读空间。“我不在书店,便在去往书店的路上”,在台湾从来不是句空话。

当然,有许多阅读资源不这么丰富的偏乡,无论花莲、台东,或是南投山区,却也总有许许多多不计成本的“傻子”,明知会赔钱,还是要在文化沙漠中栽下阅读的种子,或许是袖珍小店面,营造出家的归属感,或许掺杂着新旧书一同展售,独立书屋像是一朵朵自顾自美丽的鲜花,标示着这社会重要的生活风格与价值美学,成为台湾特殊的一道人文风景。

这当然与台湾特殊的社会发展历程有着直接关系。国民党长期的威权控制,以及对出版业的禁令限制,无法挡住民众的阅读与信息的饥渴,尤其在大学周边,对书籍与出版有实质需要的区域,因此各类小型书店林立,提供各类书籍供消费者购买,更不乏因为各种理由而无法在市面公开贩售的禁书。

尤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社会力量勃兴,各类出版品的消费一度洛阳纸贵,似乎在填补过去信息缺乏时代的空白,更使得成本低廉的小型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台湾各个角落,尤其以全台政治、文化中心的台北市为最。

以靠近台大和台师大的台北市温罗汀区域为例,由于学生与消费族群众多,数十年积

累下来,除了联经、桂冠等大型出版社先后在附近开设门市部,其他包括两岸交流中断期间即长期出版大陆作家作品的唐山书店、主攻女性主义市场的女书店、强调台湾意识的南天书局、大量进口或翻译国外书籍的书林书店,各式各样独立书屋比比皆是。

甚至专供简体出版品的问津堂、秋水堂;二手书店茉莉、胡思书屋、公馆旧书城、小高的店,也都在过去二十年间,陆续群聚在这紧密的街角巷弄中,密度之高、百花齐放,堪称华人社会罕见。

也因为独立书屋已成为城市乃至原乡特有的风景,成为偶像剧、纪录片取材的场景,例如梦田文创的偶像剧《巷弄里的那家书店》、侯季然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报道的40家独立书屋的故事,让独立书屋价值更为大众所知,甚至跻身台湾官方重要营销的出版产业亮点。

不少小书店甚至挪出一部分空间,不定期与艺术家、作者合作举办各类展览、活动、讲座,将不同的艺文体验、想象传递给当地居民,或藉由艺文活动与文创商品为社区创造不

独立书屋已成为城市乃至原乡特有的风景,成为偶像剧、纪录片取材的场景,例如梦田文创的偶像剧《巷弄里的那家书店》、侯季然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报道的40家独立书屋的故事,让独立书屋价值更为大众所知。





同的感动与惊喜, 打造愉悦的生活氛围。

## 独立书屋谷底求生

只是在风光之下, 独立书屋生存绝不轻松。尤其网络购物风潮掀起后, 网络书店常态化7.9折贩卖图书, 特销时期甚至会低于合理利润, 打到5折, 比一般大型连锁书店定价更低, 更逼近7折的进货价; 同样商品不同定价, 消费者自然会倾向选择较便宜的网络通道, 连大书店都竞相杀价, 也导致利润微薄的独立书屋被丛林法则打得七零八落。

尤其连锁书店借着商业优势, 对出版社进书竞相杀价不说, 更让大多数出版社同意采取寄售制度, 也就是等书卖给顾客后, 才付款给出版社, 不但因此把成本与风险转嫁出去, 也使得出版社提供更多种书

兼营咖啡、CD、杂货等小商品、在地农产与加工品支持营运, 才能勉强撑下去。

为了自救, 台湾业者开始尝试合作社思路。合作社入股下限每股一万元, 只提供书籍给社员、不卖书给一般顾客, 目标是希望经由学习小农组织合作社的模式, 透过股金集资两百万, 负担信息平台、仓储租金、薪资、运费等开销, 解决现实问题。

例如, 独立书屋因订书量少, 通常只能和中盘经销商交易, 导致无法绕过高单价进书成本问题, 未来合作社将借集体购书, 调降到6折进书、7折批给独立书屋; 同时联结特色文创、各地友善环境小农, 让独立书屋更有特色, 吸引读者走入实体书店, 打造推动在地文化基地, 以对抗折扣战。

尤其目前独立书屋分散全台, 如能透

摆脱单打独斗的环境, 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独立书屋虽然生意难做, 但仍吸引台湾不少有心人投入, 尤其是有意创业的青年, 加上台湾文化部门已陆续提供在偏乡新设书店补助, 让书店走入社区、走进偏乡, 培养阅读人口, 使台湾独立书屋的确暂有回春迹象, 个人出版与独立出版品也有更多机会被民众看见。

但在充满浪漫的宣言与行动之外, 独立书屋生死战的威胁程度并没有因此而稍减, 相反, 随着网络购物与互联网的升温, 小型书店与传统实体书店的生存日渐困难是不争的事实。同时, 联合平台进书, 是否代表风险共同分担, 万一出现货款给付问题该如何解决, 都是让业者头大的问题。

特别当今即便是网络书店也并非获利丰厚, 很多网络的低价竞争不过是业者希望短时间扩大商机与占有率所采取的非正规手段。甚至大型业者采取折扣割喉战, 也只希望薄利多销, 在生存竞争中存活下来, 其实也并不轻松。换言之, 如果社会阅读风气无法深化, 没有买书、阅读需求, 结构问题根本无从解决, 就算独立书屋反映了再美好的文化价值与纯粹性, 也很难抵御经济的洪流。

相较于韩国等地, 将传统型书店列为文化重点扶植对象, 除提供资源挹注, 甚至结合公共闲置空间活化, 店面与装潢修缮, 让业者在减少成本支出情况下, 能够放手一搏, 借独立书屋呈现文化多元性的风味。想保留这文化的街角与记忆, 显然也并非民间业者所能独力办到, 还需要公共部门更多、更实时的超前协助。

没有书店的城市, 宛如没有灵魂的躯体。这也是实体书店与独立书屋价值所在, 让人可以直接与书相遇、与人相遇, 填满这城市的空隙。或许, 这也是台湾出版业之所以明知市道不佳却仍要放手一搏的原因, 毕竟, 就算是寂寞街角的一栋小小书店, 依旧是心灵可以停泊, 免于孤寂、枯涸的港湾。留住独立书屋的一线生机, 也就为这冷漠的城市保留住一抹温暖。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没有书店的城市, 宛如没有灵魂的躯体。  
这也是实体书店与独立书屋的价值所在, 让人可以直接与书相遇、与人相遇, 填满这城市的空隙。  
就算是寂寞街角的一栋小小书店, 依旧是心灵可以停泊, 免于孤寂、枯涸的港湾。留住独立书屋的一线生机, 也就为这冷漠的城市保留住一抹温暖。

籍选择给大型书店; 特别是一些肯定会受消费者欢迎大卖的新书, 出版社也会为销量考量, 优先提供大型书店特卖, 小书店连分一杯羹的机会也没有。

尤其独立书屋虽深入社区, 并具独特选书特性, 但也代表小书屋先天必须面临需求小众、订购量少、没有足够市场规模等问题, 例如连锁书店单店起码有五万种书, 一间小小独立书屋则可能仅一千种出版品, 消费能量有限, 就算再有良心的经销商, 也不敢把完整书籍供货压在随时可能营销周转都出问题的小额交易身上。

甚至一些在山区和偏乡开店的业者, 由于运书需要成本, 还需要足够订书量才能承运, 搞得小型书店连向上游订书都成问题, 坚持理念、不刻意迎合主流价值的书店更受创惨重。业者为度过危机, 多半靠着

过平台动能, 让规模较大、离市区较近的独立书屋作为细胞, 在集体采购、进书、配送、联合营销平台等创新环节上发挥影响力, 协助偏远或新进业者进书, 也是一种解决进货困难的方法。

## 理想有待实践检验

一如詹正德所说, 独立书屋成立合作社, 并非是要抢食书市大饼, “只是要把这块饼的屑屑搜集起来”, 让平台化身成各地独立书店可靠的经销管道。简言之, 业者“不用赚钱, 但是要活下去”。水木书苑负责人苏至弘甚至公开身穿“自己的书店自己救”上衣, 强调希望通过合作社, “倒掉的书店一间间开回来, 让各个乡镇都有独立书屋”, 而且“还要能开得下去”。

的确, 透过合作社平台运作, 让小型书店



# 斯大林主张过“划江而治”吗？

斯大林曾主张国共两党“划江而治”，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定论，而曾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身边担任翻译工作的师哲，却对此“含糊其辞”，这段历史谜案是另有隐情，还是一场中苏高层间的误会？

文/唐山

**“有**人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苏联人，包括斯大林，有几个人懂得‘南北朝’这个词？既然他们连这个词都不懂，怎么会提出搞‘南北朝’呢？”读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的读者，对这番表述，可能极不以为然，甚至视为“差错”，随手翻过去。其实，在似乎闲笔中，可能藏有作者的深意。

与普通翻译不同，师哲曾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等要职，对高层决策背景了解深入，只是出于种种考虑，在信息披露时往往有所取舍，给后人解读带来困难（在这本名著中，类似情况颇多），而解放战争末期，斯大林是否主张过“划江而治”、阻止解放军南下，是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

## “划江而治”曾被认为是定论

在一般读者眼中，斯大林曾力主“划江而治”，似已成“定论”。一是1949年初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曾秘访西柏坡，二是毛泽东访苏，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指责”，表示道歉。在《大决战》等电影中，都明确认同此论。

此外，还有更多证据：如《党史资料通讯》第52期披露，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说：“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阻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师哲口述 李海文著  
九州出版社



中国原驻苏大使刘晓在《出使苏联八年》一书中也称，1955年，周恩来说：“渡江前夕，米高扬从莫斯科来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来的，主要是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听取我方意见。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搞‘南北朝’，两个中国。”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王方名的《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文中说：“后来我（指毛泽东）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1984年11月3日，杨尚昆在接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采访时表示：“米高扬曾经转达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大军过江。”向青先生的《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一文可为佐证。

杨尚昆未参加西柏坡会谈，而师哲是那次会谈的翻译者。没绝对把握，相信他不敢也不会翻这个案。

在《师哲回忆录》首版两年多后的1994年，俄罗斯《近代和现代历史》杂志刊发了《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函电往来》一文，为师哲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

## 毛泽东为斯大林拟复照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主力，此前因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为避免桂系把持中枢，蒋介石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之职，将他从南京挤到武汉，去当华中剿总总司令，并任刘峙为华东剿总总司令，以分其权。可随着刘峙的主力覆灭，拥兵40万的白崇禧成了“擎天一柱”，这是逼蒋下台的资本。

蒋介石走投无路，1月8日，命吴铁城（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照会美、苏、英、法四国，希望促成国共和谈。

1月10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去电，通报相关信息，并称：“我们想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停战和在中国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进行调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请告知，您是否同意。如果您不同意，请告更合适的答复。”斯大林建议中共提出“不需要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特别是动用军队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的国家（指美国）”等条件。

第二天，斯大林又发电解释：“没有美国的调解，国民党是不会进行和平谈判的……国民党将成为阻挠进行和平谈判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花招将被戳穿，



您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

在后来几天电报中,斯大林建议中共:不停止军事行动、通过谈判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阴谋等。1月17日,苏联外交部复照国民党政府,拒绝参加调停,其中内容是毛泽东亲笔拟定的。

从电文看,斯大林并无“划江而治”之意。很长一段时间,米高扬被认为是斯大林派来阻止解放军南下的钦差大臣。但师哲曾说:斯大林与毛泽东已通过函电解决了相关问题,无需再派米高扬来说什么。而且米高扬1月30日到西柏坡,比中苏电报沟通晚了20天。

据俄罗斯公布的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报告,确无“划江而治”方面信息,米高扬在报告中建议中共尽快占领上海、南京、广州等南方大城市。不仅不阻止,反而主战。

## 斯大林的“双线策略”

从原始档案看,并无“划江而治”,可为何当事人却咬定确有此事呢?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薛衔天先生在论文《“划江而治”的风源》中,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即提出“划江而治”的是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推测,斯大林采取了“双线外交”策略,通过罗申与国民党政府联系,以维护《雅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既得利益,同时通过科瓦廖夫与中共联系。罗申与科瓦廖夫互不知情,分别对斯大林负责。

显然,这种机制极易引发误会。

从1948年春起,罗申便不断散布苏联会在国共间调停,以离间美蒋关系(可能也有两面下注的考虑),由于未与中共沟通,造成误会。毛泽东得知罗申的言论后,愤怒可想而知,但苏方尚未正式提出,中共也难正式回应。米高扬此时来华,其目的很可能被误解,甚至将其个人言论视为苏方在摸底、造势,进而给当事人以这样的印象:苏方后来未再提“划江而治”,是中共强硬回应的结果。

微妙的是,苏联与中共在具体问题上已有不少纠纷,以东北为例,1948年2月苏联提出在黑龙江等边界航道建灯塔,苏方负责修,所有权属苏,3月10日毛泽东答复:

同意苏方派技术人员来,但费用由中方负担,界标管理权属中方。5月14日,苏方又提出派飞机、轮船沿黑龙江和松花江巡查航线,20日中方回复:“黑龙江为两国边界,同意苏联飞机和轮船巡查,但松花江是中国内河,是否应由中国轮船装备火炮,并雇请苏联专家,定期巡查较为妥当。”

斯大林能感受到毛泽东不满,但不知道为什么不满,在中国问题上,他此前曾多次犯错,也许,如果双方交流充分,误会不难消除,但斯大林必须维系他绝对正确的神话,所以他只好用“胜利者不受指责”等外交辞令来模糊处理。而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他首次对斯大林观点坚决抗争,在他看来,斯大林的道歉只可能是为了“划江而治”,所以毛泽东后来反复提起此事。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真相如何,尚需更多材料。

## 一本需从字缝中看文章的书

令人好奇的是,师哲为何不正面谈斯大林是否主张过“划江而治”,而是去纠正“南北朝”的措辞?这可能是个安全策略,将来可以用歧义来自我辩白:我谈的是用错词,没谈史实真伪。在书中,师哲常使用这种暗示法。

毛泽东访苏时,三次想和斯大林谈心,倾诉怨言,但斯大林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一次毛泽东指着王稼祥说:他当年也曾反对过我。但斯大林依然没接话茬。

乍一看,这样的细节似乎琐碎,其实背后埋藏着丰富的潜台词:抗战结束后,斯大林在国共和谈中起过不良作用,解放战争初期,毛多次计划访苏,但斯大林一度在国共两面下注,便不断搪塞,到后来斯大林甚至说“苏联各地粮食收购工作已开始,苏共领导人将分赴各地收购粮食”,毛不解地问道:“难道苏联对征粮工作如此重视,竟然使得党中央的各位领导人都要从事这项工作吗?”几个月后,斯大林再邀毛泽东访苏,毛则称身体不适,或说战役正在进行,没时间。

事实证明,恰恰因为沟通不充分,加上

新的误会,对后来中苏关系发展留下了阴影。明白了这些,才能懂得毛泽东与斯大林初期谈判为何会陷入僵局,而双方最终突破隔阂、达成协议,也确实展现出两位巨人登高望远的胸襟与智慧,种种关窍,知者心领神会,而不知者只会觉得索然无味。

## 口述史不等于口述实录

师哲有两本回忆录,一是《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著),一是《我的一生》(师秋朗笔录),有趣的是,两本书中师哲形象迥然不同,前者偏理性,后者更性情。

李海文曾说过,师哲个性强,情绪波动大,长年在苏生活(15年),对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留下影响,比如他陪高岗访苏,高岗让他帮拎公文包,师哲推说记性不好,怕弄丢,一口回绝。他和高岗是老乡,说话较随便,但颇可见其性格。

对于领袖,师哲多以平视眼光审视,常有独到见解,但也会因过度自信而出现误忆、前后说法不统一等问题。如何处理好二者关系,对写作者的功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口述史并非简单的“你说我记”,它应该超越普通采访、审讯记录的水平,这就需要作者深入了解相关历史背景,并对当事人叙述保持高度警觉,随时排除其中含混、主观、虚假的成分,绝不能为了生动、现场感而牺牲真实性。

近年来,口述史颇受追捧,相关书籍、文章不少,但真能称为“史”的却寥寥无几,许多宝贵的口述资源被写成了个人秀、单方控诉,实为莫大浪费,而李海文这本《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堪称为后来者垂范。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已出版多年,在时间检验下,其品质更加凸显。它并非一本以猎奇、挖内幕、找小道消息为目的的书,而是需要读者反复品味,学会从字缝中看文章,才能豁然开朗。将这样的书修订再版,不啻真读史人的福音。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澳门航空公司)



(港龙航空公司)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刊为此版所列航空公司航班和酒店商务客房指定读物



(鑫海锦江大酒店)



(城市名人酒店集团)



(深圳富苑皇冠假日套房酒店)



(新都酒店)



(深圳马哥罗罗好日子酒店)



(银座泉城大酒店)



(深圳香榭丽宫酒店)



(深圳丹枫白露酒店)



(福州西湖大酒店)



(深圳海景奥思廷酒店)



(北京友谊宾馆)



(四川峨山饭店)



(云南天恒大酒店)



(杭州国际假日酒店)



(丽江官房大酒店)



(杭州天元大厦)



(广东富盈酒店)



(杭州华辰旅业集团)



(北京金龙建国温泉酒店)



(南京中心大酒店)



(深圳维景酒店)



(青岛颐中皇冠假日酒店)



(井冈山中泰来国际大酒店)



(珠海怡景湾大酒店)



(珠海度假村酒店)



(帝豪花园酒店)



(珠海华骏大酒店)



(深圳戴斯酒店)



(常州大酒店)



(上海市虹桥宾馆)



## 1 银行划款

开户名称: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凤凰星书店

账号: 4000024819200013681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红宝支行

\* 请将电汇单及客户资料传真至 0755-25935510

## 2 邮局汇款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楼901室

收款人: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凤凰星书店

邮编: 518001

## 3 邮局订阅

全国邮局网点统一征订热线: 11185

邮发代号: 28-216

\* 需要挂号邮寄的订户

按邮局统一规定每本加收挂号费 3 元

半年挂号费 18 元, 全年 36 元

#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 SUBSCRIPTION

## 征订 2015年全年 (12期) 杂志

每期20元 | 共计240元

订阅热线  
0755-22913940

24H 传真  
0755-25935510



微信号: sjycdl

为遗产预约未来  
RESERVE FUTURE FOR HERITAGE